

先锋 月刊

Vanguard

2018年12月 总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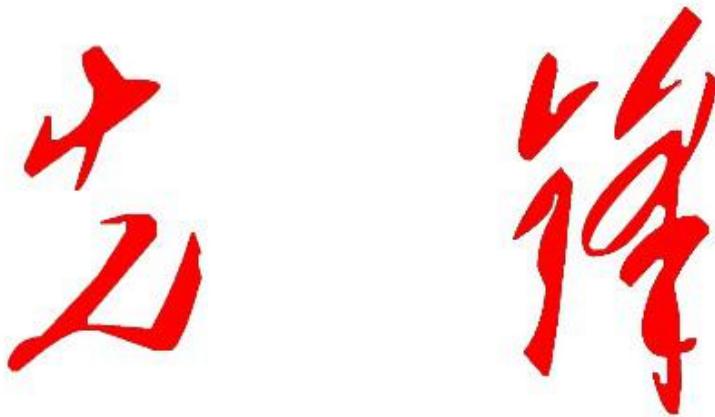
本期精选



Yue Kan

全世界无产者 聚会起来

先锋报编辑部 出版



VANGUARD

《先锋》 总第 4 期

2018 年 12 月 出版

《先锋报》编辑部 主办

Vanguard Newspaper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竟叫喊起来：我们都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啊！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说‘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列宁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另外，这个月是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这两位伟大导师的诞辰。我们纪念那个钢铁一样的男人 140 周岁生日，也纪念那个永远得胜的男人 125 周岁生日。而纪念他们的最好方式，就是用现实的行动去证明！

一切有想法的，想把自己的认识、经验与生活诉诸于文字并公开与大家交流的人们，先锋报网欢迎你们！

这是我们的投稿邮箱：1561123123@protonmail.com。我们翘首期待同志们们的投稿！

《先锋报》编辑部
2018 年 12 月 30 日

开本：A4
发行时间：2018 年 12 月 30 日
总期数：第 4 期
投稿邮箱：1561123123@protonmail.com
网站地址：
<https://xianfengnewspaper.wordpress.com>
备用地址：
<https://xianfengnewspaper.github.io>
发行单位：先锋报编辑部



目 录

【理论园地】

曾经的阶级斗争史（中国篇 1957-1965）	1
转载：阶级与左右（完）	28
土地革命时期	29
抗日战争时期	42
老板剥削的一些常见手段（一）	70

【时事评论】

我们为何奋斗？——先锋报对佳士声援团的呼吁书	72
同学们，怎么办？——先锋报给左派学生的建议	74
货车司机杀人案	78
转载：不要翻案：向约瑟夫·斯大林同志致敬	80
钱！钱呢？	83
频繁爆炸背后的老板的秘密	88
短评：护士值班中因公毁容，医院拒认工伤	92
“事是不是我做的还得看公安”——评广州坠楼事件	95

【推书试读】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	99
推书：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现	102

【写在刊末】

致读者	104
-----	-----

曾经的阶级斗争历史（系列·中国篇）

1957-1965

我们在前文已经简单讲述过 1949-1956 年中国的阶级斗争历史。在上一个阶段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有胜负，总体上无产阶级依然依靠工农联盟位居上风，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受限于精力和材料，我们只能对历史做出一个简单的梳理。一些地方可能存在疏漏，还请大家见谅。

和我们此前一贯的坚持一样，在分析历史的时候既要反对英雄史观，同样也要反对民粹主义倾向。这一点在分析大跃进时期的历史中尤为重要。

二、1957-1965 年的中国

资无双方，现在围绕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斗争。斗争的焦点，首先就在于工业计划上。

走资派头子周恩来提出，要优先建设农业，其次是轻工业和商业，最后才是重工业。可是，如果没有重工业提供的拖拉机、化肥、农药和用来建水利工程的水泥，怎么才能提高农业的产量呢？如果没有重工业提供的机床和农业增产后提供的原料，怎么才能提高轻工业的产量呢？走资派提出这样一个优先建设顺序，实质就是要把劳动力锁死在农村，以限制工业的发展，限制工人阶级数量的提升，从而限制工人阶级力量的扩大。

毛泽东认为，应该大力建设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这样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将一大批农民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提升无产阶级的力量。重工业的产量提升，就可以为农业提供更多的拖拉机、农药和化肥，为轻工业提供更多的机床。因此，他提出，要“以钢为纲”，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在十五年以内，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即使这会导致短期内钢铁质量严重下降，但可以培养大批合格的产业工人，极大提升无产阶级的力量。

而在实际建设中，各省市基层先锋和群众对于工业化建设的热情是很高的。1956 年，各省市、部门要求基本建设投资数字不断追加，造成各方面的紧张。但周恩来随后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1】

对计划经济财政和物资调拨上的压制，直接导致了严重的材料紧缺问题，制约了工业工业的发展【2】。地方基层无产阶级先锋和群众的斗争迫使中央的走资派不得不让步【3】。但是，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四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二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样做，周恩来更是竭力劝阻，资无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执【4】。从五月毛主席离京起，走资派就由防止急躁冒进而进一步转到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上来，开始转守为攻。

1956 年 2 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苏联走资派头子赫鲁晓夫作了恶毒攻击苏联社会主义

和斯大林同志的修正主义“秘密报告”，宣告了苏联资产阶级大规模复辟攻势的开始。会后不久，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贝鲁特同志也突然死亡。受此影响，全球范围内资产阶级势力



赫鲁晓夫(前中)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

都在疯狂进攻本国无产阶级，极力想抹黑本国无产阶级先锋队【5】。

在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即将完成之际，国内的资产阶级也基本站稳了脚跟。在中央的资产阶级利用种种手段，对毛主席进行架空，并主导召开了中共八大【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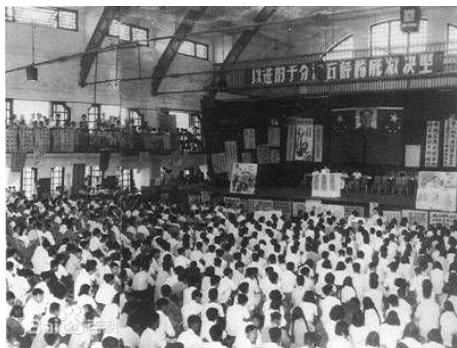
受苏共二十大的影响，资产阶级在这次大会上公然修改当时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八大上还通过了走资派把持下经济部门起草的二五计划的建议，在建议中，中国工农业建设的重优先顺序也被修改，二五计划的投资额遭到大砍【7】。

走资派提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就是在用唯生产力论掩盖阶级矛盾的实质。



显然，八大通过的这一系列决议，是对资产阶级有利、对无产阶级有害的。

但无产阶级也并不是刚建国的时候的情况了。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得到了很大提升。到1958年初，全国无产阶级总数有大约一千八百万人。一五计划的完成让中国拥有了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让公有制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的绝对主体。



与此同时，为减轻无产阶级干部被打击后对本阶级的冲击，毛泽东提拔了柯庆施为代表的新一批无产阶级干部【8】。毛泽东为了应对民间资产阶级的进攻，还展开了“反右”运动，并在八大二次会议上重新将我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修改回阶级矛盾，并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工农并举的总路线。

尽管反右运动在部分地方被走资派所利用，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已经被打倒的地主阶级，但在总体上，反右运动依然打击了党外资产阶级势力，为无产阶级执行大跃进运动奠定了一定基础。后来，反右运动又党外扩展至党内，最终成了大跃进时期政治斗争的预演。

1957年中国工业发展速度（10%）不及上年（31%），农业也未能达到计划，粮食产量只达到3700亿斤（不含大豆），比计划低出120亿斤。1957年9月至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借机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9】。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此次会议上扭转了此前被走资派歪曲的路线。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云



集莫斯科，召开庆祝十月革命 40 周年大会，毛泽东也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在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在“今后 15 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修正主义苏联都有如此的经济计划和口号，这使得毛泽东深受触动，在 18 日的会议上提出了中国 5 年后钢产量达到 1000 万到 1500 万吨，15 年后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10】。大跃进运动就此开始。

走资派内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全面反对这两个运动**。他们在工业上要求降低计划指标，放缓增速，限制工人数量，鼓励私营经济。在农业上，他们要求停止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反对农业集体化，要求各地公社、合作社将土地重新分给农民阶级，鼓励农村的小农经济。这一种观点代表了**小资产阶级和自耕农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上，**彭德怀**是该观点的最主要的支持者。另一种观点是，**片面的反对这两个运动**。在工业上，他们提出要制定一些绝对不可能达到的计划指标，但是私下里不给相关企业以足够的物资支持。在农业上，他们提出要在公社内部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并虚报农业产量，欺上瞒下。这一种观点代表了**其他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刘少奇、邓小平**是该观点的最主要的支持者。此外，**周恩来**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任何一个观点，但他对这两派的行动都持默许和少量支持的态度。

大跃进运动的目标，在于壮大国内无产阶级的力量。只有国内工业大规模高速增长，工人的数量才能得到迅速提升。将庞大的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无产阶级的群众基础就能更加庞大，进而提升整个阶级的力量，快速推进社会主义各领域的生产关系革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而要想迅速扩大工业规模，钢铁产量的提升是必不可少的。1958 年 2 月，薄一波向全国人大作关于 1958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依然试图打压工业建设，提出 1958 年钢产量指标为 624.8 万吨，比 1957 年只增长 17%。无产阶级并不满意这个充满了暮气的计划，4 月，国家经委汇总各地上报的钢产量指标，上报 1958 年计划为 711 万吨。



中表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变。

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下，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1962 年钢产量由 1200 万吨提高到 3000 万吨，粮食从 5000 亿斤上升到 7000 亿斤。提出要使中国在 15 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美国（所谓“超英赶美”）。从此，“大跃进”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农业要“以粮为纲”，工业则“以钢为纲”。

急剧增长的工业产能需要更多的工人，而小农经济却将劳动力都束缚在土地上。工业产出的产品也急需反哺农业，但一家一户的自耕农完全没有消费拖拉机等大型农业器具的能力。不可能让国家长期付出巨额代价补贴自耕农购买农机具，而且小块土地也不适合机械化耕作。虽然此前全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但绝大多数合作组织均为初级生

走资派试图压制工业的企图在全国工农的压力下破产了，但他们并不甘心于失败。一些走资派见正面压制工业计划不能成功，就试图通过将指标定的高过天际的方式，让这场运动脱离实际物质基础而失败【11】。无产阶级的应对是，为了“留余地”，毛主席在党内信件

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土地依然属于农民个人而不是合作组织，在财务上合作程度也并不足以购买大型农机具。在实际生产中这样以自然村为单位的低级合作组织也很难完成一些较大的工程。

要改变这样的情况，必须进一步推进集体化，将农业由小生产改造为大生产。只有分工程度更高的大生产才能节约出大量劳动力投入工业建设，只有大生产才能广泛使用各种大型农机具、建设各种大型工程。

上级没有指示，群众和基层先锋队已经自己开始尝试着去改变这一不利情况。1957年春，生活在嵖岈山脚下的一万多翻身农民，也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掀起了建国后第一个全面治山治水的群众运动高潮。然而，由于当时的27个农业社劳动力分散、物质基础薄弱，还常常因边界问题纠纷不断，致使声势挺大的治山治水运动，被群众戏称为“老水牛掉井里——有劲使不上”，进展相当缓慢。因此，大家都有将小的农业社合为“大社”的呼声。



1958年4月，时任河南省信阳地区行署专员的张树藩、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娄本耀、遂平县委副书记陈丙寅等和当地合作社领导谈到了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设想。这个设想符合不久前毛主席提出的可以一乡一社，也可以一区一社建立农业合作社的指示精神。

于是，遂平县委随即召开会议，开始研究“大社”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决定将嵖岈山脚下的土山、杨店、鲍庄、槐树等4个中心乡的27个高级社，9369户43263人，合并成立为一个“大社”——嵖岈山大社。

这个大社就是嵖岈山人民公社。与此同时，浙江普陀县蚂蚁岛地区的农民也在基层先锋的带领下组织了蚂蚁岛人民公社。8月，毛泽东在听取了相关汇报后迅速对人民公社给予了充分肯定，《红旗》杂志也刊登了一些相关文章【12】。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河南省动作最快，于当年8月底即在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办起了1378个公社，农村居民入社率达99.8%。

在基层先锋和工农群众的高涨热情之下，兼以一些走资派的推波助澜，只用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是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运动的奇迹！**

各地对公社建设的热情也十分高涨。毛主席对此予以肯定，即使两年无法完成，顺延几年也完全比过去那种保守的情况要好得多【13】。

公社化之后，全国各地在大型工程修建上也进展迅速。原本安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的十三陵水库，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即使是特大型水利灌溉枢纽淠史杭灌区，



自 58 年开工后不到一年就玩成了淠河总干渠的逐段通水。密云水库、海河治理工程、淮河治理工程、黄河治理工程、三门峡水利工程、丹江口水利工程等多项大型水利工程都被建立起来了。

农业战线的巨大成功，直接推进了工业战线的成果。全国同期展开了大炼钢铁运动。1958 年钢产量为 1108 万吨，生铁产量为 1369 万吨。实际合格的钢 800 万吨，有 300 多万吨土钢、416 万吨土铁不能用。尽管大量的钢铁是由土高炉冶炼的不合格品，但合格的钢铁依然进步神速，高于原先那个保守的二五计划所制定的标准：624.8 万吨和 711 万吨。到 1959 年，全国可用钢铁产量高达 1387 万吨。大炼钢铁运动还培养了数量巨大的产业工人队伍。1958 年下半年起，全国掀起了大招工的浪潮。1957 年全国公有制单位职工总计为 3101 万人，到 1958 年，这一数字暴涨到 5194 万，1960 年为 5969 万人【14】。

面对巨大的建设成就，国内外资产阶级都被惊呆了。但他们决不甘心于就此认输，而是开始更加疯狂的反扑。在工业方面，他们开始大量推行临时工。原本临时工只是工业建设刚起步阶段的一种过渡，如果农业上遇到问题，征调进厂的临时工随时可以回农村继续劳动。但在 1958 年，山西省援引《国务院关于煤炭工业部招工问题的通知》规定，煤矿系统的临时工、合同工一律不得转正【15】。

临时合同工们拿着低于正式工的工资，干着一样的活，却很难享受到正式职工的福利待遇，并且工作朝不保夕，依然要为不被开除而担忧，这和资本主义劳动雇佣关系没有什么区别。禁止临时合同工转正，就是人为的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分裂，就是保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农业领域，走资派试图用浮夸风的方法败坏党在农民中的威望，以拆散工农联盟。1958 年，在走资派的牵头引导下，各地逐渐掀起了虚报粮食产量的风气。首先是安徽、福建、广东等地区的一些县上报最高亩产近两千斤。由于是试验田，且南方水热充足，尚且比较可信，但这却让走资派控制下的各地公社抓住机会予以利用。在走资派的带动下，从河南省开始，各地纷纷开始“放卫星”，仅有东北等少数地区例外【16】。在走资派的影响下，如《人民日报》这样的媒体也开始大批报道各种卫星。



受此影响，即使是没有放卫星的公社，也不得不虚报粮食产量，以免成为落后典型被走资派加以攻击。于是浮夸风问题迅速波及全国。在中央的走资派对此予以大力支持，吴芝圃、李井泉等公然支持虚报粮食产量。刘少奇等人公开喊出唯心主义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资产阶级上下各方串联，中央对农作物种植和收获情况彻底失去了了解。资产阶级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科学”地论证虚高的粮食产量是真实的、符合科学的【17】。

毛泽东等无产阶级先锋队虽然也察觉到了浮夸风的巨大危害【18】，但当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很多倾向无产阶级的贫农的基层先锋也跟着在虚报粮食产量，很难再刹住这股风

气。如果此时进行严肃处理，势必要将全国所有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等基层全部予以处理。党拿不出足够多的基层干部予以替代。如果真的全部处理，势必严重影响当年的基层行政效率，并沉重打击自己的基层力量。因此，党只能进行口头的规劝，但这种规劝必然是软弱无力的，效果很小。

在这样的浮夸风影响下，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 12 亿斤，实际 1957 年徐水的粮食平均亩产才刚刚 138 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 70 斤。这中间的差额及其巨大。依照规矩，上报多少粮食产量，那么政府征收就要按照报上来的产量进行征收。可 **实际产量和虚报的产量差距如此之大**，尽管中央考虑到这一情况予以了一定减免，但公粮仍然是农民无法负担的。无奈之下，大家只有交出一定数量的口粮，甚至是种粮！



三年灾害五书记

但从 1959 年起，中国各主要农业产区也遭受到了持续三年的旱灾影响。与此同时，1959 年 6 月，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赫鲁晓夫代表苏联资产阶级，在国际上攻击中国共产党，为党内走资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19】。中外走资派联手逼迫中国工农在这样一个困难时

期用大量农产品还债【20】。走资派头目周恩来在这样的困难时期依然大力对外国资产阶级无偿出口、援助农产品【21】。

形势急转直下。大跃进运动遭到了这一系列事件的沉重打击，饥荒在全国蔓延。**党在农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原本亲密无间的工人和农民现在形同路人。**

7 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上，走资派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了攻击，要求恢复商品经济，降低工业预算，裁减工人人数。无产阶级迫于自己受到的一系列打击，同意暂时进行妥协，以积蓄力量。即使如此，在会议中无产阶级也进行了一定的斗争【22】。

资无双方原本已基本达成共识，肯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肯定建设的成绩，失误是难免和次要的，将争议留待日后再解决，但在会议即将结束之时，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一封信，陡然改变了会议的进程。

彭德怀的上书，是站在自耕农这一农业小生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原本这一阶层是工人的重要盟友，但在工农联盟濒临破裂的现在，他们成了敌人。但小农注定是一个被淘汰的、即将消亡的阶级。他们无法在这样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成为一个独立的胜利者，要么倒向无产阶级，要么倒向资产阶级。他们选择了资产阶级。彭德怀集团试图用浮夸风导致的严重挫折，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倡农业包产单干，否定社会主义经济。黄克诚还说，对人民公社，搞与不搞都可以，长远上有利，短时期内不搞更主动些。他们试图用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瓦解集体化的农业。

早在 1956 年，走资派就开始为包产单干大力宣传，资无双方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斗争【23】。但在工农联盟遭受打击而破裂前，单干在全国仅仅只是少数现象。现在农民对党的信任大大降低，农民自发性的一面就迅速凸显出来，自发的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一路狂奔。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了重挫。走资派利用这一机会，向无产阶级发难，要求降低工业指标，重新搬回保守的工业计划，并对即将遭到无产阶级重点打击的己方基层给予了



政治保护【24】。

矛盾由于彭的上书而激化了。无产阶级必须捍卫人民公社这一斗争成果，必须尽可能的保住大跃进运动的战果，也就必须将彭德怀集团拿下。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争取到了投机派林彪的支持。在无产阶级的努力下，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四人被撤除实际工作职务，仅保留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等职位，**保住了三面红旗的政治正确，斗争取得暂时的成功【25】**。

这场会议中的激烈政治斗争教育了无产阶级，也教育了毛泽东同志。他深刻的认识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愈发尖锐了。他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

庐山会议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右倾、鼓干劲、争取新的“大跃进”的高潮。一些无产阶级基层先锋认为八届六中全会以来对生产指标的调整是不对的，说：“反右反早一点可以不调整。”

但走资派已经利用自耕农的支持逐渐扩充了自己的力量。在制定 1960 年经济计划的时候，周恩来将钢产量指标压在 1200 万吨不放。他们提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和“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口号，在这个口号当中，生产力的地位被提高到了和革命一样的高度。这实际上就是在用唯生产力论搅浑水【26】。



粮食问题依然严重，这场自然灾害一直持续到 1961 年。而由于 1958 年的恶劣影响，种粮和口粮依然是稀缺的。1960 年粮食出口收购计划是一百亿斤，而到五月底只能完成三十多亿斤，在对外贸易方面也很被动。此外，在 1960 年春，信阳事件终于被曝光。党，尤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威信遭到沉重打击【27】。至此，农业大跃进被迫中止。

无产阶级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退守。1960 年 6 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得不对工业计划进行了妥协【28】。在走资派的努力下，大批大跃进时期新建的工业企业被关闭撤销，工人编制被大量压缩，大批人口被赶回农村。随后在农业上，走资派大量推行三自一包政策。1961 年 3 月，中央还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取消了分配问题上实行的部分供给制，强调严格评工计分，公社食堂改为自愿组建（实际就是取消大食堂），将“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制度逐步改革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小公社体制。无产阶级为了暂时撤退，不得不同资产阶级妥协，允许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在农村的存在。



信阳地委书记
路宪文

农业六十条是资无双方斗争的阶段性结果。无产阶级守住了集体所有制的底线，但资产阶级也对其掺入了大量资产阶级法权【29】。一些农村的商品经济迅速复苏。

与此同时，修正主义苏联还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毁弃援华合约，使中国进退两难。资产阶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向无产阶级展开了全面进攻。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有省市地县三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彭真等尖锐攻击三面红旗，反对毛泽东此前对大跃进的论断，毛泽东被迫在会上亲自作检讨以保护其他无产阶级干部。走资派合力要求大幅降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生产指标。会议决定：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123.3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67.6亿元。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关转；国营工业企业1961年减少的基础上，这一年再减少1.8万多个。这一年1月至8月，精简职工85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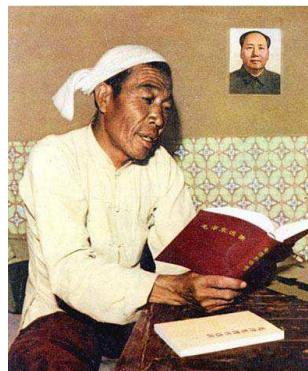
重工业生产从1961年起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大倒退，钢产量从上一年的1866万吨下降到八百多万吨，比1959年的1387万吨还要少得多，煤产量下降到2亿八千多万吨，下降的势头还在继续。轻工业总产值又比上一年下降21.6%。全国职工总人数出现了连续2年的大幅下降，由1959年的5969万人下降到1962年的4321万人。其中集体企业职工有所增长，但国企职工相比1960年的5044万人下降到了1963年的3293万人，足足减少了近两千万人。走资派还主导了工业七十条的起草，通过加强厂长负责制等措施，架空了各大国企党委，在工厂推行资本主义路线。

无产阶级的形式岌岌可危。从中央到地方，各地都被大量走资派夺取了权利。但即便遭受了以上种种的重大挫折，中国无产阶级依然创造了一些巨大的奇迹。工业战线的大庆油田，农业战线的大寨公社，科研战线的两弹一星，都是在这样一个极度困难的时期完成的。正是这些在极度困难时期完成的奇迹，恢复了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威信，重振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威望。在这些奇迹中，还诞生了新的一大批斗争经验更加丰富的无产阶级基层先锋，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了恢复。

大庆油田的工人兄弟们，在王进喜同志的带领下，顶着饥饿和寒冷的威胁，在没有苏联专家指导、没有足够的大型设备的情况下，创造了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从1960年到1963年，四年期间国家只向大庆投资了7.1亿元，就完成了油田的基本建设，还收回了全部投资，提供了3.5亿元新的积蓄。大庆油田任务重、时间紧，人力、物力、财力不足，集中领导、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胜利完成一次又一次任务的主要经验之一。在集中领导的同时大搞群众运动，使先进的更先进，后进的赶先进。大庆人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鬼、不信邪，真正是革命加拼命。这是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奇迹，不亚于苏联斯达汉诺夫的奇迹！【31】



大寨公社的农民兄弟们，在陈永贵的带领下，用双手和简陋的工具做出了比一些农业机械化了的地方更高的成绩。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即使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寨也保持了平均亩产385公斤的水平，有的梯田的亩产量竟然超过500公斤。不仅没有人挨饿，反而每人向国家上交余粮400多公斤。1964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通讯《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在大寨的影响下，受灾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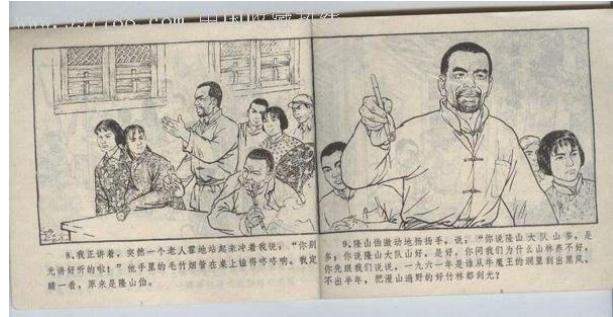


自然灾害期间，大寨也保持了平均亩产385公斤的水平，有的梯田的亩产量竟然超过500公斤。不仅没有人挨饿，反而每人向国家上交余粮400多公斤。1964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通讯《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在大寨的影响下，受灾严重

的河南省林县人民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了一条“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困境，创造出了高产稳产的农田，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32】

两弹一星的科研战线的人们，在同样艰苦，苏联又中途撤走所有专家和资料的情况下，创造了核武器研究的记录。诸如此类的巨大成就还有很多：第一台国产万吨水压机，南京长江大桥，第一艘国产万吨轮，第一艘气垫船，歼-7，强-5……这些无不顶着巨大的困难完成的出色杰作。有了以上这样伟大的成就，无产阶级终于在撤退中站稳了脚跟。

由于大寨公社的成功，无产阶级在农业集体化上重新恢复了信心和力量。无产阶级已经吸取了大跃进失败的教训，开始以大寨为模板，努力重新恢复工农联盟。1961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目前在个别地方出



现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类地方，应当通过改进工作，办好集体经济，并且进行细致的说服教育，逐步地引导农民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1961年底至1962年上半年，全国各省、区都发出了制止包产到户的指示。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力主继续实行三自一包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被解职。3月，新的安徽省委常委通过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提出要将“责任田”在1962年内大部改过来，其余部分在1963年改过来。在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他对单干风提出了严厉批评【33】。

走资派又在三五计划的制定中百般打压工人阶级。但通过暂时的撤退已经大大缓解了的无产阶级利用修正主义苏联的军事压力，保住了国防工业的计划。但走资派依然通过压缩建设投资的方式制约了无产阶级力量的进一步扩大【34】。此外，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在工业领域还开始全面推行临时合同工制度【35】。

无产阶级在工业战线首先要解决领导权问题。走资派基本控制了各大国企的厂长等重要职位，无产阶级又缺乏足够的符合条件的干部接管国企领导权，那么就不能继续沿用苏联马钢宪法的模式，必须另辟蹊径。1960年，鞍山市委向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对该报告的批示中，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即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把这些原则称为“鞍钢宪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这些经验，正是一线工人们在实际生产中摸索出来的。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前十条”对“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在理论上确认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5月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

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防止在中国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走资派也做出了反击，利用这一运动打击异己，攻击无产阶级基层群众。11月，刘少奇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实际上却靠着同来的一万多人的工作组用枪大肆逼供，将公社书记吴臣、副书记赵树春等人开除党籍予以批斗。同期，大寨公社书记陈永贵等全国其他地区的大批无产阶级基层也纷纷被走资派批斗。矛盾进一步激化了【36】。



中央在1964年12月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正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运动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出判断，认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会议形成一个“十七条”的文件（后来补充修改为“二十三条”，在1965年1月下发），提出运动的重点是

“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会上有人提出，可以在必要时抽出一部分生产时间，甚至于停工一个时期集中搞运动，以打击走资派。周恩来却用维持生产的名义坚决反对这种意见。

四清运动是无产阶级力量初步恢复后的试探攻击。这次攻击，初期有一定进展，但随即被走资派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并没有解决问题。但在四清运动中遭到走资派打击报复的广大支持无产阶级的基层也表明了力量的恢复。这场运动成为了文革的预演，在运动中无产阶级基层的力量被高层先锋更加充分的认识到了。

同期，毛泽东又再次就三五计划的制定工作进行斗争。1965年1月，中央组建了“小计委”专门负责拟定三五计划。9月，再次制定了三五计划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提出，“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必须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内地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生产能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提纲重新将工业放在了发展的第一位。但周恩来在会后依然将计划的重点放在农业上，并暗示走资派基层在实际执行中继续按照农业第一、压制工业的路线实行【37】。

【小结】

1957-1964年，中国阶级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要大跃进，就必须人民公社化。资方在这一阶段中主要通过两种手段攻击无产阶级：降低计划指标、压缩建设投资、削减工人编制，以及“左”倾浮夸风。浮夸风对无产阶级造成了尤其严重的打击。工农联盟因浮夸风问题受到了沉重打击，濒临破裂。党在农民中的威望大大降低了。农民阶级的政治立场迅速分化。农民的自发性开始占据上风，一些人要求恢复单干。无产阶级在这一阶段先胜后败，但依然保住了底线。资产阶级的力量得到了迅速提升。

经过基层无产阶级的努力，工人终于站稳了脚跟，逐渐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并重新稳固了工农联盟，随后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资无双方各有胜负。

【注释】

【1】会议决定：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百分之六，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一百七十多亿元减到一百四十七亿元；双轮双铧犁产量由五百万部减到三百五十万部。会后，还责成各工业部门、有关的交通运输部门分别节约钢材百分之四、百分之二点五。

【2】到四月上旬，“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走资派头目薄一波对此回忆：“不少地方由于劳动力增加和对‘右倾保守’的批判，下面普遍要求多生产，多建设，而上面却不敢将物资供应紧张情况向群众交底，因此工作很被动。”

【3】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根据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的意见，决定从六个方面开源节流，来缓和供需之间的矛盾：一、增加生产。全国再增产钢材二十万吨、水泥三十万吨。二、厉行节约。双轮双铧犁的生产由三百五十万部再削减到二百五十万部，以节省钢材七点二万吨，铁道部减少钢材用量五万吨。三、争取进口。四、减少出口。五、普查库存。六、互助调剂。十四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使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相结合。”

【4】胡乔木回忆说：“一九五六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5】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召开，是苏联历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上苏联资产阶级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恶毒攻击并全盘否定斯大林同志，还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度”的“三和”修正主义理论。会后不久，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同志在莫斯科突然猝死。苏共二十大对世界共产主义形势和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标志着苏联走资派正式夺取苏联政权。苏联从此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贝鲁特同志去世后，波兰资产阶级迅速夺取了党和国家的权利。波兰修正主义头子哥穆尔卡被释放并成为了党的总书记，大力推行资本主义复辟政策。1955年下半年，由于波兰政府改变工资制度，约有75%的工人工资下降。波兰走资派同时向先进工作者征收过高的奖金所得税，后来虽然得到纠正，但却迟迟不予退款。1956年6月，波兹南市采盖尔斯基工厂(斯大林机车车辆厂)的工人不满而罢工，还提出改革工资制度等要求。修正主义当局拒绝了波兰工人的正当要求，并用军队镇压了波兰工人。反对镇压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被解除武装出境，波兰彻底沦为修正主义国家。

同年10月，受波兰影响，匈牙利资产阶级在首都布达佩斯发起游行，反对计划经济和集体化。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拉科西·马加什果断予以镇压。但随后消息传到苏联，赫鲁晓夫利用这一事件，以驻当地的苏军向匈牙利借机施压。拉科西·马加什被迫辞职，后他和他的战友被开除出党，押解到苏联终身监禁。匈牙利在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干涉下被资产

阶级夺取了政权，成为修正主义国家。

1957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8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莫洛托夫在《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论列宁”的长文。他认为：“斯大林在解决如此重大和复杂的历史课题时，出现个别错误——有时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党在过去的政策总体上是一贯正确的，是忠于列宁主义旗帜的。”这是反攻开始的信号。6月18日，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利用赫鲁晓夫的两位亲信缺席的机会，对他步步进逼。从人数上看，莫洛托夫集团占据明显优势：到会的11名主席团成员中，有6人是坚定的反赫鲁晓夫派。结果，主席团以7票对4票通过了要求赫鲁晓夫辞职的决议，并计划在会议闭幕前推举莫洛托夫为第一书记。

然而，走资派迅速发动了反击。莫洛托夫等人没有立即向全党和全国通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也由于没有足够的兵权没有逮捕赫鲁晓夫，反而准许赫鲁晓夫进行自我辩护和“检讨”。赫鲁晓夫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一面在会上检讨自己的错误，一面授意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和国防部长朱可夫把全体中央委员火速接到莫斯科，对主席团发动反击。4天后，分散在各地的中央委员们乘坐军用飞机，先后抵达莫斯科。走资派在中央委员会中拥有人数优势，朱可夫还调集了大批精锐军队进入莫斯科。走资派随后在武力保障下大获全胜，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谢皮洛夫四人开除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苏联无产阶级反击失败，先锋队随即遭到赫鲁晓夫残酷清洗。当清洗完成后，苏联修正主义彻底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6】在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稿和“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时，周恩来再次面对如何处理两个稿子中多次出现的“多、快、好、省”的问题。在最初的修改稿中，他仍然保留这个口号，而在后面加写了“又安全”三个字。这时，他把这个口号作为需要斟酌的问题，在书面意见中提了出来。因为一九五六年初以来，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斗争的持续开展和急躁冒进情绪的严重存在，“多、快、好、省”口号自提出后，人们看重和追求的往往只是“多”和“快”，而忽视“好”和“省”，并且常常以牺牲“好、省”为代价来求得“多、快”，这个口号没有发挥它预期的积极作用。根据这一情况，周恩来等经过再三斟酌，把两个稿子中原来多次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删掉了。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再提“多、快、好、省”。批评反冒进开始后，不提这一口号被指责成反冒进的“三大错误”之一而屡屡遭到批判。

当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时，周恩来在书面意见中提出一个重要主张：在第一部分中增加“谈几个大的经验教训”，并且强调基本教训是“均衡发展，综合平衡”问题，原来的报告稿对“困难谈得不够”，这是报告稿起草过程中所作的一次重要改动。

——《周恩来传》

【7】编制一九五七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由刚刚成立、主管年度计划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从一九五六七月起开始编制的。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二百四十三亿元，比一九五六年的投资额又增加一百零三亿元。当经委把投资额压到一百五十亿元时，就受到各部门、各地区的强烈反对，不同意再往下压了。经委再次根据财政、物资和市场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平衡，发现即使压到一百四十亿到一百五十亿元仍显得偏高。

周恩来和陈云等有着共同的认识：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是使积累和消费关系正常与协调的根本途径。基本建设规模不往下压，积累率就下不来，财政支出必然会继一九五六之后再度出现较大赤字，物资紧张程度在一九五六已过多动用储备的情况下会更加严重。一句话，必须把各部门、各地区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坚决压下来，而且要压到明显低于一九五六年的投资额。

但是，个别与会者仍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定得高一些，说：一九五六年的计划是冒

进了，但又因为执行计划时松了，“结果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为了适应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计划“出了些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

——《周恩来传》

【8】1957年，柯庆施在上海市委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支持激进的建设步伐。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说自己是反“反冒进”的，还对周恩来等人说：“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指柯的报告）吗？”周恩来等人被迫做了检讨。柯于1958年起历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

【9】他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他申明：多快好省、四十条、促进会必须恢复。此外还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10】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11】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报告，提出1962年钢产量可以达到1500万吨，十年超过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是比较现实的设想”。王鹤寿后来又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5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12】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到“人民公社”的名字。同年8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赞扬人民公社好。9日，毛泽东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立即传遍全国。

【13】毛泽东批阅规划，说：时间似乎太促，只3年。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也可。

【14】详细见附表1

【15】相关文件见附图2。

【16】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宣称5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6月11日，河北魏

县六座楼公社，亩产 2394 斤。6 月 16 日，湖北谷城，4353 斤。6 月 18 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 斤。6 月 21 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 斤。6 月 23 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 斤。6 月 30 日，河北安国，5103 斤。7 月 12 日，河南西平，7320 斤。9 月 22 日，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海拔 2797 米的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亩产 8585 斤 6 两，成为当年夏粮小麦亩产最高。

秋粮收割时的卫星更加夸张。7 月 12 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 斤。7 月 18 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 5806 斤。7 月 26 日，江西波阳，9195 斤。7 月 31 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 斤。8 月 1 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 斤。8 月 10 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 斤。8 月 13 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 斤。8 月 22 日，安徽繁昌，43075 斤 9 两。9 月 5 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 斤。

1958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新闻《邓小平李富春视察辽吉黑三省时强调说 东北要大挖潜力支援全国》中说：邓小平同志视察了哈尔滨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双城县的幸福人民公社、盖平县的太阳升人民公社，并听取了三个省的农业情况的汇报。小平同志指出：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按常规来说，同过去来比，是有进步的。但是，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 100% 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就还没有翻身。（附注：亩产约增长 20-60 公斤左右）

【17】钱学森却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宣称：“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 30% 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 20 多倍！”[钱学森，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 年 6 月 16 日]

李锐回忆说，1958 年 12 月他问毛泽东怎么会相信那些卫星产量时，毛泽东回答说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ISBN 9787806132180]。

【18】“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党内通信》，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19】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修正主义正式上台，赫鲁晓夫用对华工业援助威胁，逼迫中国暂时支持他在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到1958年，双方的矛盾由长波电台事件引爆。后苏修声称对中印边界冲突中立，并撤回了援华专家，中止了工业援助。1960年4月22日，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公开点名批评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则指向赫鲁晓夫。6月底苏共在五十多个国家共产党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抨击中国的大跃进，试图在理论上压服中共。

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大会上，以及1961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修否定斯大林、主张“两全路线”，还公开批判坚持正确路线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教条的斯大林主义，号召推翻霍查。中共当场予以严厉批评与驳斥，且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中共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中国认为否定斯大林是丑化共产主义运动，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苏联则认为要解除个人迷信给苏联带来的沉重影响，让苏联更好地发展。1961年底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断交。

1963年3月30日，苏修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修的“三和”、“两全”和“三无”的修正主义总路线。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修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日，苏修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复信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为此，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发表了九篇评论苏修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顶峰。中共认为在苏联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中国和苏联以及华沙条约国家的共产党划清界限。中共认为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则是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中心。

【20】1960年7月，赫鲁晓夫催逼中国政府还债。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曾给予中国政府一些贷款。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向苏联购买的武器，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共记人民币58亿余元。其中大量贷款是购买武器的费用。赫鲁晓夫妄图以此卑鄙手段压夸中国共产党。当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时，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

——《周恩来传》

【21】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披露，1963年5月1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名古屋西港的途中触苏岩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1.3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等。而青岛港离东营、滨州等山东粮荒重灾区仅有二百公里。

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日子里，从五十年代以来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向香港市场供应鲜活冷冻商品的运输工作却一天都没有中断，并且得到逐步的改善。为解决货物运输中出现的问题，减少损失，铁道部和外贸部想了很多办法。1962年8月，开通了由武汉江岸车站直达深圳北站的向港澳供应鲜活冷冻商品的751次首列快运列车。当这趟列车开行一百列之际，周恩来指示铁道部和外贸部，“由上海、南京至深圳也应组织同样的快车”。根据这一指示，12月11日，铁道部又增开了分别由上海新龙华和郑州北始发的753次和755次快车。至此，向港澳供应鲜活冷冻商品的三趟快车体系正式建立。三十多年来，这三趟快车成为保证港澳供应的“生命线”。（附注：这些鲜活冷冻商品，以当年港澳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完全消费

不起的。)

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给予知识分子特别的关心，他请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起草了对在京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的有关报告，尽可能使他们多获得一些营养。而同期煤矿井下矿工粮食定额是每月 60 斤，普通煤矿工人定额是 45 斤，且大多都是粗粮，其他副食品如肉、酒、糖等供应也很少。

【22】这一时期的会议，整个来说，纠“左”的呼声比较强烈，但是对形势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华东组的讨论中，就有人提出：不能认为“大跃进”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指标越低越落实，实际上是以落实掩盖保守思想。

注：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23】1956 年 4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一文。文章介绍了安徽芜湖地区、四川江津地区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生产队向管委会包工包产，生产组向生产队包工包产的办法。文章认为“把一定产量的任务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是完全对的”，理由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如果只有生产队包工包产，生产组和社员不包工包产，这就产生了问题，也就是社员只顾赚工分，不关心社里的生产”。

邓子恢的工作搭档、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认为：这篇文章能发表在极具权威的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反映了当时许多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内心要求和实践经验，并非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有普遍意义的”。

《人民日报》1956 年 10 月 19 日又发表了集体路线的文章《包产不可包到生产小组》：“生产队是合作社劳动组织的基本形式；生产队固定了土地，固定了劳动力、耕畜及农具，可以向社承包固定土地上的一切工作，可以发挥生产队的经营积极性”。同时指出“如果包工包产到生产小组，会有几种不好的地方，例如，小组单位多，分散了社的领导力量；各社耕牛、农具一般不多，包到组不好搭配，不够用；小组范围小，劳力不好搭配，包了以后各小组的本位思想会更严重；小组抗拒自然灾害的力量小，妨碍水利统一使用；遇到天旱或久雨，就会发生水利纠纷”等。在文章结尾，作者提出，“生产小组和社员个人可以包工，但不可包产。这是集体劳动下的分工协作，可以使生产小组和社员在生产队的统一领导下更好更快地完成生产任务”。

1957 年 10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稿件《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做法》。文章指出：“包产到户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的路线错误”。文章认为“包产到户受到富裕中农的欢迎和拥护，其危害性很大，是带着合作社帽子的合法单干”。

1957 年 10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南成的文章《调动农民什么样的积极性》。文章指出：“问题是很明白的：一方面是大多数贫、下中农要求坚持集体生产，一方面是少数富裕中农要求包产到户、分散经营”，而“这正是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文章尖锐批评“温州专区个别县委领导干部在集体生产中迷失了方向”，“包产到户所调动起来的只是少数富裕中农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却遭受了挫折”。

【24】周恩来认为，首先要满足生产的需要，要减就减基建。他说“只有这么多米，只能做这么多饭。这样调整的结果，一定要有一部分厂血淋淋地下来，那没有办法。如果现在还不下决心，将来赤字一定出现。因为将来工业的欠款都是要转到财政上的，现在已经看出这个情况了，如果还不解决，就有点犯罪的样子。所以，非当机立断不可。”

对一些临时被召上山汇报工作的人，周恩来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担心他们不明情况，说错话，受到冲击。袁宝华回忆：“那时我在冶金部工作，国务院通知我上山汇报全国钢材平

衡情况。上山后的当天晚上就参加了国务院各部门到会人员的会议，周恩来及时向我们讲了会议发展的情况，给我们打了招呼，使我们避免了在那样一个政治风浪中犯‘错误’。”

对在会上比较激烈地发表过反‘左’言论的各部委一些负责人，周恩来、李先念指定他们立刻返回北京。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回忆：“于是，我和段云、陈国栋等同志都悄悄地回到北京。显然，恩来和先念同志是在保护我们。”

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计委、经委、建委负责人开会，对工业、基建、运输、财政、金融、粮食等工作做了全面安排。他特别指出，钢铁指标和基建项目过多，出现了一些不平衡，比例关系失调，所以要削下来。

——《周恩来传》

【25】七月十七日刚刚上山的林彪在发言中措辞激烈，说彭德怀有“野心”，并指责他的那封信是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泽东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林彪的“这个发言很厉害，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常委会决定，中央全会的任务就是要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分裂而斗争。斗争的对象不仅仅是彭德怀，而且包括支持他意见的人，如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

7月22日，柯庆施等人向毛泽东提出“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和毛泽东的。

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称他们“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毛泽东还提出了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从此，庐山会议由反左转为反右，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批判。

7月31日和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两整天会议，对彭德怀进行批判。会议认定彭德怀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宣称彭黄张周四人结成反党集团，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

8月16日，全会通过会议公报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最后彭德怀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中写道：“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毛泽东总结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附注：林彪此时受此前反对朝鲜战争和因病休养的影响，一直没有实际负责具体工作。庐山会议后，9月17日，由毛泽东提议，林彪接替彭成为国防部长。26日，林彪、贺龙成为中共中央军委第一、二副主席，开始掌握军队实权。这时开始，林彪将其部下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黄永胜等人安插在军队的重要位置。但林始终拒绝在军队中推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路线，始终把持军队权利不放手。

【26】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第一次发言中主要谈过渡时期的问题。他说：中国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个过渡时期要贯穿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任务是两句话，“把革命进行到底”，“生产力不断提高”。

周恩来说：“要把毛主席的著作前后贯穿起来看，至于整理毛泽东思想，要靠秀才，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的党的领导人来总结。”

——《周恩来传》

【27】信阳事件是指从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及周边出现的人为的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其主犯系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这一事件沉重打击了党在农民中的威信。中央掌握了有关线索后，派人进行深入调查，信阳事件得以揭露。和这次事件相关的 13 万干部被审查、983 人被撤职，275 人被判刑、县级以上干部 50 人。但是，没有一个主犯被处以死刑，吴芝圃和路宪文在复辟后均被平反。

1958 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基层党员、干部。经过这一事件，走资派吴芝圃基本完成了对河南省的控制。

在吴芝圃等走资派的操纵下，当时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首先放了卫星，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 3200 多斤，随后其他公社纷纷放卫星，大量虚报产量。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质疑这虚假的产量，路宪文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王直接谎报情况。当《人民日报》也开始刊登放卫星的新闻后，河南省委就开始大力批斗那些敢于说真话的同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 12000 多人次。

庐山会议以后，信阳地委就旱灾问题召开农业会议，**地委 9 个常委中，8 个人认为 1959 年农业生产比 1958 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 72 亿斤，而 1958 年不过 56 亿斤。只有张树藩反对，路宪文就组织走资派批斗张树藩是“右倾”。但张树藩有人民支持，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他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过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会后，省委仍按 1958 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信阳地区又完成了 16 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1959 年 11 月间，地委书记路宪文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在公路旁边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时，他不仅置若罔闻，还下令要地区的公安部门，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这个被走资派控制的地委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张树藩经过调查，发现遂平县超征购了 700 万斤粮食，就让县委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他当机立断，由他承担全部责任，没有找被走资派控制的省委就果断放粮，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他还让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张树藩同志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腿产粮食。其实就上边一层稻子，下面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

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 12000 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23 个党员饿死了 20 个，剩下的 3 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庐山会议后全国反对包产单干，此前在信仰主推包产单干的地委负责人不敢承担责任，就把锅往下面推。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马就直接杀人灭口，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张树藩此时被地委认定犯有四条严重右倾错误，被地委软禁，不再参与任何会议、工作。秘书余德鸿也被撤职批斗。尽管如此，群众在批斗时也都对张树藩充满同情，从不对他说一句重话。

到 1959 年 11、12 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走资派对此无动于衷，就是不愿意放粮救人，更不愿意停止浮夸！

1960 年 3 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来信阳检查灾情，张树藩陪同到息县和淮滨两县察看，所到之处，举目凄凉，哀鸿遍野。这位处长向张树藩询问，灾情如此严重，到底饿死人没有，张答：有，而且还会少。信阳事件的黑幕由此初步揭开。但吴芝圃仍企图捂住盖子，不过愿向中央报告实情。4 月，吴芝圃对路宪文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7 月，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但处理不痛不痒。会上路宪文作检讨，只对罪恶特大的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实行逮捕法办，以向中央交代。

中央的工作组的调查报告撕掉了走资派的画皮：信阳地区全区总人口 8086526 人，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 10 月，死亡人数 1071 人，占总人口 2.4‰。死亡人数超过 100‰ 的有 7 个县：光山县 235‰，商城县 209‰，息县 204‰，正阳县 196‰，新蔡县 183‰，潢川县 168‰，固始县 147‰。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十二个中学，有八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的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即达二十八人。但由于走资派的保护，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吴芝圃，在作了几次检讨以后，于 1962 年 5 月调离河南，改任中南局第二书记。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仅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河南当地未受惩处的走资派继续大肆迫害无产阶级基层先锋。吴芝圃在走前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杨在 1959 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张树藩等人虽然极力反对，但仍未改变局面。

群众对此看的是很清楚的。河南流传有民谣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兰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

【28】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时指出：“建设时间还太短，认识不足，要经常总结，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一点。不要隐讳我们犯的错误，只有抓紧总结，才能及时指导。”

他提出，在议论计划时“留有余地可以多一点，不要打得太满，中央和地方都不要打得太满”。谈到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时，毛泽东说：“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决不可以打得过高，以至于超不过……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

周恩来建议降低粮食、棉花和养猪的指标。刘少奇说：“完全赞成指标这么改”。邓小平也认为“这次会议提出争取主动，是很大极大的好事”……正如邓小平所说：“真正决定问题的，就是我们在座的人。”

——《周恩来传》

【29】“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自留地、包产到户的实行，相当于将人民公社的大生产倒退回农业小生产的联合。自由市场、自负盈亏的实行，实际上就是恢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三自一包的实行，实际上就是在农村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

“四大自由”是指农村中允许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自由。这项政策在农村实际就是在大力鼓励资产阶级的发展。借贷、租赁自由为资产阶级富农提供了资金保障，雇工自由提供了劳动力，贸易自由提供了市场。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这项文件让全国范围内包产单干迅速抬头。

周恩来提出：要压缩一批城市人口回乡，这项工作应该立即着手准备，而且要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去做。我们希望从今年麦收开始到明年，争取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压缩一千万以上的人口回乡，这对于减少城市的粮食压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会起很好的作用。减人这条措施十分重要，正如陈云所说：“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

(附注：走资派用粮食不足的借口削减工人数，但越是商品粮不足，难道不是应该去加强集体化、搞农业大生产吗？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越是提倡单干，越是缺少商品粮。)

在伯延公社调查过程中，周恩来发现，社员最不放心的是多征购粮食，害怕挤掉他们的自留地。社员们要周恩来当场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再不要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周恩来认为：“既然摸点，总要摸出个情况来，总要给他一点合理的保证。”所以，他当着地委、县委、社委的同志说：“我可以保证。”

【30】1961年初，党依然想在钢的问题上超英赶美，因而产量指标还是定在了1800万吨，同1960年基本持平，其他如煤炭、木材、粮食的指标也相对较高。但轻工业从1960年起，重工业从1961年起急剧下降，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40%多。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口头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里，刘少奇虽然讲的是“我们”，是以自我检讨的形式批评党内长期形成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框框，但他的批评在客观上却有着强烈的指向性。众所周知，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

成绩和缺点错误的首创者是毛泽东，而且讲得最多的也是毛泽东。

周恩来提出，要解决问题，根本的方针是“从城市压人口下乡”。他说：人如何压下去呢？“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三年压两千万人，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陈云十分赞成周恩来提出的方针。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声地为三面红旗辩护，直言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的多，弯路会弯得小些。”林彪身体向来不好，不耐繁剧，但当场足足讲了两个小时之久，林彪讲完话，毛鼓掌叫好，并要求刘少奇整理记录下来。1月30日毛泽东接着林彪讲话，在七千人大会发表即席演讲。在3月20日，毛泽东还亲自修改林彪发言修订稿，前后看了三遍。

周恩来主持起草出《关于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六月六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这九条办法逐一作了说明。经过讨论，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城镇减人，必须迅速造成声势。各级党委首先是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亲自领导，进行充分政治动员，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分期进行。只许办好，不许搞乱。

二、全国城镇只许减人，不许加人，特殊需要加人的必须得到中央和中央局的批准。减少城镇人口，必须同压缩城市粮食销量结合进行。

三、中央和地方共同核实城镇首先是大中城市的人口，清查黑人黑户，做到人粮相符。

六、职工的升级、转正和工资的调整，推迟到今年下半年城镇人口减到一定程度以后再进行。

当时，仅东北地区中央就要求精简职工200万，压缩城市人口300万。这个问题牵涉到职工生活，家属安排以及到农村后的住房等问题，都很棘手。再加上为确保鞍钢、大庆油田等重点大企业的充分开工，对于地方所属的几千个小型企业要分别情况实行关、停、并、转，一些地方同志总是舍不得。但走资派说，除坚决调整外，别无出路。

【31】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玉门闯将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于3月25日到达萨尔图车站，下了火车，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纪录是多少，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油井来，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面对极端困难和恶劣环境，会战领导小组作出了学习毛主席《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通过学习，王进喜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矛盾。”1205队的钻机到了，没有吊车和拖拉机，汽车也不足。王进喜带领全队工人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人拉肩扛”把钻机卸下来，运到萨55井井场，仅用4天时间，把40米高的井架竖立在茫茫荒原上。井架立起来后，没有打井用的水，王进喜组织职工到附近的水泡子破冰取水，带领大家用脸盆端、水桶挑，硬是靠人力端水50多吨，保证了按时开钻。萨55井于4月19日胜利完钻，进尺1200米，创5天零4小时打一口中深井的纪录。1960年4月29日，1205钻井队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王进喜右腿被砸伤，他在井场坚持工作。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扔掉拐杖，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房东赵大娘看到王进喜整天领着工人没有白天黑夜的干，饭做好了也不回来吃，感慨地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余秋里得知后，连声称赞大娘叫得好。在第一次油田技术座谈会上，余秋里号召4万会战职工“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

1960年4月29日，“五一”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成为大会战树立的第一个典型，成为大会战的一面旗帜。号召一出，群情振奋，战区迅速掀起了“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的热潮。1960年7月1日，会战指挥部召开庆祝建党39周年和大会战第一战役总结大

会，突出表彰了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他们被树为大会战的“五面红旗”。一个铁人前面走，千百个铁人跟上来。大会战出现了“前浪滚滚后浪涌，一旗高举万旗红”的喜人局面！1960年，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连续创出了月“四开四完”、“五开五完”的好成绩，到年底，共打井19口，完成进尺21258米，接连创造了6项高纪录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果。1960年6月1日，大庆油田首车原油外运。1960年底，大庆油田生产原油97万吨。

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听取群众意见，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成为大家的知心朋友。他看到天冷时工服不保暖，工人挨冻，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加高加厚，给工人做皮背心和皮护膝。钻井生产、生活特别是住房、吃粮面临困难时，他利用工余时间带领职工和家属开荒种地，烧砖、割苇，盖“干打垒”住房，让工人和家属“吃饱肚子去会战”，“回来有个窝”。大队驻地离市镇比较远，工人和家属买粮、邮信、看病都不方便，他又带领职工家属想方设法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豆腐坊、卫生所等，建起了设施比较齐全的生活基地。钻工子女没处上学，整天在荒原上玩耍，他带领人们在大队机关附近支起一顶帐篷，建起了大队级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王进喜，把这所小学命名为“铁人小学”。他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还惦记着钻工们的困难，利用补助的一点外汇特意买了两个“热得快”，带回来给职工烧开水、熬中药。钻工陈国安病了，在大庆治不好，他利用开会机会把他送到省城医院治疗。生产骨干张启刚因工牺牲后，他和1205队的职工经常给他的老母亲寄钱和粮票，一直供养到老。

【32】1953年，大寨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陈永贵、郭凤莲等为带头人的大寨人决心改变落后的面貌，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他们想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储水，除了扁担、锄头、铁锤等最基本的劳动工具，他们拥有的只有一双双布满茧的手。为这个在一般人看来白日做梦般的狂想，大寨人大干苦干，一干就是十年。

1963年3月，山西省召开全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会议再次号召向大寨和陈永贵学习，要求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一面红旗”。《红旗》杂志在1963年第13、14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的社论。7月1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又红又专》的社论。社论指出，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都走在最前线，成为最积极的分子，成为政治上的旗手，再进一步，还要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而陈永贵正是这样的典型。

1959年，林县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旱，境内的4条河流都断流干涸了，已经建成的水渠无水可引，水库无水可蓄见了底，山村群众又得远道取水吃。经过多次讨论，要解决水的问题，必须寻找新的可靠的水源，修渠引水入林县。1959年10月，林县县委召开会议决定把浊漳河的水引到林县来，时任县委书记的杨贵发出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号召。专门研究“引漳入林”工程。工程决定于1960年2月开工，当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县只有150亩耕地、300万元储备金、28名水利技术人员。

红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近十年。该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红旗渠总干渠全长70.6公里（山西石城镇-河南任村镇），干渠支渠分布全市乡镇。据计算，如把这些土石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纵贯祖国南北，绕行北京，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

【33】毛泽东在会上说：“1960年以来，不讲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34】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在会前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提出：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的这番话，引起与会同志的共鸣。大家一致拥护他的主张……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备战。自此，全国备战的气氛日趋浓厚。”

九月，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起草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文件，其中提出通过试办“托拉斯”来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在听取工业工作汇报时，充分肯定了这个意见。“托拉斯”最初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资本集中达到很高程度后产生的垄断组织的一种高级形式。它是产品相同的企业或生产密切联系的企业组成的联合经营的公司，是一种大企业集团。这种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是否能为社会主义中国服务，还需要一个调查研究和在实践中探索的过程。周恩来来说：“用政府名义管理工厂，不利于经营管理。行政命令太多，层次太多，一个中央部门和一个省的部门直接管到企业，单位太多，中间层次太多。我们有大小工业企业十多万个，这种管理方法不容易。相反，把它分散像南斯拉夫那样的自治，分散主义就会大大发展。即使不采取南斯拉夫那样在外汇和市场上自由的资本主义方法，也危险，不利于计划经济。凡是分散主义都不利于计划经济。怎么办呢？我们想采取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组织形式，但是是社会主义方式的公司，按行业自上而下领导。这样完全按照经济的方法来管理，经济核算，改善方法，不要行政命令。”

毛泽东对计划工作一直不满意，要求改变计划方法。在一九六四年九十月间召开过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九六五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建筑工程部部长李人俊、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等成立一个“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小计委”的主要任务是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专心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研究战略问题。

九月二日，国家计委拟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提出，“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必须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内地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生产能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提纲强调在“三五”计划期间一定要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否则就会犯方针性错误。提纲接受周恩来提出的意见，把“三五”计划期间基本建设的总投资额定为850亿元。

【35】刘少奇在196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劳动制度，固定工，有劳动保险，找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以后，我看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

【36】1964年6月刘少奇在会上讲话中，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

某些人了（指毛泽东等），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指无产阶级基层干部），不再强调依靠基层干部。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之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依靠基层。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说，**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白银厂、小站就是搞修正主义。关于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影响了运动之后的发展走向。1965年1月，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光美参与的河北新城县四清工作：28万人口，“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联，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同月中共中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联等神秘化做法”。

【37】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国家计委将这个提纲提交会议讨论，得到通过。周恩来评价说：“这个计划比较来说，搞得落实一些，更实际一些。同时，也把过去这十多年的建设初步总结了一下。所以，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计划。”他还提出根据这一计划进行建设要有重点：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国防，第三是援外，第四是大小三线，第五是基础工业。

周恩来走到哪里，谈起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总是把农业摆在最前面。有些干部在讨论他的讲话时提出，国防和农业哪一个放在第一位？有的干部还问：是否应该修改“三五计划”的指导方针，把以国防建设为中心改为“大力发展农业，突出国防”？周恩来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农业。农业摆在前面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周恩来还提出在农村中“非搞副业不行，要搞多种经营。养猪多的，除了出口、外调，还要自己销一些”。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指出：“**应该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各行各业都应该面向农村，为农业服务。”

——《周恩来传》

附表1：建国以来历年全国职工总人数与平均工资统计表（1952-2004）：

注：其他部分包括私营经济

年份	职工人数（万人）				平均年货币工资（元）			
	总计	国有	集体	其他	合计	国有	集体	其他
1952	1603	1580	23		445	446	348	
1953	1856	1826	30		495	496	415	
1954	2002	1881	121		517	519	464	
1955	2162	1908	254		527	534	453	
1956	2977	2423	554		601	610	547	
1957	3101	2451	650		624	637	571	
1958	5194	4532	662		536	550	470	
1959	5275	4561	714		512	524	430	
1960	5969	5044	925		511	528	409	
1961	5171	4171	1000		510	537	380	
1962	4321	3309	1012		551	592	405	
1963	4372	3293	1079		576	641	371	

1964	4601	3465	1136		586	661	358	
1965	4965	3738	1227		590	652	398	
1966	5198	3934	1264		583	636	423	
1967	5305	4006	1299		587	630	455	
1968	5504	4170	1334		577	621	441	
1969	5714	4335	1379		575	618	439	
1970	6216	4792	1424		561	609	405	
1971	6787	5318	1469		560	597	429	
1972	7134	5610	1524		588	622	465	
1973	7337	5758	1579		587	614	489	
1974	7651	6007	1644		584	622	441	
1975	8198	6426	1772		580	613	453	
1976	8673	6860	1813		575	605	464	
1977	9112	7196	1916		576	602	478	
1978	9499	7451	2048		615	644	506	
1979	9967	7693	2274		668	705	542	
1980	10444	8019	2425		762	803	623	
1981	10940	8372	2568		772	812	642	
1982	11281	8630	2651		798	836	671	
1983	11515	8771	2744		826	865	698	
1984	11890	8637	3216	37	974	1034	811	1048
1985	12358	8990	3324	44	1148	1213	967	1436
1986	12809	9333	3421	55	1329	1414	1092	1629
1987	13214	9654	3488	72	1459	1546	1207	1879
1988	13608	9984	3527	97	1747	1853	1426	2382
1989	13742	10108	3502	132	1935	2055	1557	2707
1990	14059	10346	3549	164	2140	2284	1681	2987
1991	14508	10664	3628	216	2340	2477	1866	3468
1992	14792	10889	3621	282	2711	2878	2109	3966
1993	14849	10920	3393	536	3371	3532	2592	4966
1994	14849	10890	3211	747	4538	4797	3245	6303
1995	14908	10955	3076	877	5500	5625	3931	7463
1996	14845	10949	2954	942	6210	6280	4302	8261
1997	14668	10766	2817	1085	6470	6747	4512	8789
1998	12337	8809	1900	1628	7479	7668	5331	8972
1999	11773	8336	1652	1785	8346	8543	5774	9829
2000	11259	7878	1447	1935	9371	9552	6262	10984
2001	10792	7409	1241	2142	10870	11178	6867	12140
2002	10558	6924	1071	2563	12422	12869	7667	13212
2003	10492	6621	951	2920	14040	14577	8678	14574
2004	10576	6438	851	3287	16024	16729	9814	16259

附图2：关于临时合同工的文件

国务院关于煤炭工业部招工問題的批复

議字第83号

1957年12月4日

煤炭工业部：

你部11月6日“关于临时工問題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問題答复如下：

(一) 你部因生产、建設任务的增加而确实需要补充的长期性的生产、建設工人，可按照国家批准的劳动計劃，首先在本单位、本系統內的多余人員中调剂解决；不足时，可經过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員會批准，从煤炭系統現有較长期的临时工人中轉正一部分，或者由当地劳动部門从矿区附近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內的多余人員中調配一部分。所調配的人員應該是适宜于做煤矿工人和愿意下井生产的，并且必須根据生产需要，及时調配。这样仍不足时，可經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員會批准，在矿区和矿区附近的城市或农村招收一部分。新工人應該經過較長的試用期（須預先訂好合同），而后根据生产需要情况和本人条件才能轉为正式工人。

(二) 临时工是用之于某些季节性或临时性生产的。經常性的生产，不應該招用临时工。你部如因临时性生产而必須招用临时工时，首先應該在本单位內的多余人員中解决；如不能解决时，才可以通过地方劳动部門首先在矿区和矿区附近的城市中招收，仍不能解决时，才可經由地方劳动部門介紹到附近的农村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ajc.cn>

中去招收。在农村中招收临时工必須經過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且和他們簽訂共同遵守的合同。至于外出做临时工的社員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經濟上的关系問題，可按照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規定辦理。

山西省人民委員會 关于合同工、临时工不得轉正的通知

省工祺字第511号

1958年5月13日

最近有不少企、事业单位和市、县工业局、劳动局(科)援引1957年12月省人民委員會轉发“国务院关于煤炭工业部招工問題的批复”的通知，将临时工、合同工轉为长期工人，有的請示准备轉正。該通知所指的轉正工人，系指煤炭系統一部份現有較长期的临时工人而言，而且是一次性的轉

正，其他企、事业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不能援例轉正。因此，凡目前計劃轉正的或正在办理轉正手續的临时工、合同工，均應一律停止轉正。今后亦不得再援例轉正。希即轉知所属企业、事业单位，遵照执行。

山西省人民委員會轉發“国务院 關於煤炭工業部招工問題的批覆”的通知

省工焦字第1172号

1957年12月16日

茲將“國務院關於煤炭工業部招工問題的批覆”轉給你們，並據根國務院的規定結合我省具體情況，特作如下幾項補充通知，希轉知所屬有關單位一并遵照執行。

一、我省各國營礦企業單位應按照國家批准的勞動計劃，可以從煤炭系統現有較長期的臨時工人中轉正一部分。轉正時必須經過細致的審查考核手續，嚴格防止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壞分子混進來，同時，年齡、體格也必須符合井下生產條件，才可錄用為長期工人。為了適應目前煤炭生產的迫切需要，對這次從現有較長期的臨時工人中錄用為長期工人的批准權限問題，可以由當地市、縣人民委員會批准，事後報省人民委員會和省勞動局備查。

二、被錄用為長期工人的戶口和糧食、油、肉供應証，如果不在本企業單位的，應該從被錄用為長期工人之日起，可經當地市、縣勞動部門證明，及時予以供應，隨即將戶口和糧食、油、肉供應証轉到本企業單位。

三、對於招用臨時工人的期限問題，可以根據臨時性生產的實際需要時間，簽訂勞動合同。

國務院批覆中的規定及我省上述幾項補充規定的精神，亦適用於地方國營礦企業。但對季節性生產的小煤礦工人，仍按照季節生產所需要的时间，簽訂季節性勞動合同，不得盲目轉為長期工人。

转载：阶级与左右（完）

【编者按】本文转自红卒要过河的博客，系心在左边跳为代表的搅屎棍派文章。我们摘录其中部分文字，以作参考。受篇幅限制，转载时有删减。

搅屎棍派的文章比较激进，其中充斥着很多对当前左翼的激烈批评，部分语句甚至已经在谩骂。但是，如果仔细研究，搅屎棍派的主张中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对其他左派的责骂，就将其主张完全视为异端邪说，必须批判的辩证的看待。

本期摘录的是这篇文章关于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的部分论述。

本文原文网址已被删除，下为贴吧部分转载网址：

<https://tieba.baidu.com/p/4050705549>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民族资产阶级“举起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右手打倒共产党”的中国梦断了，小资产阶级第三党“反对蒋介石，又反对中共武装起义”（第三条道路）的中国梦也断了，反帝反封的任务就落到了土共的肩上。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或小资社会主义美梦一有机会还要执着地续下去。独立、个性、自由，民族、民主、人性、博爱，是他们的梦呓，自然，根据腰包的鼓瘪，也三分为主动、中立、革命即左中右翼。

1、国统区文化斗争

知识分子是剥削文化的载体，继承维护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这里面装着他们的利益。所以即便如破落户孔乙己，家徒四壁饿得精瘦，也还要穿长衫以区别苦力，也还要向穷比“之乎者也”的装逼，梗着“待人上人”的脑袋，孤芳自赏，顾影自怜，郁郁而终。

梁实秋一再宣扬唯心主义文艺观，“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独创”，“大多数人就没有文艺，文艺就不是大多数的”，“最高的艺术只能少数人能了解……，至于伟大的艺术作品，像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士德》，那自然只有伟大的艺术家们才能欣赏、体会。”陈西滢在《听琴》中说：“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徐志摩说，“去过大英国”的留学生才能“讲他的莎士比亚”，别人“不配插嘴”。吴宓主张文学的“崇高”，奇怪俄国作品“为什么有人要描写一个车夫的事情”，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社会”，以为描写下等人是鄙俗的勾当，——“留学过美国的绅士派，他们以为文艺是专给老爷太太们看的，所以主角除老爷太太之外，只配有文人，学士，艺术家，教授，小姐等等，要会说 Yes, No, 这才是绅士的庄严”（鲁迅）。

同样，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文学青年知识分子投奔延安，倡大、洋、古，奉别林斯基、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以及巴尔扎克、屠格涅夫，穿乌克兰式黑衬衫和圣母式黑长裙，唱宗教赞美诗和资产阶级歌曲《花非花》、《玫瑰三愿》，演《卡豪夫卡》、《海滨渔夫》，骂工农兵听不懂是“水平低”。这才逼出了老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刹住这股资产阶级方艺黑风。可见，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着一样的屁股和脑袋，和大小不同的身板。

中共领导工农掀起反抗国民党的武装斗争的同时，鲁迅们则举起无产阶级文化的旗帜，向资产阶级文化宣战：“胡适之先生等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是穿着皮鞋踏入文坛，现在的普罗运动，是赤脚的也要闯入文坛。”

国民党对土共根据地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文化围剿，武器就是按脸色划分敌我的“民族主义文学”（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主张黄脸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脸的有产阶级斗，应该和白脸（苏联）的无产阶级斗。——“借我三千虎贲，复我浩荡中华，贝加尔湖面张弓，库页岛上赏雪。”当代民族主义左派又为其前辈这一学说补充了证据：当年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兵，大都是穷比出身。

“民族文学”生不逢时，不到半年就被“九·一八”搅了局。注射了民族主义鸡血的群众，竟将目光瞄向东三省，而不是远方的苏联。随着常公编导的“攘外必先安内”大戏紧急插播，御用民族主义文学家潘公展、王平陵们就都做鸟兽散了。围剿无产文化的武器也升级为“文

言复兴”、“尊孔读经”，以及“脱离政治”的“为文艺而文艺”了。

1928年，原新月社的骨干胡适、徐志摩等人创办《新月》月刊，成员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储安平、闻一多、邵洵美等人。他们反对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反对苏联社会主义，把共产党和国民党视为“一丘之貉”，一边表示“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一边主张引英美制度以改良中国政治，实现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可谓柿油民猪之父。

鲁迅不客气地扒了这些民猪的皮子：

『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

……（新月社诸君子）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

当代资产阶级公知，天天控诉57年“反右”运动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使敢言者戒”。看看，这帮老右逼的狗腰明明早就被常公打弯了嘛，他们是带着旧伤进入新中国滴。例如胡适，才刚与罗隆基、梁实秋们出版权《人权论集》，随后就拿着何健的五千元“路费”，到长沙为何健屠杀共产分子和工农群众辩诉：“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胡适：《我们应走的路》）

“为文艺的文艺”，以及“描写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反对文学的阶级性，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梁实秋公开叫嚷进步作家不要“站在劳工劳农的立场”去创作“憎恨剥削阶级的作品”（《关于“文艺政策”》）。新月社成为与无产革命文学阵营相对抗的资产阶级文艺的主要代表，从1927年到1936年，新月派与鲁迅等无产阶级作家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1936年鲁迅逝世，对垒式论战结束。

注意！——“**鲁迅逝世，论战结束。**”鲁迅不是还有学生遍天下么？不是还有左联么？这些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小资文人“同路人”，非但没有继续与资产阶级文艺作战，反而接过新月社的大旗，与右翼文人沆瀣一气，继续鼓吹“为文艺而文艺”、“思想自由”、“人道主义”等超阶级观，以及鲁迅在旧民主革命时期的“国民性”观。这杆资产阶级文艺黑旗被他们扛进了延安，扛进了新中国，几经挫折，最终扛进了河蟹社会。

与新月社并肩向无产文化作战的还有：“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施蛰存和杜衡（苏汶），以及从脱离土共的“托陈”派。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斗争，是整个“左联”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论战。

1931年，胡秋原在《文化评论》上发表《阿狗文艺记》宣扬艺术至上主义，“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标榜自己“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没有一定的党见，如果有，那便是爱护真理”。指责左翼作家“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苏汶接着在《现代》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支援胡秋原，嚷嚷“艺术家是宁愿为着真实而牺牲”，反对政治对文学的“干涉”，并自命为“死抱住文学不放手”的“第三种人”。

1933年，叛变革命的杨邨人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诋毁革命；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以“第三种文艺”，搅无产阶级文艺的屎，“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

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我们也承认着文艺是有阶级性的。”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第三种文艺”，与陈独秀的“不拥国，不阿共”一样，是小资产阶级企图中立于国共阶级斗争之外走第三条道路的梦想，矛头实指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托猪的大旗上虽然也绣着“阶级斗争”的大字，然而旗杆却插在遥远的欧美，反对中国的土地革命。而且，一些托猪分子还与假马列胡秋原们相勾搭，打着马列的幌子，指斥工农红军为“土匪”（陈独秀《论所谓红军》），结果引发了鲁迅、瞿秋白等左翼作家的反击。

鲁迅一勺烩了托猪和“第三种人”：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

“民族文学”派自宫，《论语》派和“第三种文学”派被打的丢盔卸甲，国民党便祭出删帖禁言封号的必杀技，设立书籍杂志检查处，提拔一批吧主编审管理员。于是，反对政治干涉文学的“第三种人”也手握片刀，坐上检查官的椅子。胡秋原还当上国民党“立法委员”，以行动诠释文艺服务于政治。施蛰存后来在50年代与无产阶级的一次战役中，又在姚文元的棍下二次现形：“历史给他提升了一级”——“第三种人”变成了第二种人：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的第二种人。八十年代末，“政治上左翼，文学上自由主义”风起，施蛰存又被挖掘出土，名种荣誉纷至沓来，其中一项是“鲁迅文学奖”。

“第三种人”搁笔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小资产阶级孤立的、不稳定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严重，不能形成坚强的组织，只能在阶级革命中站队。而中共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革命纲领也恰好符合了中小资产的要求（“双半”社会阻断了他们的上升通道），他们得以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资格参加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即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不准备去实践党的最高纲领，形成了新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内同盟者，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右翼反对派，即走资派。同时也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革命队伍：

右倾——从地主资产阶级影响来的投降主义。

“左”倾——从小资产阶级影响来的冒险主义。“左”只是他的前期表现，碰了钉子就开始右倾，即进攻时“冒险主义”，退却时“逃跑主义”。

在1925年至1926年间，群众运动处于高潮时，陈独秀们却右倾保守。到1927~1928年间，革命力量遭到残酷镇压力量锐减时，李立三们竟又激情澎湃，要“饮马长江，会师武汉”、“一省至数省胜利”。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后蒋阎冯桂混战在即，反革命潮流下落，革命潮流复兴之时，中央和地方党却悲观起来，中央发来“二月来信”，林彪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博古中央在白区混得无立锥之地跑到根据地，又被苏区高涨的革命形势刺激得肾上腺亢奋，摆开擂台与常公决战，把苏区葬送殆尽后又顾头不顾腚地逃命——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再加水……“左”右摇摆，正是小资产阶级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与各种“左”、右路线的斗争，是马列主义派与党

内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新民主义时期是次要的、内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主要的、敌我的矛盾。**

毛泽东说：“中国这个党实际是个联合会，是各个山头结合起来的。……我看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很多是因为反帝反封建参加党。”

自鸦片战争以来，许多爱国志士为改变中国而前赴后继：洪秀全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三民主义”，都未能改变中国的命运。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送来了马列。但是，这批知识分子党员，大批来自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真正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的立场是民族主义，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式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下面解剖一下土共党内几位著名人物的灵魂。

（1）周恩来

“经验主义路线”的代表周恩来，上中学时就煮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心灵鸡汤，色香味俱佳，媲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国人都喝过。中年后又无限深情地写道：“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源泉。”

老周和当时的大多革命先驱一样，是为着爱国救国而探索和参与创建无产政党的。1921年1月30日，周恩来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写道：

『“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恃，有所论列。”信中在对比了英国稳健式革命和俄国暴动式革命之后说：“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

先以俄国暴动式革命救中国，再以英国稳健式经验建设中国，“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莫若得其中和”的周圣人穷其一生践行了这个理想：

1964年，提出试办托拉斯的改革企业体制的主张：“用政府名义管理工厂，不利于经营管理。”“我们想采取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组织形式，……完全按照经济的方法来管理，经济核算，不要行政命令。”——这一国企业改革方案被“文革”中断了十几年。

1973年2月26日，在计委的一次汇报会上，严肃地批评了有些人以“左”派自居，随便给人扣帽子，结果使得到欧美等国考察的几个代表团回来后，不敢作报告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他明确指出：“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社会主义国家向欧美学习先进的剥削经济。

明确提出要敢于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1973年在与美国大通银行董事长的谈话中，周恩来特别肯定了台湾的一套做法：

『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我也是这两年费正清教授跟我谈了这个问题我才知道，原来我很奇怪，它的贸易额为什么这么高？一调查，清楚了。它吸收一部分外资，这部分外资当然支持它，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劳动力很便宜。』

创立“特区”，虽然在当时难以实现，但他还是要求有关部门着手研究。1973年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曾半开玩笑地对李强说：“你这个外贸部长不如严家淦，人家在高

雄搞了个出口加工区，把外贸发展起来了。”“我们应当多想点办法。”——谁是“改开”总设计师？

(2) 刘少奇

1924年6月，撰写《救护汉冶萍公司》一文，疾呼：“中国国民呵！关系国民生死国家兴亡之中国最大基础的实业汉冶萍，要停工破产了呵！其速起救护吧！”“日本所需煤铁专赖中国供给，若办理得善，中国即此可以左右日本国势。”又总结了治萍积弊若干：“第六、各厂矿之工程负责人员，多非专门人才，……妨害生产，糜费金钱。第七，机器陈旧，……‘生产率’自然缩小，成本必然加大，更何能与别人竞争？第八，办事人之内讧。……彼此不能合作互助，更或互相制肘，互争意气，互相抵毁，而不重公务。第九，办事人之个人思想太甚。……所做一切都是为个人着想，不为公司着想。第十，组织制度不良……”最长最重点的是“第十一”，单提：

『第十一，工人无公德之涵养，“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人之公德心，由这句古谚可以反衬出来。大的产业之组织，工人上了几千，一切生产品皆由工人手中创造出来，一切机械器具皆操之工人之手，工人为直接工作之生产者，若无一种拥护产业之公德心，则无形中之损失必属至巨。汉冶萍办事人素不注意涵养工人之公德，对于工人教育等事亦毫无设备。……汉冶萍以前所受此中损失，实不堪言。』

同年11月，又发表《整顿萍矿意见书》。献计献策：

『是该公司之主权已因借款关系全部落于日本人之手，所剩者仅“中国汉冶萍公司”之“中国”两字而已。若再添借外债，日本所要求之条件已会要将中国汉冶萍公司之“中国”两字改成“日本”两字。是外债再不能添借，添借外债即亡汉冶萍。（注：到1911年，该公司总计用银3200万两，其中2200万两是贷款，日商占大多数。日商的借款后来都变成了投资。“是汉冶萍三厂，虽名系中国，实为日人也。”）

萍矿工程组织，各部均有密切关系，如有一部分工人，出班太早，……在消极方面严加整顿，固可收一部分效果，但在积极方面设法补救，效果当必更大：一、为教育工人，去其不良习惯。二、为采用花红办法以促进工人工作之热心，略拟如左：二、凡每工头出炭能超过额数百分之五以外，则按其所超过之数，全部赏给花红。三、凡每工头出炭如不足额数百分之五以外，则按其所少之数，全部处罚工资。此外尚须限制工人出班时刻，又近来工头全不负责，应特别严厉工头，对出产负责。（注：出班即下班）

仅就所见略节如此，时机紧迫，惟公司当道，萍矿当道，加意掠夺，努力进行，国家幸甚！国民幸甚！』

1949年，在天津工厂对老板和管理人员讲话：

『听说美国工厂里，厂长、工程师和工人很难分别，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在苏联我看到就更难分别。所以我们工厂里也应该如此。我劝大家放下架子，进工厂时穿工人服装，让工人看和他们一样，就能去掉隔阂。』

小结：整个一张宏良的“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标志性文体。刘工贼为民族企业——引进了外国战略投资的民族企业——真是操碎了心，花大力气研究马列知识，都用来服务资本家了。正如另一位共产党员张贤亮在劳改农场时读《资本论》的笔记，他老婆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一定程度上是张贤亮商业活动的理论指导”。

长期与老刘在武汉、庐山等地进行工运的伙伴丁觉群，在文革中揭发：刘少奇多次接受资本家的吃请和贿赂，然后在审批各基层工会所提出的劳资条件时，将工人增加工资的条件降得很低。河蟹在给老刘平反时，认定丁的材料不真实。可老刘自己在安源就指责工人要求过分嘛。结合刘文及其一生，俺们除了慨叹其始终坚定如一的阶级立场，还能说神马呢？

老刘身兼工业党（实业救国）、公德良知派、法理派的先驱（在安源煤矿嫌工人没有法律神圣观念），与保国保党保国企左逼和保私企右逼惺惺相惜：民族企业汉治萍虽然已被日资参股，但“中国”两字法理上还在，若改成“日本”两字，就没有收回的依据了。老刘要是说了算，革命胜利后莫非还得承认外国条约的法理？一些左派也认为河蟹的“社会主义”法理还在，党的“共产”法理还在，国企的“公有制”法理还在，所以都在保的行列。那私企呢？在一些左派看来，因为其私产神圣的法理在，当然不能没收只能赎买——向右逼频送飞吻，左逼保国企原来是为了给私企当盾牌。“护宪派”左逼没事还攻击右逼“法律党”，真特么乌鸦嘲笑猪黑。

“国家是工人安身之地，工厂是工人立命之所”，刘工头，左逼，右逼，HR，一人扯着这根条幅的一角，向工人灌输“爱国”“爱厂”正能量。老刘还向左逼提供情报：怠工要滑损害民族工业利益以致“国退洋进”的无良工人，都是汉奸、“第五纵队”。

小学上语文课，学到老刘在资本家那里冒着生命危险为工人争取利益的那篇课文时，俺脑海里浮现出的刘工头的高大形像，一下子被老刘这几篇文字屎料给毁了，难怪老龟命们一提红卫兵整“黑材料”，就气急败坏。

（3）朱德

1920年，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逐渐认识到“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行不通”，必须寻找一条新的救国道路。和挚友孙炳文商议，准备出国考察。

1947年，向冀中地区各经济部门负责同志指出：“经济建设是基础。我们打仗为了什么呢？为的是生产建设。土改又为了什么呢？也是为生产建设。”

1949年，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强调：“革命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

1962年8月30日，在日记里写道：“自由市场是农民的需要，开放自由市场利多弊少。”
——小结：救国+唯生产力+市场经济。

（4）彭德怀

彭德怀与一般中共将领不同，他关心的问题远远超出军事范围，还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妇女等广泛领域，颇有军人政治家的风采。

1942年12月18日，致电毛泽东：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民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胜利。

1943年2月8日，在中共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谈话，认为民主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主张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959年，在庐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有什么别的想头。”（《黄克诚自述》）
——小结：民主+富强+人与人。

（5）林彪

抗战时，林彪被邀在延安党校讲马列课，许多人都准备记录，林只说了一句：“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讲完了。”

文革时，他在私底下说：“为省脑力勿读一号（毛）和斯（大林）。”

他的室内张挂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6) 张国焘

1929年冬，党内的托派开始显露，是放弃托派意见以留在党内还是坚持托派主张被开除出党，是托派分子面临的选择。“生活费”是一个制约因素。

王凡西回忆：“党的主要支出，据说是靠列宁格勒党员的全部党费。”托派分子都受过较好的教育，大多从莫斯科回来，著译勤奋。“不仅我一人如此，所有的反对派分子只要能提起笔的，均以译著社会科学来解决生活问题。”张国焘当时对彭述之说：“你还能翻译，如果我出来，靠甚么生活好？”

小结：张国焘没跟着陈彭们分裂，选择留在党内，只是为了混吃喝。红军战士为了吃饭参军的不少，黄永胜回忆当时主动上前线是因为打仗时能吃的好。可尼玛党的高层干部，以无产阶级先锋的名义，在党内混水摸鱼，就是一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

当代屎学家根据老张在鄂豫皖那段屎把他定性为“极左”，这是适应反左的需要。就像林彪，“九一三”反毛反无产专政，八杆子也够不上“左”，明明是极右反革命，可周圣人硬往极左上扯，搅屎如此赤裸，显然是急眼了嘛。据说老周反左未遂，还气得国骂。就算林彪前期，也只是调子高，行动上也是右的：反对文革小组，支持军中保派，教唆陈伯达起草《为把我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报告，只提经济建设，不提阶级斗争，企图往八大路线上拖。这明明跟老周练的是一套拳法嘛，老周的嘴巴也左得狠。据纪登奎回忆，老周在“九一三”后还破天荒地号啕了一场。为毛哭咱不知道，但可以确定，林彪上台，绝不会跟小平有神马两样。关键，林是四人帮的扼制力量。

老张借肃反清洗异己，实为形左实右。肃清反革命，是任何一个革命党的本能。而小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乱斗和宗派主义倾轧，跟左完全不搭边。一些左派喜欢背诵“极左就是极右”，其实是胡嘞。从对革命的损害角度，二者起着同样的效果，但性质却截然相反：前者是革命，后者是反革命。

鄂豫皖真正的极左代表，其实是沈泽民和陈昌浩。张国焘由于右倾的前科，不得不硬着头皮“左”两下，而一旦没了沈的监督，立马又“右”形毕现。1935年，红四方面军打乱“川陕会剿”，控制了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多。在极为有利的形势下，张国焘却悲观起来，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军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出，于是放弃川陕根据地逃窜，然后一路向右直到投降老蒋完事儿。

屎学家把老张弄进“极左”阵营，是掩盖河蟹党“右倾投降”的本质，尽最大可能把一切有历史污点的党内人物都划到“左”边，其实他们都是“反革命不分先后”的一路货。老张只不过比小平们早投降一、二十年而已。资产阶级学者公知褒陈独秀非张国焘，一因老张的一段“被极左”史，二因老张的“投降常公”史目前还不能公开叫好。

(7) 陈毅

解放后，陈毅对《梅岭三章》原稿进行了修改。下面将《梅岭三章》原稿，与解放后公开发表的、我们从课本里读到的《梅岭三章》，作个对比。

原稿：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文革中：廿年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革命花。

河蟹课本：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从“自由花”到“革命花”再到“自由花”，见证了历史的曲折和反复。

(8) 宛希先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的左臂右膀，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在“袁王事件”中被湘赣边界特委杀害。宛希先牺牲前，用炭在墙上留了绝笔诗：“断头今日已成局，煮豆燃箕我未泣。希先之志报国死，悲哉成仁一墙戏”。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角度，俺们对陈其美都持肯定态度，对宛希先当然更不会搞“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的唯心主义诛心一套。俺们也同样肯定民族解放在当时的进步意义，只是指出这首诗只表现了民族主义，没有表现马列主义。

对比一下老毛当时写给王尔琢的挽联，就能看出差别：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农难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解放方甘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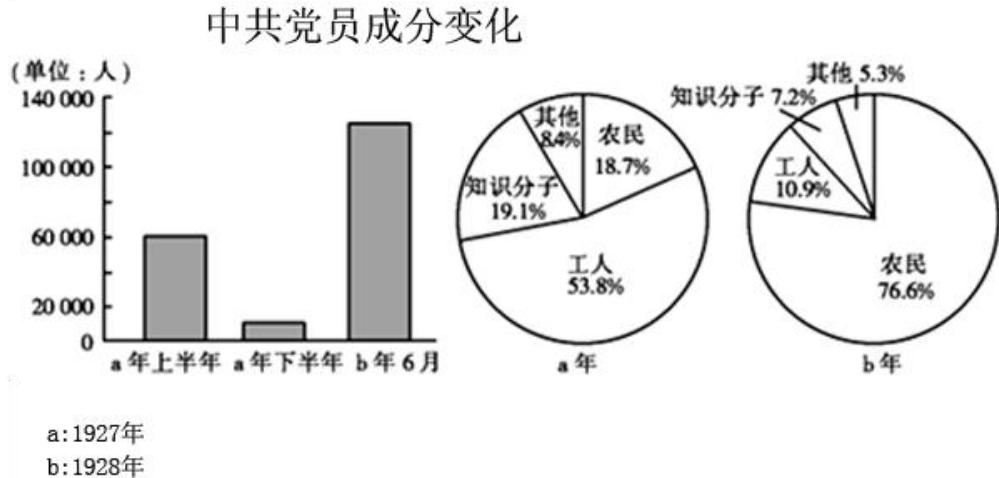
还有方志敏，在狱中写了《清贫》和《可爱的中国》，一直被官方作为正能量选入课本，给小朋友们树立一个伟大、忠贞的爱国楷模，像周圣人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样励志。其实他在给党的信中，作了简要说明：“可爱的中国，则为敷衍敌人们写的，因那时正谋越狱，写这一篇小说，以延缓死刑的执行”。而他的绝命诗“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才和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一样，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灵魂。

总结：自由，民主，法治，富强，爱国，敬业，博爱，仁义、友善……，正是孙中山旧三民主义，常公御用民族文学、复古文学，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派所鼓吹的超阶级一套，即河蟹主义核心价值观。

2、苏维埃土地革命

我们再看一下土共党员成份的几次重大变化及影响：

首先是党员成分变化的图表：



1927年中共五大时，共有党员 57967 人，其中工人 50.8%，军人 3.1%，农民 18.7%，知识分子 19.1%，中小商人 0.5%，其它成分 7.8%。这是党的历史上工人成分的党员比重最大的时期。

由于国民革命的失败，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被杀，加上失联、自首以及叛变的，到 1927 年 11 月，党员人数急遽减少到一万多人。

随后毛泽东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路，党在农村的工作发展迅速，党员队伍的成分构成也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剧增。到 1928 年 6 月，全党人数已增至 40000 多人，其中农民党员占了 76%，而工人党员仅占 10%（大多还是游民及小企业工人），农民党员中还包括富农甚至地主。这是**党在组织上的危险现象**。共产国际和中共一些领导，为之忧心忡忡，担心离开城市产业工人，党会失去无产阶级基础，成为小资产阶级农民党。

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加入土共，壮大了革命的力量，也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造成党内思想混乱，对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带来了严重挑战。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地方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等。

1927 年 9 月，毛泽东把秋收起义的部队引向罗霄山脉，途中人员损失 1/3，士气低落。军事指挥员多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军阀习气旧的一套，妨碍上下一致、官兵一致。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甚至一些小资产出身的党员，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开小差，或叛变。逃亡成为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

毛泽东于是“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成立士兵委员会，民主监督。老毛说：“**我观察过，凡是具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监督。**”——正确的认识不是从天才的脑袋上拍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红军草创，热衷四处游击，攻打城市，走州过府大吃大拿，枪杆上腰窝里都是带给老婆娃娃的好物什。把这样一支“鸟合之众”，改造成一支布尔什维克党军，老毛都感叹“难得狠”。

此外，农村宗族思想、地方主义也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

湘赣边界有土客籍的界限。一是历史的积怨，二是与党组织成员的构成及工农革命军的组成有关。

土籍知识分子龙超清、刘辉霄、谢希安等人较早参加了共产党。他们返乡后开展农民运动，扩大党组织。但其方式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特委书记杨克敏描述：“边区如强征人夫般地招收党员，往往一个村有一个党支部，支部开会的时候，简直就是在开家族会议。”以龙超清为书记的县委和以文根宗为主席的工农兵政府，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土籍。

自1925年起，袁文才、王佐在绿林中崛起，成为客籍领袖。后来，毛泽东团结改造了袁、王部，编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其大部分力量是客籍。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两籍革命派为争权力“轮流坐庄”，红色政权的政府主席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

土客籍党员，往往不是站在阶级的立场，而是土籍一边，客籍一边，进行无谓的争执和纠纷。如宁冈县农民协会捉拿八个在逃的土豪，其中六个是土籍，两个是客籍。结果，土籍出身的党员和群众就觉得土籍吃了亏，不满。

“八月失败”导致边界被烧房屋和被杀群众不计其数。反动豪绅还蓄意挑起土客籍矛盾，不少土籍人反水，带领白军捉拿当过红军的客籍人。当红军大队从湘南回到井冈山时，土籍人便跟着白军逃走。客籍人又借机去反水的土籍家里“割禾、牵牛”。于是土籍农民要文根宗出面说情。一些客籍人又说他包庇土豪劣绅，把他杀害。

中央六大给土籍书生们送来了“左”倾尚方宝剑，——“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于是，土客籍矛盾披上了革命的外衣。朱昌楷们趁毛泽东下山之机，拉拢彭德怀红五军，杀掉袁、王及其部属。宛希先躺枪。

袁、王等一死，其部下投奔国民党，井冈山的大部分群众与袁、王及其部下皆有亲属关系，也随之反目。从此，井冈山成为白区，直到1949年才解放。期间红军几次想收复这一根据地，但由于失去群众基础，都没有成功。

朱德陈毅上井冈后，又成为军中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单纯军事思想和流寇主义的代表，既不认同毛泽东的“党指挥枪”和在党的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等原则，——老朱主张“党军分开”，实行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又与老毛在“红军是单纯地打仗的”还是“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军事外，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党组织等任务）”等建军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

朱德在一些重大事项不行使指挥权，让士兵委员会讨论决定，玩小资的最爱——“由下而上的民主”。甚至敌军都打到村头了，这边还在七嘴八舌，整不出子午卯酉；四军八大“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争论不休，但对一切问题都“毫无结果”。然而还是有不少人觉得这样才民主，才痛快。

老朱还几次甩开毛泽东单干，全都一败涂地。老朱从形式上攻击毛泽东是“家长制”。毛泽东则指出，朱德第一次分兵出击的“八月失败”就是极端民主化的恶果。即：朱德满足了二十九团不愿意在井冈山“饿饭”、要“打回老家去”的愿望，——“饿饭也回家里饿去”。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说：“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反集权)——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

钦差大臣刘安恭的到来，又带来了助长朱德流寇思想的中央“二月来信”，以及“留苏派”对毛泽东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批判，并多次公开争论，导致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撤掉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接替老毛的朱德终于可以自由自主不受制肘鸟。——朱取代毛，的确是民主选举的结果。当时的红四军里，很多是被大革命浪潮所影响的年青人，反专制意识非常强烈，“民主”口号相当时髦。朱德这样的老好人当然得人心了。

朱德先分兵出击闽中，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又分兵进击东江，结果红四军损失三分之一左右，这是红四军在“八月失败”之后所遭受到的又一次重创。刘安恭也在战斗中牺牲。于是军中议论又起，军心涣散，林彪接连三次写信辞职，使红四军产生严重危机。而同一时候，闽西根据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却打开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兴旺局面。

毛泽东群众路线（唯物）和朱德军事路线（唯心）的实践结果对比，以及陈毅从中央带回来的“九月来信”（城市工作的举步维艰，和红军根据地“风景这边独好”的鲜明对比，使中央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路线，但仍然采取两不偏袒的调和主义。），产生了毛泽东建军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古田会议”，会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创建红军和创建根据地的思想，也批判了和稀泥的“陈毅主义”。

毛泽东作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报告，摘要：

『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

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一副担架两个伤兵就抬不成……（建国后，刘邓在农村刮共产风共生活资料）。

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

盲动主义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老毛一边在乡下克服军队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一边还要对付上海中央领导脱离实际而忽左忽右的瞎指挥。

小资知识分子眼高手低，背书专长，实践无能。喜欢当诸葛亮，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们视革命如下棋，工农兵是棋子，没有脑子，也不需要吃饭。——在知识分子的唯心大脑里，可以生出“斯大林用两个师换林彪”的奇葩。老毛在农村调查研究、革命实践时，党的领导们或在洋房里按照公式规划革命，或到国外镀金，一半时间都坐在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上。

旧社会 90%以上的工农群众都是文盲，所以文化人很牛逼，言必称马列，动不动几版几条，把文化不高的工农干部和群众唬得一愣一愣的。例如刘安恭，留德学生，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过军事，一来红四军，就被“土包子”成堆的红军指战员的推崇——带着神圣的光环：中央委派，革命中心苏联归来；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讲起国际国内形势口若悬河……

为解决党的组织成份农民小资产阶级化的严重问题，“六大”提出了“**党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要求各地党组织“**走向大工业中，在那里巩固我们的组织**”，“**吸收广大的积极的产业工人入党**”。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也因此坐上了总书记的位置。

可是，农村有毛的大工业呢？毛泽东早在“三大”就提出：“在湖南工人没几个，甚至比

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还要少，农民漫山遍野都是。”而城市党组织里工人成份党员绝对占优。但由于“左”倾盲动路线，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大批的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以上海为例，党员人数从“四·一二”前的8千人，降至1927年12月的1799人，1928年6月不足1千人，1929年11月1100多人，1931年12月降至700多人，1934年9月，骤降至475人。赤色工会会员从“四·一二”前的82万人，骤降至当月的287590人，1929年又骤降至2102人，1930年为2653人，1931年仅666人，此后人数更少，已无从统计。全国白区的情况和上海基本类似。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伴随着农民成份的党员迅猛上升，工人成份的党员却骤然下降。而且，以后再增加的工人党员，在党内的资历和级别，也无法和前者相提并论。

也正是因为对“左”倾路线的矫枉过正，才使得刘工贼阴差阳错地成为白区正确路的代表。俺发现：一旦某个人被打倒或其路线被否定，曾经反对过他或被他打击过的人就要反正。比如高岗出事，当年在陕北对高“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郭洪涛的老婆就趁机上书，给老郭平反。林彪一倒，贺龙就昭雪，一大帮倒台的老龟命也纷纷上诉自己反对过林彪或被林彪迫害，要站起来。当然，老毛在延安拉老刘作同盟，也是只有刘派可以依靠。那时，周朱彭林们都跟着王明当中华民族先锋队去了。

从前面的史料知道，主抓白区工运的刘工贼吃里爬外，大革命时期向右看齐，和陈独秀情投意合。连陈公博都知道他受资本家欢迎。“八七”会议后，土共到处暴动。老刘却在风景怡人的庐山休养：1927年7月8日，在“七一五”山雨欲来之际，独自一人精准提前7天离汉赴庐，足足养了3个月，成功避开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等所有暴动。这段时间是老刘历史的空白期。而且，老刘还有三次被俘三次毫发未损脱身的传奇经历。

极左冲得太猛，给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打出一片红的毛泽东就成了红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老刘屌事没干却成了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啥都不干当然也就没啥可损失的。这真是干革命的不如不革命的。革命有可能失败，不革命何来失败？老毛与立三、王明们是左与“左”的对立，老刘与之则是右与“左”的对立。老毛用成绩说话，老刘用白卷说话。

刘工头不孤单。老毛当时就指出：“**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一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老刘叫‘长期潜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刘工贼因为右，和老毛绑到一块，都被“左”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这帽子戴在老刘头上是严实合缝的。在老刘的“白区正确路线”（保命哲学）的指导下，白区工人只能老老实实给老板贡献利润，安心等待农民来解放自己了。

无独有偶，小平在红七军最困难的时刻，自己提出回上海汇报工作。**主要负责人离开红军和根据地，这在当时是唯一的案例。**小平也以这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成为“毛派头子”而在后来得到重用。

刘少奇在延安以“正确代表”身份，哇哩哇啦作白区工作长篇报告，当说到“‘左’倾盲动主义是党的一贯的历史的传统”时，白区代表当场就表达了强烈不满：“只反‘左’倾，不看到右倾”，“偏向反盲动而是不动，由非法转向合法，由斗争转向要求，这是只反‘左’不反右的逻辑而形成批准了右倾”，“很多问题我们不同意，所以我们这次无论如何要来中央，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同志的错误，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老刘的右帽不单是“左”中央发的，实乃上下一致拥戴。

会外，代表的不满表现得更加激烈。李雪峰回忆：“有些同志觉得我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辛辛苦苦在下面工作，怎么都错了？”李昌回忆：有的代表“嚎啕大哭，说：以前死的

同志白死了？”还有 16 个代表联名写了意见书。

老刘一直追着工人屁股纠“左”，反过来却辩称：“少数先锋队可以不顾广大群众还没有跟得上来的事实，就实行冒险的进攻，反而骂其他的人为‘右倾机会主义’。”再看方志敏的《在狱致全体同志书》，主动检讨了闽浙赣苏区在 1931 年至 1933 年顺利的环境下却没有得到发展，“实不能不归咎于右倾保守主义”，并寄希望于生的同志“坚决的站在群众前面”。——神马叫做差距？

把方同志的原话列在这里艹刘工贼：

『我们临死前，对全党同志诚恳的希望，就是……学习列宁同志“一天做十六点钟工作”的榜样，努力为党工作！积极开展城市工人运动（这是我党目前工作最薄弱的一环），不惮艰苦的进行国民党军中的士兵运动，广泛开展农民运动，争取千百万被压迫的工农士兵群众到党的旗帜之下！

如有那些同志……消极怠工，那简直不是真正的革命同志，而是冒牌党员。这样的人，是忘记了国民党牢里有好几万党的同志，正在受刑吃苦，忘记了国民党的刑场上党的同志流下的斑斑血迹，忘记了我们的主力红军正在川黔滇湘艰苦的战斗，更忘记了千千万万的工农劳苦群众正在啼饥号寒无法生存！』

在王明“左”的错误路线和刘少奇右的“白区正确路线”指导下，“六大”确定的“吸收广大的积极的产业工人入党”目标，成为泡影。

四、抗日战争时期

3、统一战线问题

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到 1936 年，全党党员人数急剧减少到了 25000 人。

党和红军的现状，促使王明从“左”迅速滑向右。

1935 年 8 月，共产国际七大号召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年 10 月，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除蒋介石以外的国内一切党派，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而到了年底，王明在《救国时报》撰文，宣传“联蒋抗日”，把常公也纳入统战范围。

王明比共产国际走的更远，连博古都拒不接受。

面对红军严重被削弱及国内的新形势，毛泽东支持了王明的部分精神，反对了博古的“关门主义”，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王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上的“一致”，只是现象上的一致，出发点和落脚点却大相径庭：老毛是手段，王明是目的。

1928 年 10 月，老毛曾经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里，总结了武装割据的外部条件：

『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此时，导致 1928 年后苏区蓬勃发展的外部条件——“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已不存在，即中国革命形势不再“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如果“比较长期的停顿”在国民党各派军阀联合剿共的状态，财政、粮食已达最后极限的陕北苏区将难以生存。而若要推动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就必须促成国民党的分裂，促成国内各阶级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对八路军发出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此即上述思路。

1938 年，毛泽东又在《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以“**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民族斗争是形式，阶级斗争是内容）观点，间接否定了王明在《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中提出的“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观点。

在瓦窑堡会议后，毛决定立即成立旨在瓦解东北军、西北军的白军工作委员会以统战为手段，首先缓解陕北的危机，继而谋求更大的发展。——对张学良的“统战”，不是某些左派的“跪求”，而是先整师整团地消灭他的人马，粉碎其“先剿共再抗日”的美梦。不久又利用蒋、阎、日的矛盾与阎锡山建立联系。

瓦窑堡会议制定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也否定了王明“联蒋抗日”的主张：“**只有把卖国贼（蒋）统治着的土地，大块的变为苏维埃领土，红军才有依靠，抗日战争才有后方。**”——这也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区别是抢被日军占领的原蒋统治区变为苏区。老毛后来在 1959 年 7 月 31 日庐山常委会上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该决议还发出了一个让民族左逼蛋碎一地的呼吁：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拿自己的榜样和真诚的口号给蒙古人，回人等被压迫民族看，你们也组织自己的国家呵！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卖国贼，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联合起来打倒这个敌人呵！』

这段决议被张宏良翻译成：“30 万红军被国民党杀得只剩下 2 万，白区的共产党人几乎被全部杀光，可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人设定的口号依然是“北上抗日”，而不是去推翻蒋介石报仇，从而使日本人希望国共两党相互厮杀的目的完全落空。这就是中国人民最终选择共产党、选择毛泽东的根本原因。”——现在是资产阶级左派重新选择的时候了。

毛泽东和王明在统一战线操作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出来。老毛力主利用一切反蒋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王明则强调支持老蒋为全国抗战的领袖，坚决反对各地方派的反蒋活动。1936 年下半年，围绕“两广事变”，毛和米夫、王明的矛盾终于公开。

1936 年 6 月 1 日，陈济棠、李宗仁以“反蒋抗日”为由发动“两广事变”，中共闻之立即表示支持，称其具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1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提出“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

然而，两广事变后，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发表社论，谴责事变是“日本人试图煽起中国内战，以便于掩盖对华北新的进攻”的阴谋。7 月 23 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批评中共：“不能说，在政治方面，在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这种复杂的情势下，他们（中共领导）完全成熟了和做好了准备。”又强调了将抗日与反蒋并举是“错误的”，要求中共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重申一切均应服从反日斗争，并建议中共以“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代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

王明则在莫斯科撰文，婉转含蓄地批评国内同志恪守过时的反蒋抗日的政策：“为什么中共不可以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王明：《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

此时王明在党内享有的很高的威望，而老毛在党的领袖地位尚未完全确立，还无力与王明正面冲突，最后只能接受米夫、王明的“逼蒋抗日”方针，以及后来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共产国际于 1936 年 12 月 16 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必须“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并提出“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37 年 1 月 19 日，共产国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批评中共以前对蒋介石采取的错误方针，敦促中共必须“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并且认为中共直至 1937 年 1 月还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共产国际批评中共对“逼蒋抗日”方针阳奉阴违，是指在 12 月 18 日以前，中共中央始终坚持“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的主张。

瓦窑堡会议基于中共的困境，对党的组织路线也进行了战略性调整：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当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论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

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

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

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抗日战争开始，形势对于中共好转，于是又对上述规定作了调整。“**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方针是中共在抗战开始不久提出的。

1938年3月，又专门做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强调“**严防汉奸、托派分子、阴谋家、投机家混入党内**。”1939年1月，又做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沿着这条组织发展路线，迅速壮大，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到1949年底，党员总数已达448.8万多人。其中：工人11.2万，占2.5%；农民267.6万，占59.6%；军人107.6万，占24%；职员49.8万，占11.1%；学生3.6万，占0.8%；其他9.0万，占2%。由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因素，军人绝大多数是穿上军装的农民。

毛泽东说：“**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不下地**”，“**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

河蟹党史把清算“左”的军事路线的遵义会议，称为挽救党挽救红军的一次事件，而对于清算王明等在抗日战争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六届六中全会和延安整风，却轻描淡写或讳莫如深。资产阶级学者公知更因知识分子在延安被改造而如丧考妣。这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没有毛泽东，以王明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小资产阶级，提前40年就戴上三块手表了。

瓦窑堡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的先锋队**”。这句关键的话，是在张闻天起草的决议里。据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说：“如果我们只写《毛泽东年谱》、或《毛泽东思想年编》，这句话可能就不会反映了，因为《大事记》，我们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张闻天起草的决议，也就收进了《大事记》。”

俺知道，老毛是绝不会争这个产权滴，因为他很快就站在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对立面，成为光荣的孤立。而且，文革也批判了刘修养的相同表述：

『中国的赫鲁晓夫抹煞党的阶级性，……声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中最先进的部队”。在这里，他把“**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换成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这难道是几字之差吗？不，这是从根本上篡改了我们党的性质，否定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进部队。

如果象中国的赫鲁晓夫说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中最先进的部队”的话，那么，我们的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了，而是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党就成了一切赞成和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其中包括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党。（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党内便出现右倾投降主义倾向：无原则迁就国民党的反共反

人民政策，主张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红军改编后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等等。用老毛的话说，“**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

资左天师张宏良为蒋委员长涂脂抹粉：“从宋江、岳飞，到后来的左宗棠以及国民党诸多抗日名将，这些人几乎无一不是镇压革命和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可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没有记恨他们，还真诚地歌颂他们纪念他们。”

对于抗战，毛泽东是要再演当年趁军阀混战之机扩大红色区域一幕，壮大阶级力量，使中国革命不断前进，直到夺取全国政权。然而老毛的战略与周恩来及以朱德、彭德怀为首的八路军总部产生分歧。

1937年8月，中共为确定在抗战期间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提出：**国民党反动本质并未因抗战而改变，因此国民党单纯的政府抗战必然失败。这样，中共就要在抗战中起领导作用，进行全面的民族抗战。因此中共必须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和自主。**

周恩来认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只能是相对的，中共不应公开对抗南京的命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共应积极抗战，信守向国民党许下的精诚合作、共同抗战的诺言；“蒋介石既已开始抗战，就决不会中途妥协”。

毛泽东强调，**中共必须把国内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和日军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毛后来批评“百团大战”：“**当时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

周恩来不同意老毛的主张，提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

朱德、彭德怀支持老周的意见。老朱认为在保持中共军事独立性的同时，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应服从南京军委会，这样做好处是，八路军可以从南京得到军饷和装备。朱、彭还提出，中共应与国民党真诚合作，八路军应避免阵地战，但是应进行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争，即“运动游击战”。

结果，老毛处于少数地位，不得不暂时退却。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人的主张却获得了共鸣。——中华民族先锋队浮出水面。

洛川会议一结束，朱德、彭德怀率领八路军迅速开进山西。由朱、彭、任弼时组成的前方中央军委军分会（亦称“华北军分会”），提出了“运动游击战”的口号。

周恩来则赴山西与阎锡山、傅作义达成协议，商定八路军以游击运动战为作战原则。老周还主动提出将派八路军一一五师配合阎军，布防平型关一带，在侧翼待机歼敌。然后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迅速集中徕源、灵丘、阜平地区，依靠太行山发展游击运动战。彭德怀在与阎锡山会见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

虽然周恩来已把“运动游击战”让步为“游击运动战”，但是老毛也没有回复老周要求派兵援晋的电报。而是接连电示周、彭等人，“**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南京只能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对前方的周恩来和红军将领能否执行自己的指示毫无把握，只能靠电报不断陈述自己的一贯主张，以免党内中华民族先锋队员们重蹈“左”中央在苏区的覆辙。

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两电彭德怀，指出“**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

无结果可言的。”

9月17日，毛泽东又以中央军委书记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再次强调：**红军是支队性质，不起决定作用。**

9月25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朱瑞等，重申“**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同日，毛泽东又电朱德、任弼时、周恩来：“**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

毛泽东是要**把长征幸存下来的不到三万红军，当成种子撒出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而周、朱、彭却坚持要用这三万红军配合国民党作战。——当年毛泽东群众路线（唯物）和朱德军事路线（唯心）两种路线斗争的重演。

而党内中华民族先锋队员们，对内表现为右倾阶级投降主义，对外则表现“左”倾冒险主义。就像今天的资左资右，一提穷比革命，就悲天悯人，人道主义，为人民幸福安宁计：“乱离人不及太平犬。”——动了他们的奶酪；而一提钓岛，库页岛，江东六十四屯，立马又露出民族逼铁血本色。——都是阶级利益。

在周恩来的积极策划下，八路军总部命令115师在右翼配合阎军作战，120师从左翼驰援驻守雁门关的阎军。

1937年9月25日，林彪115师在晋东北的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歼敌千余人。林贯彻的是周恩来等关于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及“运动游击战”方针。此前，华北军分会向毛的电报和周恩来向毛泽东、张闻天发出的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均未得到毛泽东的复电。

平型关战役，林彪也付出了“千余人”伤亡的代价。115师属中共精锐，在人数上又数倍于日军，且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形，发动的又是突然袭击。而日军还是一支担负后勤补给的非战斗部队。这样的一场伏击战，居然打了一整天，而结果也只能算**惨胜**。

但这个胜利却鼓舞了周、朱、彭。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在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八路军以“运动游击战”为作战的战略方针，还指出，如果改善国民党在山西的军事领导，加上八路军的积极影响和配合，就可以争取获得“战略上的反攻”，“改变华北战局”。老毛则暂时退却，待10月中旬后山西形势日趋恶化时，开始反击：

10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把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潘汉年的电报同时转抄周恩来，批评“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作斗争”的“投降主义倾向”。

10月17日，毛、张联名致电朱、彭、任并告周恩来：“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又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指示，提出**“投降主义的危险，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的论断。

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报告，重申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指出**党内的主要危险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是右倾投降主义**；告诫每个共产党员牢记“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再次强调毛在洛川会议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问题。还不点名批评了八路军将领中不严格执行军委命令的**“新军阀主义倾向”**。并指出以上问题的社会根源：

『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

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

资产阶级学者把这段中共内部的斗争，作为毛泽东“游而不击”假抗日的证据。——右派在一到这个地方就立马转型为民族主义“爱国贼”，与资左大联欢合奏“主权大于人权”。可见资产阶级已经腐朽得脑生蛆：组织壮大群众力量，从日军手中抢地盘不叫抗日，只有跟着国民党军打大仗才叫抗日。这等于说，老毛在苏区动员群众，建设根据地不叫革命，只有李立三、朱德们出击州府，攻打大城市才叫革命。——反革命公知这时却不骂老毛是假革命了。难怪张贤亮说知识分子“把嘴当×卖”。

其实资产屎学家痛恨的不是老毛不抗日，而是老毛抗日。他们痛恨老毛把红军发展壮大了，而不是把红军拼个精光。国民党早在1927年就投降美英日等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在华代理。他们不也捧着老蒋的臀部舔得不亦乐乎么？

日军与蒋军的斗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等老牌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殖民地的斗争，以前表现为各自的在华代理人——各派军阀之间的斗争，后来日帝亲自上阵，与国民党内亲英美派蒋介石斗，也扶植了自己的新代理——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老蒋没投降是一直等待英帝美帝主子的介入，只是英美当时由于陷入经济危机而无暇兼顾其在东方的利益而已。

要是日帝不亲自操刀，而是坐在东京遥控汪伪斗老蒋呢？在资产屎学家笔下就是内战——他们与法理派资左双宿双飞，关注的只是名份，就像刘修养关注治萍公司的前缀是“中”还是“日”一样，所以才有了煞有介事的砍旗和护旗的撕咬。难道他们是傻逼么？非也。如果妓院老板依据小姐身份证件上的大名“黄花”，向资左资右收处女开苞费，他们立马掀桌子。可见，他们不过是屁股指挥嘴巴，后面都是利益。

而在工农眼里，蒋、日不过是狗咬狗，只因力量少一锅煮不下，所以拉一个打一个。团结老蒋反日，跟团结张学良反蒋没神马不同。老毛后来用“三国志”形象比喻了国、共、日的关系。

老毛若真降了日帝，学者公知得立马跪称毛公。被右逼捧为“驾驭政论的高手和大家”的马立诚，在《中日战争的启示与思考》中指出，“日军在占领这些中国城市农村的初期，尤其是没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区，纪律大多数是比较严明的，而且也确实为占领区的人民作了诸如发放粮食、修缮设施、开办学校、维持治安等方面的好事，而且日本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也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后来由于游击队的出现，使这些地区重新变得不安定起来，因为日军不断遭到袭击。”——老毛毁了日占区的好日子，中断了中国民主的进程，——“满洲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以建立现代法制治国为目标的国家。……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马立诚：《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

资产阶级学者用以上行动教育俺们：从来就没有过神马全民的民族利益。在阶级利益面前，所谓民族利益就是一堆屎。

老毛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之前，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了“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计划，随后，国民党报刊大肆制造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舆论，反共文章连篇累牍。大资产阶级代表老蒋和无产阶级代表老毛，都是以阶级斗争为里，以民族斗争为面，——“资本无国界，工人无祖国”。充当民族先

锋队的是小资产阶级。

毛泽东孤军作战时，高层里只有刘少奇与老毛的观点接近。

刘少奇是党内最早支持游击战的少数人之一。1937年9月28日，在接到毛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三天后，老刘致电张闻天，称已下令平、津党组织“动员大批干部同志与抗日游击分子下乡，发展领导游击”。不久，刘少奇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强调“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

刘少奇对国民党及其抗战的评价，同老毛一样，属于“悲观派”，不同于周恩来等“乐观派”，在是否要配合阎锡山军队打仗的问题上，主张八路军分散打游击，反正太原是保不住的。

然而刘少奇的意见与老毛又不全一致。例如，刘少奇在动员平津党员下乡打游击的同时，还指示“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在1927年11月17日给毛、张的电报中又提出“争取华北游击战争胜利，重复转变为正规战”。

刘少奇与老毛的这些认识的差异，在老毛党内孤树一帜、最需要支持之际，不足以让老毛予以深究。放眼党内高层，当时与毛观点最接近的惟刘少奇一人。

1937年12月9日，捧着尚方宝剑的“学院派”王明回国，召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宣读共产国际“圣旨”，进而检讨抗战以来党的路线。会议通过了王明的“两个一切”（即“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宣言。——王明接了陈独秀的班。

王明在《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中，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不恰当地强调“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指责洛川会议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王明还说，群众运动要取得合法地位，应去国民政府备案；并指出，洛川会议虽主张发动群众，却没有找到发动群众的具体方法，即没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王明批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足，认为国民党由不抗日到抗日、由剿共到联共是根本转变，反对老毛对统一战线中的左中右划分（阶级观），提出“凡抗日者皆吾友，降日者皆我敌”（民族观），**一刷子抹煞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差别、阶级斗争和国共的本质区别。**

王明认为毛泽东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夸大了右倾的危险；毛的提法——“是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也是不对的，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不行的”，只会吓走同盟者。

王明对老毛撰写的1937年11月12日大纲进行了不点名批评，又把刘少奇树为靶子，以影射毛。王明点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对国民党提出的要求“过高”、“过多”，而没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文革时，老刘的女儿指出他在七大的“论党内斗争”，“是他受王明打击后带着个人情绪写的。”

王明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支持。老周也对毛泽东抗战以来的言论进行了不点名批评：四个月来未能推动抗日统一战线更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前“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应公开纠正统一战线中的错误，使友党更加信任和佩服我们。

统一战线令小资痴心不改生死相许，是其两面性决定的。丫本来就是“**小的资产阶级**”，

脑洞里流淌着资产阶级思想。老蒋大义凛然的演讲——“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我们要以无数的无名的岳武穆，来造就一个中华民族的岳武穆”、“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把中共党内小资产阶级的小脑里的民族大义引爆了，使他们对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同类，油然而生血脉于水之情。

相反，老毛在国家危难之际不以民族大局为重，反处处为阶级利益拨拉算盘的龌龊表现（指示薄一波：“天下大乱，到处为王”），也笃定让他们顿生反感之心。所以，他们要急不可耐地用实际行动，在“同胞”面前证明自己不是秦桧，而是岳飞——“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于是有了林彪的平型关和彭德怀的百团大战（彭德怀检讨：“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相信老蒋民族大义超过相信老毛阶级利益”的项英，则直接响应了蒋委员长的号召，在皖南风波亭上做了岳武穆。

四亿人民紧紧团结在蒋公周围，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不正是周恩来等爱国志士梦寐以求的时刻么？——常公在倡导新生活运动的短短讲话中，“民族复兴”四个字足足出现 32 次。中间若不是老毛两次节外生枝，蒋周刘邓的中国梦至少提前 30 年（1945 年，这个梦又做了一次）。河蟹历史剧“民国……抗日……改开”格局，就表达了“去弯取直”的强烈愿望。

小资民族主义的代表，资左天师张宏良又接了王明、周圣人的班，言必称国家民族，文必举屈原岳飞：

——老百姓之所以让秦桧骂名千古而不提赵构，是因为赵构杀岳飞至少还是为了保住国家(尽管这里实际要保住的仅仅是个人皇权)，而秦桧杀岳飞则是为了出卖国家。（张宏良：《千古兴亡，亡于一相》）

——此前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即使被朝廷迫害致死也坚决捍卫朝廷的现象，岳飞就是其中最突出的典型，……而如今则不同，像屈原、岳飞、文天祥等历朝历代都出不了几个的悲剧人物，却如同水银泻地一样流满中国大江南北，成千上万老百姓自发地走上了屈原、岳飞的道路。

——而只有拥有屈原、岳飞、张钦礼等九死不悔的铁血子孙的民族，才是人类社会独有的伟大民族。……象正义之剑同志这样，刚刚走出共产党的监狱，就能够十分理性平静地侃侃而谈，苦口婆心地劝说人们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 年 8 月 12 日）中说：

『“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党内的反映，那是在和资产阶级决裂时期发生的。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三个时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目前这个时期，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了党内一部分人，他们动摇了。』

王明、周恩来在“十二月会议”上的发言，得到了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认同。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孤立，老毛只好少数服从多数，暂时妥协，承认存在王明所批评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的情况，并表示同意王明“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主张，以免再现中央苏区被夺权的一幕。但老毛还是坚持了他一贯的军事战略方针和独立自主原则，坚决不让他们像当年一样把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葬送。

政治局几乎一致支持王明的主张，使王明的影响急剧扩大。会议决定王明将率中共代表

团前往武汉与蒋介石会谈，对内称长江局（王明、周恩来是灵魂），成立由项英任书记的东南分局，直属长江局领导，新四军则受延安和长江局双重领导。

以后，长江局擅自对中共全局性的路线、方针发挥影响，俨然“第二政治局”，造成与延安中央分庭抗礼的事实。王明、周恩来，迫使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得不按长江局的意见办。而老毛在无力正面反击长江局的不同意见时，就以不回复电报的方式对抗。

王明抵汉后，把未形成决议的十二月会议精神写成《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擅自发表，“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在成立地方政权问题上，应事先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1938年1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央书记处，批评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不向国民政府备案而自行成立，“对全国统战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在军事问题上，王、周主张中共游击队应取得合法地位，应抽调八路军主力，积极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1938年1月11日，周、叶致电毛、朱、彭，建议调刘伯承师或林彪师，待日军进攻郑州紧急时，渡黄河参加陇海路西段的战斗。

“十二月会议”的影响超出长江局辖下华南、华中的范围，向八路军和华北地区扩散。

1938年春，彭德怀在八路军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检查过去党“对国民党的基本转变认识不够”，认为“机械地划分某一时期以左倾或右倾为主的阶段论是不正确的”。

陈赓在1938年1月3日的日记中记述：“读德怀同志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之一部，深感过去对统一战线的认识确有模糊之处，以致在运用上发生缺点，而且引起了友党政府发生不必要的摩擦，……抗战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于一切。”

1938年1月，毛泽民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

1938年4月，中共北方局冀察晋边区分局书记彭真在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全国抗战形势和争取抗战胜利方针》的报告，强调“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

1938年5月，邓小平批评了晋中地区的向地主借粮运动，指出这是“破坏农村统一战线”的“左”倾错误。

1938年7月前，彭德怀、杨尚昆、彭真、邓小平在华北部份地区还展开了反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

.....

1938年2月27日，在王、周已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在延安举行了“三月政治局会议”。老周提出应向常公建议确立“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军事方针；王明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提出“七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为防王明再节外生枝，老毛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回到武汉去”。然而，会议批准了王、周提出的加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否决了毛的建议。

1938年6至7月，延安与长江局的冲突又起。王、周、博等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底意见》，要组织各兵团，决战“东方马德里”，拒敌于武汉门户之外——李德重出江湖。中央来电表示不同意。长江局复电延安，坚持原议。双方互不相让，电报往来不绝，几成“电报战”。

“三月会议”后，毛泽东开始反击王明右倾路线，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不指名地批评王明、周恩来等人怀疑、轻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

而王明、博古、项英、凯丰一致决定，《新华日报》和《群众》不予转载毛泽东的《论

持久战》。王明还诌了一首诗嘲讽——《论持久战（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中心错误）》：“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1938年3月24日，毛泽东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等，责其“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又致电朱瑞，令其“以最快速度”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创造冀晋豫边区”。

在毛泽东的全力催促下，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率八路军陆续深入华北各地，建立根据地，仅一年时间，八路军就从1937年9月的不足3万人，发展到1938年秋的25万人。而新四军在王明的影响下，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只由1万多人发展为2.5万人。

毛泽东有关只有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才能壮大中共的意见，日益被事实证明其远见。而1938年10月的武汉沦陷，一方面，粉碎了王明、周恩来领导长江局配合国民党展开的轰轰烈烈“保卫大武汉”的梦；另一方面，也证实毛泽东有关“国民党片面抗战必然失败”的论断。

1938年3月，毛泽东将刘少奇调回延安，成为毛与长江局斗争的同盟。老刘抑制不住对王明的强烈不满，不时跟部下诉说自己昔日受压的经历，并指名道姓抨击王明，称其是“披了马列主义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

1938年7月10日，刘少奇写信提醒彭真修改政策：“国民党与阎锡山至今不承认统一战线，因此在文件和宣传上以少说或者不说统一战线为好。”

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在山西、河北组建起大量规模较大的游击队，使中共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几乎遍布华北所有地区。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称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创造了模范的经验”。随着老刘职位的上升，以北方局为基础的刘少奇班底也迅速在党内崛起。

1938年9月，刘少奇被委以北方局和中原局两个中央局书记的要职，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华中，克服王明、项英右倾路线的影响，落实毛泽东“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老刘到任后，很快在新四军战略方针上与项英产生分歧，尽管有毛泽东的支持，但也未能把项英从坑里拉出来。

“皖南事变”后，老毛说项英“相信国民党，相信顾祝同，不听中央的话，不相信党中央，把椅子搬到顾祝同脚下坐着。顾祝同脸色一变，一脚把他踢翻了。”——面对国民党的磨擦，项英认为“不是统战的问题，而是统战不彻底的问题。”后来清算右倾路线时，刘少奇说项英是“枪杆子向党闹独立”，“这条路线如果在全国贯彻实行起来，那在全国各地都要发生皖南事变”。

老毛后来还特意表扬了罗荣桓：“**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罗荣桓一到山东，就在谁领导谁，谁团结谁，谁统一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坚持正确路线。**”“百团大战不能说都不对；但是，**罗荣桓不参加百团大战，集中力量抢占山东的地盘，这很了不起。**”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基本结束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在1945年的“七大”讲话，把遵义会议与六届六中全会相提并论，称之为党的历史上“两个重要的会议”，**“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1947年11月，毛泽东在“杨家沟会议”《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对这一阶段的路线斗争作了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

4、延安整风

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六届六中确立了老毛的中央领导权，而延安整风，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宗派主义（以张国焘为代表）、主观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

七七事变后，大批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入延安，尤其1938—1939年间，国民党正面战场接连失败，大片国土沦陷，使这股潮流进入高峰，成为当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观。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延安一时“天下英雄豪杰云集”，“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由于当时中共发展急需文化，作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些知识分子基本都入了党，而且进入干部队伍，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即使以1945年“七大”时全党党员总数（121.1万）估算，新增知识分子也有5%左右。再据1931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的统计，“全国党员数目约在十二万以上”，“在社会成分上说，真正产业工人全国仍然不过二千人”，可以肯定，当时党内知识分子党员人数已经远超工人党员人数。所以说老毛有两支大军，一支农民革命大军，一支知识分子文化大军，毫不过分。

这支文化大军鱼龙混杂，整体上属于投机分子。

“炎黄春秋”的老朽自述：

『三十年代中国知识青年的亲苏亲共，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日本侵略所激起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结。……从1935年的“八一宣言”到1946年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个被迫妥协让步的时期，……而“一二九一代”，正是在这种特殊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不知道，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共，已经不具有自由的心态，早在1925年，李大钊领导下的游行队伍就纵火烧毁了发表反苏言论的《晨报》社，预演了红卫兵在文革中的那一幕。』

“一二九”知识分子，把自己描成了被拐良家少女，但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即李泽厚概括的“救亡压倒启蒙”——“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

其实大多数青年先投奔的是国民党，结果“热脸贴了凉屁股”。一位上海青年曾回忆：“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地主家都没余粮了，哪有你的饭？这才改去的延安。党国毕竟是工作稳、收入高、易于小资实现人生价值的大型正规国企。考不上国家公务员，才退而考虑土共这个证照不全，随时可能被工商部门和城管大队取缔的民营乡镇企业——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出台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

土共争取小资，吸收知识分子的方式，不是抓壮丁，而是姜太公钓鱼，实行“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这是对丫腰包的自信。尼玛要是有马云、李嘉诚一半的身家，还有的商量么？即使“反特”，也制定了《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我党必须采取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分子为我们服务的方针，……在某种情况下，宁可让他们跑掉，亦不可多杀人。”

“一二九一代”被骗上当后悔了，可没人拦着，却不跳槽，甚至到了“反右”“文革”时被批判，也未行使“退党自由”的权力。莫非是他们集体染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资产阶级屎学家往“一二九一代”的身上猛喷“崇高”、“大义”、“热血”、“毅然”等央视上榜品牌金漆，但也掩盖不住他们的“民族大衣”里面裹藏着的饭碗，即李泽厚所说的“人民的饥饿痛苦”，身后的背景是“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中国之大，已找不到一个活命的工作。

周扬的老婆苏灵扬回忆在国统区的生活，“几乎天天为生活作难。”“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找钱’。”1936年元旦，周扬唯一的女儿即将出世，可周扬跑遍同志们的家，也没有筹集到去医院生产的费用。最后好不容易找到郑振铎，才借了20元钱，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王实味的托派朋友楼国华回忆，“王实味带着老婆，住在上海菜市路一个小亭子间里，孩子落了地，不名一文钱，穷困使他横了心，闭上眼，他用劲扼住了婴孩的喉颈，窒死了这个小生命，悄悄把他丢进了弄堂里的垃圾箱。”武汉会战失败后，王实味因宣传抗日，被所任教的中学解聘（资产阶级屎学就是农村公厕，一不留神，又踩了一脚屎：这是神马年代？宣传抗日能被校方迫害？是学校也办不去鸟。俺不是说王实味不抗日，而是说这金漆是临时工喷的：连知识分子拉屎都要喷上“为国为民”），然后，经范文澜推荐，来到延安。

鲁迅小说《伤逝》的男主角，就是为王实味等追求民主自由的文青们量身打造的——

“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接下来便“油鸡们也逐渐成为肴馔”、“阿随（宠物狗）也将留不住了”，“一面登‘小广告’去寻求钞写和教读，一面写信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请他收用我的译本，给我帮一点艰辛时候的忙。”但还保留着“小资”的清高脱俗和自命不凡：“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又意淫自己在为他人受难：“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仿佛“一二九一代”为鸟国家人民去延安吃苦。然而，现实摧毁幻想：“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最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

男主角甩了自己的女友，王实味扼死自己的孩子，相比狗血电视剧中民国小资个个锦帽貂裘，大背头油光锃亮一丝不乱，大洋直从指缝里掉，一个地狱一个天堂。所谓知识分子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来到延安追求民主自由，为鸟国家人民、理想信仰而战，这只是CCTV抗日神剧里的情节。

以上还是七七事变前。七七事变后更惨：国统区经济萧条，物价上涨，出版受禁，印刷成本急增，苛捐杂税沉重。中共领导的“文协”鉴于“若干作家病不能医，贫无所告，死不能葬的悲惨事实”，曾发起了“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沦陷区更是大量知识分子流离失所。

左联领导和作家尚且如此潦倒，无名文青在国统区当奴隶都没有人要。在奴隶社会，小生产者破产活不下去到自由市场插草卖身，有人买是给你活路。个别奴隶主经营惨淡，也会解散一批奴隶成为自由人。奴隶市场也和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一样火爆，卖方把买方桌子都挤翻。当抗大招生名额满了以后，从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上贴满了“抗大停止招生”的消息，但他们仍然像中东难民潮一样徒步涌来，来后也都得到了学习或工作的机会。

知识分子去延安，是从自由人转变成体制人，要被改造成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如果说被骗了，那等于说延安整风这段历史纯属虚构。

这帮孔乙己原型的小资破落户，混得比短衣工人还惨。周公和小平们一直嚷着把知识分子划进工人阶级的队伍，也有这个原因和理由。——周、邓机械唯物论认为，土地一分，地主就是贫农；厂子一共，老板就是无产。

1949年4月26日，刘少奇回顾了这段历史：

『抗战以后，很多人都跑延安，特别是男女学生，于是发展了几十万党员。因此许多干部都是新党员。但有一些人态度不大老实，填表时假造姓名、年龄、籍贯、社会关系、能力、履历，本来没进过大学，他说是大学生，本来没搞过革命，说搞过，本来与共产党没有关系，说与某某团体有关系，本来已加入国民党、三青团或特务组织等，说没有。他们到共产党来，也把旧社会的一套带来，以为也要如此才能吃得开。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后，发现了很多党员不老实。……有人要加入共产党，我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打算今后怎么样，他说还没有考虑，我说那么你还是想一想。』

延安当时要是有办证的，手机都得被这些“方鸿渐”们打爆。

为加强文教战线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决定从国统区选调一些在文化学术方面有较高水平与成就的党员干部到延安工作。1937年9月，李初梨、何干之、艾思奇、周立波及周扬夫妇等人到达延安。

此前，周扬、夏衍们扛着常公“民族文学”的变种“国防文学”大旗，与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激战，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中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论战。在民族大义面前，周扬这类小资产阶级文人毫不意外地动摇了。——资产阶级学者把这段争论，搅屎为官僚（周）与文人（鲁）、共党（周）与非党（鲁），或专制（周）与自由（鲁）的争论，还对周扬刻舟求剑，称为“‘国防文学’派的极左人物”，

周扬们唯恐民族大敌当前，继续谈阶级惹怒了资产阶级，毁掉这来之不易中华民族大团结，便自动放弃文艺战线的领导权，走全民文艺的阶级调和路线，还散布空气，说鲁迅“破坏统一战线”。

鲁迅则“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这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和毛泽东一样，鲁迅也扎在小资产阶级堆里，若不“寂寞”，那只能证明老马的阶级论是错误的。但周扬之类的“蛀虫”，暂时还是新民主革命的同路人，要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才能彻底挖掉，之间他们还要多次“嘴脸毕现”。

周扬在延安当了“鲁艺”副院长，继续打鲁旗反鲁：在“研究第一”“学习第一”的口号下，提倡批判现实主义，提倡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真实的情感，号召向外国古典名著和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大师”学习，——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屠格涅夫等，还强调“正规”，关门提高。这一段时间，“鲁艺”创办《草叶》杂志，刊登写知识分子的作品，与新到延安的小资文人志趣相投。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不与农民往来。

延安当时文艺社团和刊物纷纷涌现，艺术创作活动如火如荼，如丁玲的《在医院中》、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莫耶的《丽萍的烦恼》、方纪的《意识以外》、丁克辛的《春夜》等，宣扬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表现小资的情感，“写熟悉的题材”就是知识文人“写自己的生活、思想和感情”，表现在创作上，全然是作者自己“独有的柔和的语调，低声悠闲地谈说自己、自己的多感心情、自己的琐碎生活、自己的快乐和忧愁”。

“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和陕甘宁边区文协，还形成了“四个山头”，互不和睦，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挑起争端。国统区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

1938年3月，初来延安的萧军在一次宴会上，发言表示“不同意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认为“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最后，康生讲话阐述了党的文艺政策，也不点名批评他的观点。结果萧军愤然中途退席，随即离延安赴西安。

1940年，萧军又回来了。回来的原因，据百度屎学档案记载是“因为不堪忍受国民党专制统治”。尼玛这样贴金，“国粉”知道么？难道共产党不比国民党更专制么？

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里白纸黑字，“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资产阶级一不小心就干了自己的同志。而且，1948年，萧军在东北用中共给的安家费和贷款办《文化报》，然后在报上称苏联“赤帝”、骂中共土改“强盗行为”、喻解放战争“萁豆相煎”，结果被断了货款和纸源。《文化报》被迫停刊，萧军被安排到抚顺煤矿改造思想。对此事件，资产阶级师爷指出：“这正是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国家管制一切的体制下，离开了执政者的物质支持，知识分子是什么事也不能做的，……几乎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选择。从此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所有的知识者都成了国家的雇员。”——2003年，自由主义泰斗张维迎在北大尝试改革国家体制，推行教师聘任制，却遭到一伙砖家叫兽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

师爷们睁眼，那可是1940年，1948年，到国统区当公务员不易，想当自由职业个体户可没有一个“文革”余孽阻挠。萧军不去国统区自由创业，却到中共体制里受约束。师爷们反说是弃专制奔自由，这蛋都扯臭氧层里去了。

1943年，萧军又因“王实味事件”遭到批评，一气之下自己跑去延安乡下要去种地，经妻子劝说才回到延安。他老婆咋劝的没记载，不出意外基本可以断定，就是“别特么装逼了，你能种地，猪都能上树。再说，乡下的地要是随便种，还土改个屁呀？饿死你丫的。”萧军自己就用仇恨土改的事实，扒掉了师爷们贴在自己脸上的金纸：真想种地的，没一个反对土改。

在资产阶级唯心师爷的笔下，萧军必须是一匹来“独立的，反叛的，自由的”，来延安“寻找精神的歇憩地”的“不驯的野马”，而精神“圣地”永远只在“远方”（俺注：欧美），至于小资指缝直往下漏的“袁大头”，游侠怀中取之不竭的金叶子，从哪儿来？这是他们老婆操心的事儿，用不着资产阶级师爷费心。没有老婆拦着，萧军能让师爷们忽悠到无人荒岛当鲁宾逊。

经过1938年西安和1943年乡下自由打拼的经验教训，以及他老婆的这次谆谆教导，1948年丫没再装逼，老老实实去了抚顺煤矿。

解放后，萧军未经东北局开介绍组织关系，便自行进京找老婆孩子一起生活。——走了彭真的门路，违规安置到文物组，月140元。萧军动情的说：“每次走入风景优美、绿草如茵、繁花满树的工作室，我都会在心里泛起一种感动的心情，我和彭真的关系，犹如鲁迅先生和瞿秋白……”

这厮顶着鲁迅的名片招摇撞骗，一件人事没干，白吃白喝工人农民一辈子，连民主革命这关都没过（河蟹刚说社会主义养懒汉时，我就纳闷：工人老爹每晚8点之前下班都算早的。现在才明白，原来说的是体制文人和艺术家。这货凭三十年代的一部抗日小说竟吃了一辈子白相饭）。在这个粪坑里，还不忘拉鲁迅一把。这一点他比起胡风又差之天壤。胡风一辈子不接受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但本人却从未自称“鲁迅门人”。

1942年胡风曾就小报《良心话》诬其“附逆”事写过一篇辩白文章：

『自鲁迅先生死后，有些小报常常阴险地说我是鲁迅的“弟子”甚至“大弟子”，但咬定为这样“自称”的，似乎这还是第一次。……但我不但不至卑鄙到想盗取一个“门人”或“弟子”之类的莫名其妙的头衔，而且因为不愿给那些乡下小女人似的文士们添加喊喊喳喳的材料，……在先生自己，虽然不惜用血液哺养年轻的一代，但却非常讨厌别人称他为“师”的。』

今天的文人师爷热衷于给胡风“栽赃”，其实是给鲁迅“栽赃”。把凡是接触过鲁迅的所谓“门人”“弟子”的观点和行为，反加到鲁迅头上，取得“有其徒必有其师”——“血统论”变种——的效果。

萧军从东北沦陷区流亡到上海，得到了鲁迅的救济，又把他的小说《八月的乡村》收入“奴隶丛书”。就凭这个，鲁迅就成了挂在丫嘴上的“恩师”，准确地说是“恩人”。萧军对鲁迅，只有做作的东施效颦，立场却截然相反。郭沫若给鲁迅写的挽联称“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无一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这只是一个愿望，连他本人都没做到。

丁玲讲过《八月的乡村》，说当时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为什么鲁迅肯定他？就是因为当年左联是左而不作。当时一片沉寂，需要有作品。

小说中和萧军同一的姓氏的萧明，像毕福剑一样，发出了枪毙汉奸地主“有必要吗？”的疑问，还苦思“什么时候才可以避免了人杀人啊？”——和丫是一个揍性。

在纪念“八一五”日本投降三周年的《文化报》上，萧军发表一首写于延安的旧诗《萁豆悲》：“血战连年四海昏，谁将只手拯元元？忠奸自古明水火，龙虎由来际风云。萁豆相煎悲有迹，情亲奴主掩无文。如荼往事应犹忆，殷鉴垂垂何太真？”，比拼周公的“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此时正值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这货却要玩人道主义，说国共双方死伤最多的“难道不都是工农劳动阶级吗？”他站国共中间不偏不倚，一碗水平端，用他自己的名言就是“我一只笔，要管两个党”：1945年写这首诗是谴责国军打内战，1948年重发是指责共军不谈和，——跳“摇摆舞”，正反映了处于中间状态的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1947年，储安平也在国统区发表《中国的时局》，表达了与萧军“心有灵犀”的观点：

『即以“和平”而论，以前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最近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有什么不同？最妙的是双方的主张停战，据说都是为了人民。既然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没有什么不同，则为什么共产党要求“无条件停战”时，国民党不接受，国民党要求“就地停战”时，共产党不接受？原来停战与张三有利时，张三即要求停战；停战与李四有利时，李四即要求停战。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老百姓只是他们的幌子。现在我们看得很明白，共产党对于“和平”是越来越不发生兴趣了！』

老毛这样回答他们：“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再让萧军的“恩师”——主张狠打“落水狗”，被陈独秀评价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来教育他吧：

『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

“第一要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萧军还呼吁要联合“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全国人民”——“不管他是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英美派、德日派；唯物的、唯心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都无妨。”——“中国派”“人民派”创使人。

1948年，正值东北土地革命如火如荼之际，他又在《文化报》发表《新年献词》，表达对土改的强烈不满：

『所谓民主也，革命也，共产也……此真背天逆人，颠倒伦常之举；复加以分人之地，起人之财，挖人之根……甚至净身出户，此真亘古所未有之强盗行为，真李自成、张献忠之不若也。满清虽异族，日本虽异类，尚不为此，胡共产党竟如此不仁其甚也哉？』

“之乎者也”。鲁迅的白话运动，老毛的大众文艺，一丝一毫也触动丫装逼的知识分子脑袋。知识分子初到延安，就因为在城墙上写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把“工”字第二笔转了个弯，“人”字右边加了三撇，——“苗”字有多种写法，而被老毛批评“故意让群众看不懂。”

1943年11月10日—1944年3月6日，萧军携妻子儿女，到距离延安十几里地的川口区碾庄、王家沟、刘庄一带，做了四个月“农民”（四个月去了这么多地方，不知种鸟几棵白菜）。萧军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

『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个女孩没裤子穿。（公知把这笔帐算到土共头上。）

看到农民们辛苦的获得一粒粮食，由早到晚，却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奸细吃了，这使我非常痛恨。（革命的痞子毕竟还革命，尼玛都为农民干了啥？至于奸细，先看看丫自己反革命的一生。）

离延安仅十几里路的村庄，竟像隔了千百里，这里的人民除开送粮草的义务以外，似乎什么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传也接不到，看不出他们和这革命政府有什么思想、感情等联系。没有报纸，没有经常的宣传，一句话，看不到政府的工作，党的工作在哪里。（党为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老毛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肿么教育知识分子的？尼玛除了访贫问苦——还是因为呕气装逼才偶然跑到乡下，又具体干了些神马？）

刘永廷的老婆……幼年时曾在天主教堂读了二年书，供吃、住，……她对于洋堂存着留恋，过门时曾给过一对银耳环、首饰，却被贼偷了。（取缔边区政府，让天主教领导抗战好了。）

夜间在刘怀民家，他说在革命前自己有近三百垧地，一年能打三十石粮。牛、羊被东北军杀了，粮吃了，地被共产党分了，自己以中农身份参加了革命，……（这个帐算到土共身上没错。）

王兴甲是难民，革命后来碾庄，革命给了他土地和窑，如今多出几斗公粮，他却怨恨起政府来了。这就是说，一个农民一到了满足状态，他们的革命性就消灭了，甚至变成了革命的敌人……这倒是一篇小说的主题。（这个题目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做。）

我很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粮的人。』

根据地的农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这毫无异议。但是，资产阶级公知学者把这篇日记作为八路军在根据地竭泽而渔的罪证，却不肯解释一下：根据地农民都这么惨了，为毛还要支持土共打老蒋？如果说右逼控诉土共的文字是大海，那么诠释这个原因的文字连一滴

都没有。

当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知识青年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使延安吃公粮的人口——干部和学员、各种学校、培训班人员等——陡然成倍地增长。这才出了著名的陕北老大娘诅咒毛泽东“被雷劈死”的故事。因此，老毛在困难时期发动了“大生产运动”：“**人人都有两只手，我们也有两只手。陕北的老乡们有两只手，他们能够开荒种地，我们为什么不能？**”

1942年春，毛泽东作了整顿三风的报告。各机关、学校纷纷办起壁报，踊跃著文，知识分子趁机用批判现实主义对中共“暴露黑暗”，并刮起排斥党的领导的自由主义风沙，以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另外三种资产阶级思想：作家欧阳山发表“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的观点。有的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有人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当时的代表作主要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王实味《野百合花》以及墙报“轻骑队”、“矢与的”……

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大会动员整风，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1、关于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人选问题。院务委员会决定由各研究室主任以上的领导为当然委员，同时在群众中推选一部分同志共同组成。但王实味提出，委员必须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各研究室主任，即使是院长，也必须经过选举产生。

2、关于出版墙报问题。王实味提议，为了保障投稿人的民主权利，墙报上的文章可以不署真名或用匿名。一部分人反对王实味的提议，认为整风检查工作是光明正大，不应匿名。

经过激烈的争论，赞成王实味意见的占多数。于是，一些人欢呼，这是“民主”的胜利。

会后，王实味发表《政治家·艺术家》认为，艺术家“主要是革命的精神力量的激发者”，其任务“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

哪个阶级的艺术家？小资产阶级艺术家要改造无产阶级的灵魂。鉴于王实味也自比鲁迅，就让鲁迅教育教育他，到底谁改造谁？

『但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

接着，王实味又发表《野百合花》，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的晚会说成是“歌喉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这与“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极不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一些差别说成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把战争环境下偶尔发生的“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视为普遍现象，甚至“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最后开了一付“民主”、“博爱”的药方。

丁玲则发表了《三八节有感》，为延安妇女维权：

『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

这显然不会是全部，也有夸张的语气。男女不平等，明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产物。只

有废除妇女的经济依附地位，把妇女的私人劳动转变成社会劳动，才能彻底解决。延安本来就是农民和小资产的海洋，难道能跑步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么？资产阶级师爷也趁机起哄，“丁玲到延安不久，就敏锐地察觉到当时的男女不平等”，“以一个作家的良知，揭示了滋生在革命队伍里不良的陋习与流弊。”而公知捍卫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二奶”与“小三”齐飞，妓女共嫖客一色，就是他们“对女性的关怀”。**他们要铲除的不是革命队伍里的“陋习与流弊”，而是“革命队伍”；他们指出一个战士的疮疤，是为杀死这个战士先行舆论。而如果战士要自剜疮疤，那必须是迫害。**

如果此时，王实味、丁玲等中共党员不是揭露中共，而是在延安开动宣传机器，揭露更不平等千倍的国民党的黑暗，资产阶级师爷就不是拍手叫好，而是指控土共破坏国军抗战，充当日军侵华的“带路党”了。

丁玲在 1982 年说了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感想：“我也没有想到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对被批评者应有的体谅，更想不到敌人可以用来反对党的。四十年之后，现在我重读它，也还是认为有错误的。”

萧军和萧军日记，还揭了知识分子的脸上的金漆：

『新来的党员草明，她第一关心的是这里的待遇、津贴，接着她就争津贴、多领馒头，支使小鬼吵着送孩子……。另一些党人们，——如刘白羽之类——充大作家，装病，进女同志房子挨耳光等……。』

朱德说：有一位作家自视清高，瞧不起工农兵群众，声称自己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个作家，而且还要做世界第一个作家；还有作家感觉在延安怀才不遇，便借用李白的诗发泄不满，“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也从侧面揭示了小资的怨念：

『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好白菜让猪拱了，“奶茶妹”被刘强东睡了，这是小资对官僚、土豪们的羡慕忌妒恨。嫁科长都看不起，嫁黑手土脚一身臭汗的农民工大老粗，文人艺术家们还不得发疯？八十岁的博导，七十岁的董事长，开名车去大学校园接女学生，小资卯大劲也就恨恨的咽口唾沫；而若是五、六十岁的拣破烂老大爷，登三轮追女学生，小资立马就得见义勇为，痛扁这老流氓。在传统文人写的诗文、小说和戏剧里，以及他们中国梦里，美女必须是才子的专利：“红袖添香夜读书”啊，“书中自有颜如玉”啊，……他们腋下的裴多芬、贝多芬、达芬奇，是打“文艺炮”的执照——当时的知识分子和今天的“富二代”一样，都属稀缺资源。

小说《伤逝》中的男主角，王实味们，都是这么干滴。王实味来延安不到一年，便给女青年薄平写了一封长信，先从马克思、燕妮，到孙中山、宋庆龄，再博引《安娜·卡列尼娜》以乃《伤逝》男主角所用过的其他文学作品，论述灵与肉的问题；之前还许诺要把薄平的经历写成小说，——仿佛导演选女一号，一下就打动了女神。鲁迅曾经这样描述：

『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一个才子出门遇见一个佳人，两个人很要好，有一个不才子从中捣乱，生出差迟来，但终于团圆了。……或者讲上等人怎样有趣和快乐，下等人怎样可笑。……他们的戏里的脚色，止

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状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欢喜，他们看了也很欢喜，下等人没奈何，也只好替他们一同欢欢喜喜。』

我一亲属，由于女儿和女婿感情有点危机，就常念叨，两口子文化差距大总是不行，没共同语言——女儿初中，女婿大专。我一听就笑了：你以为大专生没事聊天都是裴多芬、贝多芬、微积分呀？那玩意相当于科举中的“八股文”，敲开门就扔了，只剩柴米油盐鸟。况且，他们也是一知半解，拉大旗做虎皮。就像“人性主义”的萧军王实味们，根本不懂鲁迅：鲁迅是硬骨头，所以硬骨头就是鲁迅。真不是一般的二逼。闻一多也是硬骨头，可他跟鲁迅是一回事么？蛮牛、犟驴的骨头也很硬。况且，他们也只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充硬，是面子的硬，不是骨子的硬。

薄平接受王实味，也未尝不是受了下述影响：王实味说“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爱情是可以培养的”；王实味的好友袁大姐极力开导，说他才华出众，是党内难得的好干部，嫁给他会很有前途的（王实味在中共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津贴是4元5角，比边区主席林伯渠多5角，比毛泽东少5角。王实味专事译述，除工资外，尚有稿费收入）。——萧军后来申请入党，也是因为他老婆对他关于“前途”的循循善诱。

薄与王结婚不久，就宁可冒着被狼吃的危险躲到山上，也不去和王实味一周一次夫妻生活，于是很快又分了手。这也可能是由于王实味的性格的原因。小资知识分子嘛，一向自恋，曲高和寡，举世皆浊我独清滴。

何锡麟曾对人说：“此人性格十分不可爱，大部分人都讨厌他。我们那时候吃中灶（连王若飞也吃中灶，只有中委吃小灶），王实味不拘小节，他不顾自己有肺结核，吃菜尽挑里边的瘦肉。”

陈伯达说：他在马列学院工作的时候，和王实味同一个党小组，只要他参加了小组会，这个会是一定没有办法开下去。由于当时翻译有分工也有合作，在分配稿酬时稍有不公，王实味便大吵大闹，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当时边区棉布很缺乏，大家都穿土布，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做成衣服，主要是给领导、学者穿，这就是当时的“干部服”。作为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也享受这一待遇。但是1941年冬季发棉衣时，因为王实味没有领到干部服，就围着范文澜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文澜只好把自己的一份给了他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最后王实味只要了帽子，因为范文澜个子大，他的衣服王实味根本不能穿。

这就是所谓的“衣分三色”，原是“少量”不够分。**王实味充分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即老毛批评过的“极端平均主义”：**一副担架两个伤员，先抬一个，就是对另一个不公平，于是一个不抬。按王实味的意见，少量斜纹布不够分，宁可丢掉大家一齐光屁股，也必须保证公平。小时候听过旧社会俩兄弟分家的故事：五分钱一人二分，剩一分，就隔墙扔出去。现在才道这还真不是夸张。

还有艺术家塞克，更是“不平则鸣”、“不事权贵”的硬骨头。1942年，老毛派李卓然登门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老毛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于是又博得了资产阶级师爷长时间的热烈鼓掌：这一切（哨兵，勤务兵，饲养员等）在“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眼中”，是“背离革命道义原则的有力证据”，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义愤和平等感。”

老毛应该自己洗衣做饭种地喂马带孩子，一个警卫不要，跟老百姓厮混一群跳广场舞，才平等，才符合革命道义。老板、明星家里奶妈保姆司机一应俱全，外出一群保镖前呼后拥保驾护航，师爷们也没放一个“不平等”的屁。若是老毛从了师爷并因此挂掉，师爷们是决不会表扬老毛，或自承“煞逼”滴。可见这些标榜“远离政治”的、“客观”的“纯粹学者”都是神

马货色。

对于延安的这些知识分子的表演，鲁迅早有评论：

『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喊喊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

知识分子的批评超出了整顿三风的初衷，走向自由主义。老干部先不满意了，你们整天什么事也没有，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贺龙还直接对写“暴露黑暗”的作品的人说：“我们在晋西北，是这样对军队讲的：你们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你们有些人却说延安有黑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要‘班师回朝’了！”

1942年4月2日，在中央“讨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的会议上，老毛提出，“开展自我批评”，“态度一定要好”，“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萧军日记中记载：毛泽东曾说，“中国党是在老百姓中间产生的，中国老百姓落后它也落后。”“现在苏联也还是不平等啊！有等级，有资产……那时候像我们这样人，就没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样……”1941年9月10日，老毛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过宗派主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看不起。”

公知总是把党员、干部与知识分子对立，其实他们都是一个阶级成分。并且，延安的知识分子除极个别外，都是党员、干部。萧军看不惯的地方，很多就来自这些知识分子党人。像前面的知识分子干部“支使小鬼送孩子”，不正是官僚主义的一种么？公知先树立“文学是崇高的，政治是丑恶的”的标准，——八十年后他们一边把老毛拉下神坛，一边把知识分子拉上神坛。需要褒一个知识分子干部时，就说这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一朵花；需要贬一个知识分子干部时，就说这官僚是怎样的一坨屎。延安这些知识分子，后来有一大批成为首长级。当他们被社会主义革命所清洗时，公知就不称他们官僚而称学者了，如邓拓吴晗等。而同样是知识分子的老毛，却连官僚都不配享用，必须是帝王。

老毛在给萧军的信中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

资产阶级师爷此时一齐变成“极左余孽”，指控老毛讳疾忌医、捍卫“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等级制，并鼓吹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共产风”，企图挫伤人才精英的积极性；而当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这些“不平等”时，师爷们又一齐为老干部鸣冤击鼓，诉状里的老干部全都“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证人王实味纯属造谣构陷，罗织“黑材料”。——尼玛挺难伺候啊。此时，王实味就对消灭资产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萧军就对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革命，断然否定。

王实味文章里唯心主义“人性论”，是极端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而“蜕化论”则表现了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官僚化”思想。

面对批判，共产党员王实味没有认错，他说，作为人格独立的知识者“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用“软骨头”等攻击另一部分人，还振振有词，“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在苏联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成了多少罪恶”，“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他还说整风运动就是“毛主席团结正派人，反对不正派人”，“在本院民主的问题上，罗迈同志和范文澜同志是两派”，……直到被关押起来，还一再宣扬

他的理论，骂斯大林，赞托派，说中国托派陈其昌人性可爱……。

范文澜在《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六日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简述了“党挽救王实味的经过”和王实味“不反省”的表现：“《野百合花》发表以后，胡乔木和他谈过两次话、写过两封信，传达毛主席的意见”，“两个多月来，党委和他谈话，有八次之多。我也和他谈过两三次”，“党委又曾委托了五个同志经常和他谈话，帮助他改正错误。他仍是不肯认错，并且辱骂和他谈话的同志。其他个别的同志自动去和他谈话的也很不少”，“半个多月来，每次座谈会都希望他出席，他不肯。每次座谈会后都有同志把座谈会上同志的意见告诉他，希望他反省，他也不接受。座谈会又推派代表去和他谈话，谈了两个整整的半天，他仍旧一味狡辩。”

范文澜说，“我们党要求表彰革命光明，他夸大个别缺点，指为全面黑暗。”“我们用尽了苦心去挽救，希望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却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在组织上他虽然还是我们的同志，但在思想上，他确是我们的敌人了。”

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说：“**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王实味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之五四精神，博得资产阶级师爷啦啦队的一阵阵喝彩。而“共产主义者”王实味在国统区适应国民党文艺要求，1930译《珊拿的邪教徒》（被徐志摩编入“新文艺”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1933年译《萨芙》，1936年译《资产家》、《奇异的插曲》以及《还乡》等；1933年，王实味还走名人推荐门路，将一部书稿寄给“编译委员会”委员长胡适，并接连三次写信致敬：“先生为国家社会多劳，味所深敬！”对此，师爷们却表现得异常宽容：“客观地看，王实味迫于稻粮谋”。即：**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政见其次。**

资产阶级师爷是讲人道主义，珍爱生命滴。关于一点，谁敢跟他们说个“不”字呢？可是，师爷们头一晃，施展川剧绝活儿，换了一副铁血冰冷的面目：“作家丁玲、诗人艾青等等都在革命圣地写下了令后人难堪的人生败笔，只是活了下来而已。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不懂得生命的意义有时候不在于是否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延安文化人就不能把自己的政见放下，适应无产阶级文艺要求，“著书只为稻粮谋”么？师爷如此蔑视生命，他妈妈知道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师爷小脑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弦绷得有多紧。

莫说一个革命党，就是一个QQ群，丫闹独立，也得立马被踢。更不用说工人在工厂里跟老板、跟厂规闹独立了。

1947年，中央撤离延安，社会部在途中擅自处死了王实味。1948年春，毛泽东得知此事，极为震怒，喊“再赔出一个王实味来！”因为这破坏了中央的不杀方针。李克农因此写了一份检讨报告：“……只借口军事情况紧急……不顾党的政策擅自批准将王秘密处死，这充分表现我无组织无纪律，图省事、怕麻烦、自以为是的错误。……”

“图省事、怕麻烦”，是指在撤退中，翻山跨沟，都背着行李。但王实味不背，让两位押送人员代劳，还不时发脾气，有的时候干脆不肯走，让押送人员找担架抬他，还要求看守员：“希望这里在环境上不要刺激我，在生活上能够体贴我，特殊招护我。”

改开后，王实味的妻子刘莹开始为丈夫平反。中央也积极配合。可一直没有进展。原因是王实味的北大同学、托派分子王凡西，在国外曾写过一本《双山回忆录》。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

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

于是，负责王实味平反问题的宋金寿，于1984年8月在《党史通讯》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王实味问题》的文章，声明：若要为王实味平反，关键是要找到王不是托派的证据。

定居英国的王凡西看了宋金寿的文章后，灰常配合，连忙写了一篇《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发表在香港的《九十年代》月刊上。文章专门纠正了他原来的说法，承认那说法“不甚确切”，并强调重申王实味“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只曾经是托派一个同情者。”又特意声明“感谢《党史通讯》这篇文章的作者”，“更加使我感激的是，他让我知道了中央新的领导人对于王实味问题的看法。”

先有“看法”于前，再寻“证据”其后。“程序正义”法治原则何在？王凡西对此选择失明，反而在文中称赞新领导人：“他们自己在“文革”中吃过这种苦头，现在似乎认真想把中国推上法治的轨道。对于这，我们当然是拥护、赞成的。”资产阶级师爷，也在这个地方打着“法治”旗号反法治，妄图开历史倒车，复燃“文革”死灰。

王凡西的这种特殊证词起了作用，成为王实味平反的关键证据。这等于说，可以由国民党特务证明国民党特务嫌疑犯不是国民党特务。其实，大家都是一个阶级，已进了一家门，连蒋介石托洛茨基陈独秀都昭雪了，王实味是托派又如何？关键还是利害关系。王凡西在材料的结尾说：“希望我这两项证言能多少有助于王实味最后一关的平反，更希望王实味的平反又能有助于他的妻女的遭遇。”“免受不该受的歧视。”

后来又出了个小插曲，使这个本应完美的结局白璧微瑕：

刘莹在争取平反的过程中，为了证明王实味不是托派，曾在发表过的申诉材料中说了一些有损王凡西和陈其昌“清誉”的话。对此，王凡西一直委曲求全，但在95岁高龄时，他终于发表了有关这事的日记一则，刷洗羽毛，还自己一个“清清白白一生”，不能把污点带进棺材里去。

王凡西在日记中写道：

『在《申诉》中，刘莹把其昌和我都说成说谎者。说为了「别有用心地达到他托派宣传的一丝目的」，我「完全对王实味撒谎」，隐瞒自己的托派身份。同时又说我为了筹措一笔钱来给妻子生产，需要王实味帮忙翻译托传，却不告诉王实味托洛茨基是什么样的人，直到王实味译完「二章」之后，刘莹才知道译的是托洛茨基自传，此时她才劝王实味不要再译。对陈其昌，刘莹说他隐瞒托派身份，而且连自己的地址都不告诉他们，因此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不久搬家，「从此与一般同学和熟人断绝了来往」。

为了给丈夫洗冤，为了争取他的彻底平反，王实味夫人作了如此「申诉」。她的这份苦衷，我能够了解，也多少能够原谅。只是，把王实味的，同时也是她自己的二位老同学，形容得如此不堪，怎能与王实味当年在延安所作声明，即在他遭到批斗前后，仍然说那二人的「人性是好的」这个事实相调和呢？

说王实味译完了托传二章之后，仍然不知道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必须等到夫人给他提醒，他才知道托洛茨基是什么样人——这，未免把王实味的政治知识与认识说得太糟糕了。』

是啊。王实味的托派观点是“秃头上的虱子”。就像鲁迅，也没加入共党，但常公若按“赤色分子”办他，是绝不会“六月飞雪，三年大旱”滴。

既然托派王凡西对节操如此看重，就顺便给他一个盖棺定论吧。

王凡西打着列宁的旗帜，揭露“毛泽东、斯大林罪恶的文艺政策”，其实是反对列宁的观点：“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王凡西说王实味的“资产阶级文艺观”帽子，纯系捏造。然而，王凡西也承认：“根据历史唯物论，社会制度改变，人性才会跟着逐渐地改变”；而“人性改革论”者王实味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太强调客观，太看重物质。”“若不同时（或者首先）改革人性，则社会制度也终于改不好的。”

王凡西狗咬尾巴团团转，是想论证非马列主义的“人性论”，不是“资产阶级文艺观”。

1988年，苏修为托派平反。而痛斥“十年浩劫”，认可“中国特色”的王凡西，也希望中共“应该详细彻底地研究……苏共内部的各派（托、布、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意见，……为那些被斯大林陷害致死的人平反。”

历史选择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王凡西可以瞑目了。

一个活跃在“少中评”里的托猪，认为王实味是中国共运里给他“感觉乃至共鸣都最强烈的人”，甚至超过他“对陈独秀的欣赏”。我们不妨看看他到底想肿么改造“人性”的。

他认为王实味，以及在“民主风波”中支持王实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表现出现代无产阶级先锋应有的民主意识”。显然，这些“现代无产阶级先锋”，就是他的“人性”样板。他进而举例——

『不仅新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争吵，而且技术工人与农民革命干部之间也经常发生矛盾冲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技术工人们享受着很高的待遇，过着体面的生活。』（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938年初春时节，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技术工人杨长春，参加集体植树活动。他特意带上米达尺，向党支书李某建议，应当先用米达尺量一量行距再种，整齐好看。没想到这位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反而嫌其啰嗦：“……挖了坑把树苗栽上不就得了！”年轻气盛的杨长春回敬道：“共产党是讲民主的，你怎么这样不讲道理？”这位李支书指着衣冠整齐的小杨说：“你穿着皮鞋、戴着礼帽，洋里洋气，像什么样子！不愿干就靠边站着去！”杨长春不依不饶：“你原来不过是个挑大粪的，有什么了不起！”……

这个小故事非常生动地显现出一个受过现代理工技术教育的产业工人与土生土长于东方宗法式旧社会的农民干部之间的心理冲突。前者追求体面的生活品质，注重个性，讲求民主，尊重自由，乐于接受科学和理性，表现着20世纪产业工人的优良阶级性；后者粗俗，土鳖气，不乏蒙昧盲目、落后而自卑，却又专断自大，好摆资历，典型的山旮旯小农作风。』

个性，民主，自由，理性，这些软件完全是小资的标配。

现代理工技术教育，很高的待遇，体面的生活，这个“技术工人”的硬件，可比孔庆东的无产阶级——“二十万年薪瓦工班长”，以及当时的小资文人牛多了。据说当年，日本让文人当神风敢死队，却舍不得让这种“理工男”上。

辛亥革命后，军阀们从国外购置先进设备，筹办兵工厂。当时有奉天、上海、汉阳、巩县四大兵工厂。其工程师多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高材生，技术工人也都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为了能操作先进机器，一般都精通外文，业余还组织读书会。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千百万产业工人流离失所。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等都纷纷抢夺其中的熟练技术工人。“西安事变”后，中共也参与到这一人才争夺战中，1940年在《中国工人》杂志，连续刊登《陕甘宁边区各工厂招聘技术工人启事》。

在1942年以前延安的工资标准，技术工人最高，知识分子其次，再次是政府工作人员。一个技术工人的月工资是18-38元，当时在全国都是少有的高工资。据徐懋庸说，“红军出身的各级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高不过4—5元，而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和我这样的人，津贴费每月10元。”可以想像，高出徐懋庸津贴费三四倍的技术工人们，过着什么样的体面生活。

托猪文中的杨长春，1931年前后，在巩县兵工厂当技术工人，1937—1939年，在中共中央党校、抗大学习、工作。后来任延安兵工厂厂办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文革中受迫害，改开后在中央党校任一部主任。

杨长春叫兽书读多了，成鸟教条主义，把造枪炮的技术精度，用到植树上了。用20cm的米达尺量树距，一天能种几棵树？坑距只须步量目测即可。你用尺子量树坑，确定一个点。而挖坑时要因地制宜，不能保证这点就是坑的圆心。而且，坑齐也不能保证树齐，因为树根的形状各异，有的完全偏向一侧。

听你的就是“民主”，不听就是“不讲理”。杨叫兽当厂办主任时，是不是啥都按工人说的办？

羊要是有思想，会把上帝塑造成羊的模样。小资产阶级总是“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他们把产业工人先进于农民，庸俗地解释成道德、教育，优越，体面，以及自由，民主，个性的差异。这分明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差异：资本社会里工人没有资产，所以没有神马自由民主个性，也无法在教育、“仓库”等方面与资产阶级匹敌。

唯物主义认为：工人阶级之所以先进于农民，完全在于工人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而联合化劳动的生产方式，决定工人阶级的诉求，不会像农民小生产那样要求分田单干（把工厂一人分一块铁扛回家，不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只能是公有，共产。——集体主义精神只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像杨长春这样的“产业工人”，也是延安整风的对象。——“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摘要：

『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

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

对于革命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这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

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

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

绪。』

座谈会之后，文艺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评的风气。整风结束后，开始积极下农村，上前线，进工厂。

萧军也下乡，在日记中控诉土共的工作脱离农民。当时背景是，“百团大战”使日、蒋两方对中共“再认识”，国民党挑起“皖南事变”，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封锁。毛泽东后来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1942年9月，延安文化俱乐部建筑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大型墙报。音乐界也提出音乐活动“走向街头，面向工农兵”。10月，延安诗界举办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提出由创作“大众化”的诗到创作思想感情语言都同于工农兵的“大众的诗”。这些都表明了文艺家对贯彻“讲话”精神的积极态度。

1944年初，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平剧《逼上梁山》，毛泽东观后很快写信向他们“致谢”，赞扬他们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打破了旧戏舞台上把人民当成“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的局面，使“旧剧开了新生面”。

不仅周扬、何其芳领导的“鲁艺”由国防文艺走向了大众文艺，而且，一般教员乃至一般学员，也普遍经历了“脱胎换骨”的精神裂变。《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暴风骤雨》、……这些为人熟知的作品，反映了“讲话”对大众文艺的推动作用。

群众性的陕北秧歌舞也蓬勃兴起，全面取代了延安的“交际舞”。

《讲话》发表后不久，毛泽东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是有经有权”。老毛很欣赏这个说法，因为“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经），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权）。

由于当时的革命性质，以及党员的成分，绝大多数人基本上是把农民当无产阶级。

关于作家要不要转变思想的争论，朱德说：“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他“投降”的是农民，并非无产阶级，而且，对农民也不能称作投降的。

七大时，刘少奇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最后讨论时没有通过。然而1951年，他在组织工作会议后的一个文件上又提出这个看法。

国统区左翼文艺界贯彻《讲话》精神，提出“面向农村”的口号，稍后又提出“农民文艺”的口号。

还有前面列举的反映农村土改的作品，也并非无产阶级作品。到了建国后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时候，这些作品就没有了任何进步性，而思想还在这些作品层面停滞不前的作者们，也必须归到反动一类。——历史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前进。

延安整风，使中共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统一了步伐。不然，一群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党内做布朗运动——“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萧军），革命就不能前进。

黄钢回忆，周扬当年给他分配工作时说：“黄钢同志，……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报委员会决定把你调到解放日报去担任记者。……我们只能说：‘服从分配’；对你，也一样；因为整风文件上已经写清楚了：关于党性的决定，不能‘以邻为壑’，‘调不动人’。”

文艺家们的“缴械投降”，如前面所说，并非投降，只是由于当时的革命性质，他们得以

“潜伏”而已。

欧阳山回忆：虽然毛泽东的讲话清楚地指出了正确方向，但接受并不是毫无障碍和矛盾的，那意味着“我过去心爱的欧化语言和欧化风格也必须重新接受新的农民和新的农民干部的考验。”——农民这关能过，工人这关就过不了。

萧军在日记中记录，“此次共产党的信誉，在知识分子中降落得甚为可悲，离心离德已经成了每一个知识分子党员---除开那些拍马者---心中的暗礁，只要遇到革命低潮时，它们一定要显露出来。”在延安被“抢救”过的文化人，多有一走了之的想法。但是“外面”不是沦陷区就是国统区，不易立足。待“日本投降”，方离开边区。

“抢救扩大化”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知识分子间的乱咬。萧军在日记中称，“黑丁在坦白大会上曾指我为日本特务，并说敢于对我对证。”“从阅读雪苇的材料中，知道三部有人报告，把我，罗烽，舒群全算为‘特务’了，雪苇并肯定我和丁玲组织了反‘党’的活动”。“抢救时……全要咬我一口来滋补自己”的还颇有些人，而且都是萧军的东北老乡、朋友、同事。

有没有“抢救扩大”，知识分子都不会和无产阶级同心同德滴。延安不是小资到处都可以“自由呼吸”的乐园，不是诗人柯仲平比喻的但丁《神曲》中的天堂，而在空气里都充满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小资的自由主义，撞碎在党的布尔什维克政纲和铁的纪律上。

“狂飙诗人”高长虹，未被整风波及，也一样“人在曹营心在汉”。下面咱们看看这个热血青年的“革命”一生。

高长虹，1930年—1937年间，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远涉重洋到日、德、法、瑞士学习经济学。1941年，徒步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百度百科）

1925年，《民报》副刊登广告：“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高长虹看了说：“真觉‘瘟臭’。试问，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然则要权威者何用？”

高长虹进入延安，被安排为文协副主任。文协主任是柯仲平。高拒绝了这个安排，因为他在狂飙社的地位比柯仲平高。——自由知识分子的“反权威”，反的是别人的权威。在他自己，是必须注论资格，重级别滴。

高当时经常给延安《解放日报》投稿，但由于思想的非马列主义，大约一篇也没有被采用。一次，他的一本政治学著作，由于违背斯大林的观点，不能出版。高于是要求和斯大林辩论。

不久，高追求民主、自由的热情逐渐淡去，整天躲在窑洞里不出来，偶尔见到人，也不打招呼。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时，他接到请柬，却表示自己只是“研究经济的”，拒绝参加。

当国民党进攻延安，毛泽东问他想到哪个解放区时，他回答说：我想去美国研究经济。百度百科为强化老毛“喜怒无常”的“暴君”色彩，这样记载：“和高长虹谈话时，不知双方说了什么，毛泽东‘勃然大怒’，会谈不欢而散。”

高长虹离开延安，挂在东北局“文协”。他到干部食堂吃饭时目不斜视，一声不吭，无聊时用德语朗诵歌德，用英语朗诵拜伦，后死于脑溢血。

萧军《延安日记》也有大量读书笔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席勒、歌德、伏尔泰、莎士比亚、拜伦、司各特、巴尔扎克……。老毛在整风中准备的马恩列斯著作，估计一字没看。——小资产阶级文人平素互不相能，其实全都趣味相投。

对“脱胎换骨”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萧军这种气节文人是看不起的，对土共接受“拍马”、“溜沟”，也有怨言，——“张邪抑正”。知识分子做了那段时期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或是诚心改造，或是为饭碗，或是为“前途”，但同时也把子弹射向了敌人。革命欢迎有缺点的

战士，拒绝完美的苍蝇。——丫的骨气是反动阶级的骨气。至于在革命机器前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时，这些“齿轮”、“螺丝钉”锈蚀，到寿，不工作了，换掉即可，不影响这段历史。正如马克思否定私有制，却不否定诞生时期的私有制一样。但是，老龟命坟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牌子，必须摘了。

“一二九”一代，就不用俺们动手，自行摘牌了。杨继绳在 2001 年首先提出了“两头真”。
(杨继绳：《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李普今年八十八》)

『像李慎之这个年龄的人当中还有一大批“两头真”的人物：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并真诚地直面社会现实。境外有的媒体称这批人是“党内民主派”，其实他们是自由主义派。

作为思想者的李普，他的思想走过了一条“之”字路。他自己写道：我早年追求民主自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间陷入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之中；这一段相当“左”，有时甚至可以说很“左”，“左”得很可恨、可笑。六十岁以来逐渐觉悟，又走入了自由民主的行列。”』

俺刚给他们说完好话，他们就开干，自我否定那段历史。——资无两个阶级的世界观互相颠倒。

“拨乱反正”之初，他们可不是这样说的。那时“平反”春风正刮得知识干部浑身暖洋洋，他们在抢救、反右、文革期间被整，比窦娥还冤。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好干部。所谓“资产阶级当权派”，完全是一撮企图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新生资产阶级，强加给他们的罪名。

1979 年 1 月 2 日，文化部部长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工作中，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黑线”之冤被宣告解除和胡耀邦的讲话，使会场反应热烈。

待 2000 年后，资产阶级专政面目清晰，需要知识分子比拼资产阶级立场和骨气的时候到了。茅于轼铁骨铮铮的宣布“57 年我被准确地打成右派”，一下子在知识分子中高山仰止，鹤立鸡群。杨继绳比较顾大局，用“两头真”牌涂料，把在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高潮时期加入中共的知识分子群体粉刷一新，团结了“一二九一代”。

“一二九一代”的“两头”确实真，而“二李”对“中间”的解释，就明显扯几把蛋了。这是为了修补那段向敌对阶级变节投降——脱胎换骨——史，挽救被萧军之类的骨气文人对其声誉的损毁——“拍马”、“溜沟”。

对于李普“两头真”中间的一段——“左”——的 BUG，章立凡又打了补丁，说是“失真”。

『于光远、杜润生、田纪云、胡绩伟……，这种“两头真”的老人还有不少；又如李锐、李慎之、何家栋等，在政治生涯中途因讲真话获罪，就发不出声音了，但晚年仍坚持讲真话。这些前辈有的已故，有的健在，无法一一列举，但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章立凡：《“两头真”与中间失真》）』

起初，李慎之在给何家栋的一封信中时装逼：“五十年前，我是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满腔热血，一片赤诚。五十年后居然走到了原初的对立面”。何在回信中说：“当初走进这个队伍，完全是看中那面民主自由的旗帜，现在也不能说是走到它的对立面，倒应该说是他们走到了咱们的对立面。”李先生后来也接受了这种说法，更正为：当年，“咱们”入的不仅是一个抗日的党，也是一个标榜民主自由的党。

好。达成共识。

你们加入的是抗日救国党，民主自由党，不是共产党。俺写了这么一大堆，被你们一句

话就总结了。

老板剥削的一些常见手段（一）

我们工人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没阶级嗅觉不自知而造成的。以下有好几种资本家的压迫穷逼的手段，大家可以参考。

竞争上岗制与末位淘汰制：这两个经常会联系在一起。他们在经济危机时期出现得特别多，比如在 1998 年后的大下岗潮。由于国家认为是工人即吃闲饭的太多，必须要让大量的“懒人”淘汰掉。

其主要手段是各种各样的考评规定，谁干活更快谁加班更多。总而言之就是被压榨得越厉害，就越可能被留下来。工人们互相竞争比拼谁更能做牛做马，来争取被日益减少的岗位。大家互相竞争然后干得慢的、不怎么听话的被末尾淘汰掉。经历过那段时间的人还记忆犹新，当领导开始搞这两种制度的时候，很多员工都自觉不自觉加快了速度，当公布裁员名单时候，一些人看到没自己名字高兴跳起来了。

到了现在，这种例子也是层出不穷。比如都市里的白领程序员，特别以华为等为盛。很多新毕业的应届生由于年轻精力充沛，被各种鸡汤毒害和洗脑，所谓年轻要奋斗。公司会有各种各样的竞争，年轻人的加班奋斗乃至打地铺睡公司。让超过三十岁的老员工觉得自己就是个失去奋斗精神懈怠并且日益庸碌吃闲饭的懒人。实际上超过三十岁的员工是人生中知识、经验等一个综合最优的时期。但由于超过三十有了家庭的拖累，造成没那么多精力投入在工作中。这时候老板就需要一帮年轻的个人奋斗爱好者来竞争和帮忙末位淘汰。但是当他们到了三十几岁，要么就是结婚受到拖累而被新的个人奋斗爱好者所排挤，要么就是继续像二十几一样遭受高强度压榨。

绩效工资制：绩效工资也分几种形式，一种是与公司本身的效益挂钩，二是与员工的工资挂钩。

第一个变种通常和计件工资制结合在一起。比如笔者在几年前曾待过这样一个工地：老板承包了一个建材市场的水电安装，刚开始的时候谈好是给每个工人每天 240 元工钱，后来出来了一个绩效工资的制度。每天仅仅发多少钱的生活费，再根据老板的“绩效”，即每个工程能够结多少工程款再酌情分红利。例如，结到了 90% 工程款就可能 400 块一天；如果没结到工程款，就只有 30 块一天的基本生活费。老板对此的解释是根据企业绩效来，有钱大家一起赚，困难时候互相体谅。如果他没收到钱就连生活费都付给员工，其实员工没亏。

后来笔者发动员工坚决反对这项制度。这是因为，这项制度纯属老板后期没钱的缓兵之计。我们逼迫老板把当月工资当月发完，下个月再谈接下来说不做。无产阶级由于本身除了一身劳动力一无所有，资本家会用各种各样的绩效工资来引诱我们。有钱大家一起赚，这就是给我们的自己做老板的错觉，实际上，你相信他就中计了。因为如果他有钱度过难关，绝对不会多付一个子给你。

另外一个变种通常是员工拿钱出来入股的绩效工资制。某餐饮店请了一个厨师，老板说我这里总投资有 80 万，但是只需要你入股 2 万就获得 10% 股份，按照分红来给你发绩效工资，有钱大家一起赚。这个厨师当时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直接从员工跃升为“老板”。由于该区域身处城市新开发的楼盘，人口数量并不多，生意一直不怎么样。该厨师一连好几

个月都累死累活之后，发现店里账面上还是亏损的。这样，按理来说就不应该分红，过去这几个月完全相当于带着钱和劳动力帮老板白付出。

另一种绩效工资是最为常见的计件制。某光学镜片厂曾是计时制，员工工资大约是四千多水平。后来新换了一个老板，此人一来就说要企业上产量，员工上待遇的借口，把计时制改为计件制，在头两三个月，很多员工为了自己个人利益拿更多工资，都把做工速度尽可能提高，很多人工资翻了一倍。但很快，老板对工人们分化打击，将计件单价降低，最后工资水平又降到四五千平均水平，可是劳动强度却比以前大大增加了。

免费体检制：企业经常在招工广告中有这样的语句，本公司每年有免费的医疗体检福利以及医疗保险等等。这样的企业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基本上都是各种各样容易对身体有损害造成职业病的。比如有很大的粉尘、致癌气体、极强的噪音或者震动等等。

一般而言，企业会与某些医院进行定点体检。首先企业主可以将一部分利润转让给医院领导和老板，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双方可以取得各种默契。如果检查出员工有一些小毛病，公司可能会让你换一个岗位，比如说，从损害肺的换为损害听力的。但如果有往重病发展的趋势的情况，企业内部领导会首先得到你的体检报告，然后会下发到你的直接领导：“XXX 由于身体某个部位原因不适合本公司某岗位工作，为了减少以后纠纷和工伤索赔，建议将其辞退。”

如果直接发现了重大疾病，如 2018 年河北唐山赵金龙案例，在唐山弘慈医院体检后告知一切正常，可正常工作，一个月后多家医院却诊断为“肺癌晚期”。这样能让工伤者失去宝贵时间，迅速宣判死刑而得不到治疗和需要的高额费用，让工人的血汗成为企业主的叮当作响的利润，为企业主省去大笔资金。

先锋报

2018 年 12 月

我们为何奋斗？

——先锋报对佳士声援团的呼吁书

朋友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何而奋斗？**

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是！也不是！

朋友们，我们必须知道，在整个阶级的利益面前，一个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是算不上什么的。朋友们，你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觉悟了；你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完全消灭了自己对当今资产阶级当局的幻想——那么，我们的**目的**也就不该停止在所谓的“维权”上。朋友们，**我们必须前进，组成坚强的先锋队组织，为最终夺取政权而努力！**

这是一个何其远大而又何其艰巨的任务！但你们已经踏出了第一步，我们为你们的成就感到无比兴奋——但我们又为你们有些“自以为是”的发言而忧心不已：

❶：肯定会有，昨天两个维权保安被拦住不让进学校，经过现场抗议，才进入了。这是北大，人大已经有些成果了，后勤妥协了，活动在开展。可以说学生斗争是有成果的

②工友方面，目前维权工人都是公开斗争的，你没加我们的微信群不知道。现在聊天最热闹的就是胡志，还有兰凤，宋姚，伍双，元柱 工友们现在都是红群里的明星，深受欢迎。

声援方面，积极群众大量涌现，不知你有没有看到工友视频合集。胡志报了一串名字，都是最近出现的老同志。好多人都是一周三次茶，矢志不渝。线上宣传完全突破了原来各种转发的硬刷屏，向线上讲座，线上鼓动迈进。可以说红色队伍在扩大，而不是缩小。小小的白色恐怖只不过吓退了最落后的分子，相当多的人则是获得了新的成长和认识。前段时间各地老工人重新组织了声援活动，其中陕西工人还举行了抗议。海外的声援也有起色，不少左翼学者和组织准备站出来，声援我们。有些已经在做了

你们之中的人说：“目前维权工人都是公开的”（为什么领导者不知道保护左派，尤其是做好维权工人的身份保密工作？一旦被抓，他们是最脆弱的群体！不要忘记，还有许多工人兄弟在监狱里受苦受难！领导者到底在想什么？？），“好多人都是一周喝三次茶”（我们不知道，你们是认为这是可以炫耀的“光荣”事迹吗？这是极其愚蠢的逞英雄！），“小小的白色恐怖”（如果你们不认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会被你们无严密组织、无武装的群众斗争击退的话，请别再说这样的蠢话！）

按照斯大林同志的话来说，你们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了！朋友们，只要你们知道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如此的远大，你们就应该**相对谨慎、小心**的实施自己的行动。你们已经向所有人证明了你们不会畏缩，但我们还需要你们能适当的估计自己的力量和目的，**不要热血上头！**

当然，我们完全支持你们将“维权”作为联合同志、实施宣传工作的**手段**！但我们最反对的，就是你们被目前的一点好处惹得头昏脑涨、头晕目眩，以至于忘记了你们面对的不是什么“不堪一击”的“官僚机器”；你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帝国主义国家机器！

如果你们继续以这样对自己不负责的态度进行工作，我们只能非常不情愿的下如此断言：**你们团体的领导者，正在以“左倾”的态度，把你们推向敌人的枪口！等待你们的绝不会是胜利。**

你们可能会说：你们不是我们的同志；同志怎么会这样“诅咒”其他同志呢？

朋友们，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诅咒”在我们看来是最可笑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不注意吸取历史教训，**让无产阶级的革命烈士们的鲜血白流，让运动有遭受重大打击的可能**，

我们就不得不冒着被你们排斥的风险，向你们做出最急切、最真诚的呼吁！

作为你们的同志，我们在此迫切的呼吁你们：

停止向敌人暴露自己！

停止对敌人暴露自己的骨干力量——觉悟工人！

立即在目前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组织，形成真正的纪律！

不要让觉悟工人、学生和群众的鲜血成为教训！

不要让四一二发生第二次！

让我们的兄弟们活着看到胜利的来临！

先锋报

2018年12月

同学们，怎么办？

——先锋报给左派学生的建议

朋友们，距离佳士事件结束已经过去近三个月了。现在，我们并不想再对佳士事件本身做出评论——一方面，同志们对佳士事件的总结已经够多了；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是时候向前看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佳士事件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来临。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新阶段的特征，仍旧随波逐流的延续着以前的行事策略与风格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浪费生命，并把阵地让给资产阶级！

而为了说明本阶段的特征，有必要总结佳士事件的意义。

1、佳士事件对左派学生的意义

佳士事件的意义是什么呢？以往，我们都是从工人的方面来看——**这是工人第一次提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要求**。这当然也是最重要的。

但是今天，我们要谈谈这次事件对学生的意义。

毫无疑问，在佳士事件中，主要由**左派学生**组成的佳士声援团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们认为：**佳士事件中的工人与左派学生是自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结合得最紧密的！**

而这就是佳士事件对我们学生的意义：**与工人坚决的结合起来，以坚强的组织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是我们成功的唯一方法！**

但很遗憾，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比我们更早明白。

2、如果敌人力量强大，还要不要坚持公开的社团？

佳士事件后，资产阶级明显已经觉察到了左派学生的危险性。他们不仅大肆逮捕声援佳士工人的左派学生，还纷纷对校园内的左派社团进行镇压。各大高校的左翼社团遭镇压不就是说明了这点吗？



佳士工人声援团
@jasicworkers



#jasic #NJU #南大马研会 南京大学哲学系和团委互相推诿50余天，阻碍南大马会注册，今日南大热心学子演讲抗议遭受校方无耻打压。大四本科生 #杨凯 被保卫部伙同黑社会殴打！现场多名热心南大同学被打伤，#胡弘菲 发布求助信：恳请正义人士声援转发呼吁，为同学讨回公道！ jiashigrsyt.github.io/hhfqzx
pic.twitter.com/w7aRWVQJC

上午9:01 - 2018年11月1日

而不说面对国家机器，就是面对校方雇佣的黑社会，学生也显得束手无策。被打的学生

同志们在狗腿子们的拳脚面前，除了抗议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2018年11月1日，是南京大学历史上黑暗而耻辱的一天！

南京大学保卫处伙同黑社会殴打南京大学在校大四本科生杨凯！并打伤多名在场的热心南大学生！

我是胡弘菲，是南京大学2015级新闻传播学院在校本科生。

2018年11月1日，我难以忘记这个日子，在这所我生活了三年多的大学里，南京大学保卫处竟然伙同黑社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殴打我们的学校同学！杨凯同学被十多名不明人员暴力殴打致伤，头被死死的按在地上拖进了学校的行政楼！打人者飞扬跋扈，指着鼻子辱骂威胁在场的其他同学！



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学会适当的退却，保存实力。**

没有什么人能一直保持进攻，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的是极为强大的中华帝国主义政府时。佳士事件中，我们在进攻，在反击；而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反扑。可以确定的是，以后像北大、南大马会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我们难道要再经历南大左派学生的遭遇吗？

而且说到底，社团是由人组成的。**为什么不能用地下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来代替社团呢？**不要忘记，**列宁、斯大林在学生时代便创建了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布尔什维克的来源之一就是沙俄学校中的地下学生小组。他们在白炽灯、油灯甚至黑暗中点燃了第一缕红色的火焰！而现在的中国，就专政的力度来说，是比沙俄更强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吸取经验，仔细考虑建立地下学生小组呢？

事实上，无论是现在的学生小组，还是以后的组织甚至政党，我们都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我们必须习惯在暗处进行斗争。**

要知道，**我们的目的不是玩耍，不是宣泄自己的正义感——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政权，当前的目的是建立组织。这是天大的事情，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应该为此服务。**

当然，社团的公开活动更有利于宣传——但我们要问的是，目前的学校真的适合做工作吗？

3、当前宣传的重点应该是学校吗？

朋友们，在这里我们要谈谈自己的经验。我们先锋报的编辑部内也有学生。而无论是从我们的学生同志，还是从网络上大部分左派学生的反馈来看，绝大部分学生现在对左派运动并不热衷。

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情况：很多学生在本校试图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时，被同学、老师排挤、反感。很显然，除了经济基础的问题外，还有重要原因：**我们的力量还太薄弱、我们的宣传在社会上还很微小，远不足以盖过资产阶级的宣传**；这导致很多学生对左派的宣传很反感，在左派学生被资产阶级镇压之时对左派学生反而持冷嘲热讽的态度。

因此，我们认为：学校目前不适合作为宣传工作的重点。

我们的经验是：目前对学校中的其他同学，应该持挑选、试探的策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经济基础上分析同学，选择最有可能接受宣传的同学，在长期的接触、交谈中试探性的对其进行宣传，如果有成效才能进行下一步，以免宣传不成，自己反而被孤立。如果现实环境不好，宁肯暂时伪装自己也不要盲动。

既然目前学生不好做工作，那么校内的工人呢？

学校中的工人，毫无疑问的，实在是太少了，也并非产业工人；而且，在目前校方对左派学生管控愈加严重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宣传活动自然也是受到限制的。**我们支持左派学生对校内工人的宣传工作；但我们认为，有更广阔的天地等待着我们。**

4、最艰苦的工作

说到“最艰苦的工作”，就不得不提到几个响亮的名字：**沈梦雨、陈武阳**。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他们毅然到工人阶级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工厂**当中，不仅承受着极高的工作强度，还要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政治工作——不仅是运动时的直接宣传，更有平时细水长流、点点滴滴的谈话、交心。他们愿意这样，因为他们是**为党生活者**，他们将是**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中最重要、最能依靠的分子之一！**

他们所做的，也正是我们给出的，在进入社会后的选择之一——**毕业后，投身工厂，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

当然，我们很清楚，这不容易——毕竟，在工厂里短期的“体验生活”或许会满足你自己的好奇心、虚荣心；**但要工作真正出成效，你需要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的做工作。**

而且，**如果你的家庭条件不算差，你还要做好与原先的社会关系决裂的准备**——我们已经有一些学生在经历着这些考验。沈梦雨同志就和她的父亲闹翻了，很多声援团的同志也遭到了家里的压力。也因此，我们把这样的人称作“**狠人**”——而无产阶级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人。

请记住，**热血自然能支撑你走过一段时光，但要坚持下去，就要像列宁所说的：“对革命者来说，革命就是生活。”**

结语——对左派学生的期望

长久以来，左派学生都是被嘲讽、批评的对象：小资产阶级狂热、幼稚、三分钟热度……这些批评有没有道理呢？

是有的。

在学生中，有没有一腔热血、哪里热闹往哪跑，幼稚的认为仅靠自己短时间的灌输就能让工人觉悟的人呢？

是有的！而且大有人在！

在学生中，有没有只知死读著作、空谈理论，或是在左圈中安逸自得，而不想对现实

事业有哪怕一丁点贡献的人呢？

有！而且大有人在！

甚至，有没有以此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泡妞打炮的人呢？

有！这些人我们都见过。

但是，这是不是说，左派学生就一无是处呢？

绝对不是！资产阶级的镇压行动表明了一切。敌人越是对我们疯狂，就越是说明了左派学生的重要性！

- 王胤瑜 2014级北京大学景观学院
- 谢孟杰2018届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生
- 何端峰 80级北京大学物理本科生
- 刘少怡 79级北京大学技物系本科生
- 姚晓琪 清华大学毕业生
- 周远 武汉大学研究生
- 林恪 武汉大学
- 陈伯涛 中国农业大学学生
- 欧阳章楠 中国农业大学学生
- 董睿泽 东北农业大学学生
- 魏宇轩 东北大学学生
- 文则 浙江师范大学
- 冯子鉴 成都师范大学
- 陈诗雅 大连交通大学
- 戴远航 浙江工业大学
- 苏昌光 四川师范大学校友
- 凡小心（化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

声援团部分名单

大浪淘沙，真正的为党生活者终会成为组织中的金子！

当然，人也是在变化的。有谁一生下来就是为党生活者呢？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了，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不能再浪费自己的生命了，不能再白白耗尽自己的青春了！**

你可以颓废，你可以逃避，你可以只把左圈当做自己业余的避风港，但那就别怪形势把你无情的抛弃！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对左派学生的期望：做为党生活者，做黑暗中的第一把火！

同志们，前进！

先锋报
2018年12月

货车司机杀人案

今年 10 月 26 日深圳发生了一起货车司机杀死一家三口的案件，连杀三人仅仅花四十秒。此事轰动大深圳，容我们将此次事件娓娓道来。

这里我们先从阶级角度来看当事人：开着奥迪 A6 的王小飞一家人，妥妥的小资产阶级，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熟知法律程序，并且有着小资的精明懂得如何用法律来尽可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刘全是个来自外地在深圳打工的穷逼，内向而拘谨，毫无社会关系，但是胆大心细富有斗争精神值得敬佩的勇士。

我们这里不想从道德这里来评价王直一家人不仅仅毫无同情心，并且太过于精明聪明反被聪明误。而另一方面刘全勇士的举动又多么多么愚蠢和残忍，毕竟对方“罪不至死”。这样来评价就是双方都有过错——如果大家都退一步，整个社会就和谐了，皆大欢喜了。

可是情况是这样的吗？我们抽丝剥茧，看看事情的经过进行分析与综合：

首先，我们从事情的经过看法律的认定：

10 月 22 日 10 时 48 分许，王直报警称其驾驶的轿车（奥迪 A6 型）与刘全驾驶的货车（庆铃轻型厢式货车）通过一路口时，发生刮碰事故，货车离开现场。事故现场视频显示，事发后，刘全所驾货车继续前行离开现场，没有急刹车、急加速，未停车或下车查看。轿车司机王雪下车查看，王直记住货车车牌号报警。

交警接到报警然后有了这样的责任认定书：此次事故系刘某疏忽大意，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无证据证明王小飞妹妹有导致此事故发生的过错，刘某应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两辆车由于通过路口不经意间的互相刮碰，而货车司机刘全“未发现”，很自然而然就成了全部责任承担者。

那么，我们在这里对货车司机刘全做一个推论——他到底是没有发现的无心之失从而从现场走了，还是已经发现了碰撞但是直接逃逸了呢？

如果是前者，无心之失，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急刹和急加速，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么由于你未下车而是从现场走了，那么全部责任就是由你承担。而刘全作为一个打工仔，既无钱，又无关系，无法跟交警攀交情，在责任认定上必然极其不利。

我们可以做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刘全是发现了有刮擦，但是有了故意逃逸的想法从而逃脱责任呢？那么被发现了，全部责任不就理所当然他承担了吗？这正好证明，刘某此人就是个无视法律的人，且杀人的想法蓄谋已久也是理所当然了吗？

可是，这位刘全作为一个打工仔司机，他必须要做到将货按时按量安全送达。如果停在路上等交警过来处理，甚至协商暂时未成、货车暂扣到交警队，他货未送到，导致他的客户各种原因投诉他，我估计这个月的工资就保不住了，甚至饭碗也保不住。

其实对刘全本人来讲，无论怎么选择都会吃亏。看到这里，是不是非常的熟悉？不仅仅是司机，作为打工者的整体，我们无论在哪个公司打工，公司规章制度和老板的认定经常

会这样：我不管你过程多么艰辛乃至各种突发状况，我只管结果。如果你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没有完成多少计件或者其他任务以至于搞砸任务，少发工资甚至罚款是经常有，丢饭碗也是比比皆是。

我们犹记得，今年台风山竹期间，多少快递员由于风吹雨打，导致外卖受损，可这损失还是得自己承担。其实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这个社会打工者会经常性的结构性错误，无论你怎么小心翼翼，只要稍许犯错你就会陷入困境。

法律是专政工具，现在的法律是保护财产的一方，而不是保护劳动者的一方。

那作为“被害人”王某一家，他们是什么诉求呢？

10月22日至25日，双方互留电话后，刘全与王直在手机上展开了对话。嫌疑人刘全认为自己事发时不知情，不是逃逸，且一直配合处理，恳求王直考虑到自己收入低、生活困难等实际情况，同意通过保险公司处理赔偿事宜，并答应在保险理赔的基础上，再多给2000元作为补偿。王直方自行委托某奥迪4S店评估修理费用为18379元（交警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中心费用评估为14074元），且认为刘全构成肇事逃逸，坚持要求他赔偿2.5万元。

很显然，王某一家人可不会管你收入低生活困难。作为精明的小资产阶级，为了能尽量取得多的赔款，根本不想配合司机刘全保险理赔，并且一定认定对方逃逸，这样就能赔更多。可王某一家人的这些行为偏偏符合法律规定，刘某确实从现场“走”了，可以认定为“逃逸”。而一旦“逃逸”，保险公司又可以根据法律将一个穷逼的理赔单推得一干二净。因此，根据法律，只要这么做，无论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王某一家或者保险公司都能利益最大化。而刘全作为打工者是受损害的一方，并且还真不“冤”，应该承担自己犯下的所有责任和赔款。

看完了当代的案例，再回过头看看六十年代的一个有趣的案例。在六十年代，汽车数量特别稀少。某大型国营工厂和市中心距离30公里，但一天仅仅只有两班公交车，过时不候。一个工人在市中心游玩了半天，急急忙忙赶到公交点想回去上班，结果不巧公交刚走，只能走路回去了，而迟到也是必然。这个工人突然看到邮电局旁边正好停着一辆邮电单车，他二话不说跨上去火急火燎赶回了工厂。而没想到，过几天市公安局作为一个重大案件来调查，要严肃处理（这里需要补充一点额外的知识，六十年代单车数量极少，个人根本没有指标买到，只有邮电局、公安局、国营工厂等单位才会配有公家单车，价值等同于现在的政府公用小汽车）。国营工厂的保卫科很快就调查到是本厂的一个职工骑回来了。他们深入了解了该职工的状况，最后和市公安局的人一起开会，认定为：**该职工根正苗红，没有任何作案前科，并且是为了当天生产活动不至于迟到而骑上了单车，虽然给邮电局造成很大麻烦，但情有可原**。最后处罚仅仅是写了些检讨好好反思错误，连拘留罚款等都没有。

两相对比，一个是新社会下，即使类似于当代社会里偷小汽车的案件，工人作为统治阶级，为了生产活动不迟到，仅仅只要内部反思错误即可。而在当代，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工人，在结构性矛盾的吃人的社会，只要工人犯一点小错，就会陷入困境。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货车司机刘全，一个来自外地的打工仔，给他的选择并不多，临场能做的反应也不多。而他犯了错，**无论任何选择都是让他吃大亏**。

但这里勇敢的刘全选择了抗争，将王某一家人送进了地狱之门。虽然后果是死刑，但无畏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而我们也深深认识到，作为一只只蝼蚁，仅仅靠单次无畏的斗争，并不能结束我们痛苦的历程。**只有团结起来做最后的斗争，才能彻底砸烂我们身上的枷锁**。

先锋报
2018年12月

不要翻案：向约瑟夫·斯大林同志致敬

【编者按】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红色文献翻译”，2018年12月19日。纪念斯大林同志诞辰140周年。

原文作者：[美]奥斯丁红卫兵 翻译：红色文献翻译

2016年12月19日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像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那样持续而彻底地成为一道界限。一提到他的名字，就把谷粒和谷壳区别开来，把虚伪和真正的共产党区别开来；很少有人能达到如此高尚的境界。**斯大林同志被正确地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导师之一**；他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一样受到尊敬，这是有道理的。然而，有些污迹是洗不掉的，毛主义也不例外；我们中间还有人要贬低斯大林同志，把他在辩证唯物主义上错误的次要方面作为主要因素。这类人只会朝自己的脚开枪，然后看起来很愚蠢地一瘸一拐退出历史。

在这一天，我们选择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一生和贡献，那是十分美好和广阔的以至于无法在这里全部叙述。在斯大林被称为“柯巴”的日子里，他不仅通过武装征收资助布尔什维克党，而且早在1905年就领导了零星的游击战争。他是一个工人阶级诗人，他从不害怕亲自为人民服务，这使他与同时代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同。

正是斯大林同志首先用马克思主义制定了框架，为我们分析民族和殖民问题提供了基础。斯大林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他本人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继承和自决权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斗争。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斯大林同志支持并推动了美国南方黑人自决权的“黑带”理论。这是一篇我们仍有许多要学习的论文。

斯大林是列宁同志的忠实学生和捍卫者，有一次为了冒着被杀的危险，把列宁偷运出境。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列宁主义。在他的诸多贡献中，把马克思主义综合成马列主义是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席卷了大地，在阶级斗争的战壕中证明了自己的普遍性。

斯大林同志结束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计划，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的建设。斯大林带领人类和我们无产阶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伟大境界。他打败了列夫·托洛茨基等人和他的反动总部，领导了一场反对顽固右派和其他敌人的胜利斗争。托洛茨基没有活下来，他的意识形态带来的只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笑话。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派成员害怕共产主义这个词，因此在制定和命名修正主义组织时选择了“社会主义”，然而，马克思正确地指出，共产主义者不屑于隐藏自己的观点。



红色文献翻译

斯大林同志最宝贵的贡献之一，是他果断地领导我们战胜了对我们无产阶级的最大威

胁，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西斯大军。是红军的子弹打死了纳粹的狗，是共产党的手推倒了奥斯维辛的大门。在这个帝国主义国家法西斯民粹主义抬头的多灾多难的时代，让斯大林同志的精神再一次照亮我们战斗的道路吧。

斯大林同志死后，那些想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人来了。为了完成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败坏斯大林的名声。毛泽东领导了对企图“去斯大林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批驳，全世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哀悼我们的英雄的牺牲，拥护毛主席对斯大林同志的正确评价。不是我们否认斯大林犯了错误，而是我们明白那些试图抹杀斯大林的人正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企图偷偷传输那种右派主义正如苏联执政的反动派在改革布哈林的名义时所表现出来的。我们国内的修正主义者在其他方面也做了同样多的尝试，这一点在每一个叛徒或“后毛主义”的人身上都很明显，这些人背弃了共产主义，背弃了人民。他们都以对斯大林同志的高度批评开始了这条道路。

斯大林再一次将真与假区分开来。正是斯大林同志充当了历史上三位最伟大的理论家中的两位之间的桥梁；列宁和毛泽东。与斯大林脱离关系的毛主义者将不再是毛泽东主义者！

在我们心中活下去，就是活在永恒。祝钢铁般的男人生日快乐。让一百万个共产党员在你的荣誉和精神下成长起来。

斯大林万岁，马列毛主义万岁！

钱！钱呢？

环卫工人们，大概是老板们最“关心”的工人群体了：

他们是最“抛头露脸”的工人，不像产业工人整天被禁锢在厂房车间里，他们的“车间”就在大街上、“机器”就是手中的扫帚，所以社会舆论都容易注意到他们；

而他们又主要以退休后的老人为主，顺便还可以弘扬资产阶级“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因此这也就不奇怪了，为什么各种慈善机构、媒体与商户乃至领导都对他们“青睐有加”——用各种各样的“小礼物”来给自己涂上一层伪装。

所以，大家能时常看到这样的新闻：

迎战暴风雪「扫雪辛苦了！商户为环卫工送上暖心茶」

寂寞真如斯 今天14:55

极寒冬日里，西安东羊市50名环卫工吃上了一顿免费泡馍

还能时常看到这样的图片：



拿着手中的饮料、小吃，照片里的环卫工人们呵呵的笑着；

领导们和蔼可亲的看着环卫工们，照片里一片欢声笑语，

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哦！

然而，吃瓜网友们却不识相的来砸老板们的场子：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485 回复贴, 共6页, 跳到 页 确定

为什么要高调宣扬给环卫工人送热饮，可是，就没见一个...

只看楼主 收藏 回复



乡村爱星

大尉



为什么要高调宣扬给环卫工人送热饮，可是，就没见一个人说给环卫工人涨工资的，给环卫工人上五险一金的。我们主张给环卫工人加薪，上五险一金，让他们舍得拿自己的工资买热饮...转



送TA礼物 分享

△ 举报 来自Android客户端 1楼 2018-12-27 14:42 回复

楼主说的很直接，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钱！钱呢？”

其他网友们的回答更是各种讽刺、调侃老板：



热饮成本7毛而已

糖sweet梦



上士



△ 举报 来自Android客户端 20楼 2018-12-27 22:12

收起回复



最瑞: ○▽○? 你怎么回事小老弟, 摄像机不要钱啊? 上电视印报纸宣传不要成本啊? 这些领导工资不是成本啊?

2018-12-28 09:45 回复



再也不水了: 领导屈尊给你发热饮还挑? 🍋 还不跪下谢主隆恩

2018-12-28 17:49 回复



娘勒戈_彼德: 没给你凉水就算不错了🍋臭弟弟

2018-12-30 03:25 回复

我也说一句



wvhjhhv



少尉



▲举报 来自Android客户端 4楼 2018-12-27 15:14 回复(38)

这些调侃当然都没错，但下面这位网友的分析才真正的打到了地方：



teamice



发热饮，我觉得挺好。钱拿到了，你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支配权在你手，而且价格你可以选。

给你热饮，你只能喝或者扔，钱的支配权还在我手，价格我选。

▲举报 7楼 2018-12-27 15:25

收起回复

概括起来，还是一句话：“钱！钱呢？”

果然，在钱的事儿上，老板从来不傻：

160名环卫工被拖欠工资7个月，收入仅500，领导：再催就把你辞退



事情曝光后，记者就对这些环卫工人进行了采访，这些环卫工人都是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他们全聚在院子里里面商量此事。有一位环卫工人说，算上12月份的，他们已经有七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没有发工资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60人，他们的工资并不高，一个月只有500块钱，可负责人还要拖欠工资。



有一位大妈还告诉记者，他们一个月只有500块钱，可是还经常会因为各种原因被扣钱，就算是找不到原因，他们也会随便找个借口来扣钱，说是500，但是最后拿到手的有400块钱就已经不错了。

原来还有这样的理：

从你工资里扣下“买煎饼的钱”，敢催就滚蛋；

然后在镜头面前假惺惺的掏出一个煎饼，给你“献爱心”，让你感谢领导！

这就相当于：先打断你条腿，再给你一副拐杖，还把这叫做“慈善”！

还有更惨的，拿命换的钱都得被公司扣大半！

环卫工意外身亡获赔十万，被环卫公司拿走7万，负责人弥补损失

前不久，河北一环卫工人石香芹在上班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通过公司为员工购买的保险，他的家人可以得到十万块钱的赔偿金。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最后石香芹的家人仅仅拿到了三万块钱。那么剩下的七万块钱到哪里去了呢？



快传号 / 暖日大视野子翔

对于此事，环卫公司的李经理表示，公司为员工购买保险一是为了给员工一个保障，二是为了给公司一个保障，因为石香芹在身故后走了保险，导致公司明年的保费上涨，所以要扣下来七万块钱作为明年保费上涨的金额，也算是弥补公司损失。另外李经理还表示，人心都是肉长的，在石香芹出殡当天，他代表公司拿了一千块钱，这也算是公司对她的关心。

呵呵，这狗经理先装模作样的表示“人心都是肉长的”，然后“代表公司拿了一千块钱”……

一条命换来的十万，就这样变成了三万零一千？？

这就是赤裸裸的抢劫！

然而，老板们表示，还有更扣的：

环卫工凌晨四点被撞身亡 雇佣单位不是上班时间

一分钱都甭想要！
加班时间出事不算工作事故，因为不在工作时间！

恰好，我们也曾经评论过这样的事例（参见本报往期文章《工人命？比钱薄！》）。

那么问题来了：这时候老板的“爱心”哪去了呢？
很简单，在老板看来，“钱”比“爱心”重要得多！
做慈善时，给什么吃的、喝的，什么时候给都取决于老板！

而只有钱在我们手上，我们才能真正满足自己的需求！

同理，对产业工人乃至整个工人阶级来说：

只有钱在我们手上，我们才能决定自己能买什么！
只有机器在我们手上，我们才能决定自己为谁而工作！
只有政权在我们手上，我们才能决定自己是不是主人！
不要老板假惺惺的施舍，我们要抢回我们自己的东西！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先锋报

2018年12月

频繁爆炸背后的老板的秘密

首先上新闻衔接：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11%C2%B728%E5%BC%A0%E5%AE%B6%E5%8F%A3%E7%88%86%E7%82%B8%E4%BA%8B%E6%95%85/23178362>

搜狐新闻：https://m.sohu.com/a/278740702_510292?scm=1002.b000b.e000e5.ARTICLE_R_EC&spm=smwp.content%2F10_4.fd-d.1.1545736953996pBXSyHO

张家口爆炸事件的新闻已经盖棺定论：

11月30日14时，张家口市政府召开“11·28”爆燃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原因初步调查结果。现已初步查明，发生爆燃事故是由于中国化工集团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氯乙烯气柜发生泄漏，泄露的氯乙烯扩散到厂区外公路上，遇明火发生爆燃所导致。

盛化化工表示：万分痛心，十分愧疚，沉痛哀悼，向张家口人民全国人民深深致歉：

据盛华化工周边村民反应，该厂噪声大，常半夜排放气体，空气中刺鼻的味道，嗓子也难受。“到了早上，总有黏黏的白色颗粒粘在车上，用水冲不掉。”

由于厂区门口半夜常常排队卸货的大车，曾发生多起交通事故。盛华化工附近的向家营村一村民告诉《后窗》，曾有朋友去年晚上开车撞上排队的大车，不幸遇难。

《后窗》了解到，爆炸发生后，周边的梅家营村村村民抗议，希望厂子迁走。

北甘庄村、梅家营村，距离爆炸现场都只有一两公里。

爆炸发生时，村民张先生已经入睡，床突然的晃动把他震醒，接连着就听见三四声爆炸，村子东边冒出红光，村子里的狗全部都叫起来了。只穿着秋衣秋裤睡觉的张先生并未在意，懒得出门查看。

过了十几分钟，儿子就打电话让他起床，“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说爆炸了，赶紧走”。随后村委会也广播通知，要求村民马上撤离到十公里以外，投奔市里的亲戚家或者住酒店。

北甘庄村多名村民反映，爆炸发生后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酸臭味，有人解释是车辆焚烧的味道，仍没有消除村民的担心，一些村民戴上了口罩。凌晨两点多，全村2000余人几乎撤离了一半，“路上都是车，除了生病走不动的，大家都往外跑。”

周围村民表示 qnmlgb：天天半夜放毒的狗比还敢假惺惺，平时排废气的时候咋不出来道歉？这次要再大点周围几个村的人全得死连个屁都放不出来。

当局表示：充分暴露当地政府重发展轻安全巴拉巴拉，翻译一下就是，妈了个巴子又给老子找麻烦。

今年6月29日，盛华化工曾举行氯乙烯泄漏事故综合应急预案演练，“使职工学习掌握在危化品泄漏事故时采取正确的方法控制事故的扩大，最大限度地减少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官方介绍该活动的文章称，“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以来，河北盛华把加强日常安全管理作为重中之重，加强安全教育，集中排查隐患，开展安全演练，以识别安全风险，增强防范能力。

据知情人消息，11·28爆炸发生前，河北省环保督察组正入驻张家口市开展督察。据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消息，经河北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同意，河北省于11月20日至12月10日，对张家口、邢台、邯郸和辛集4市开展第三批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政府表示：劳资刚放话这月生产安全无问题，转眼就炸，你们要气死我是不？但不管当局关心的是啥，反正不会是死难的工人兄弟。

让我们回头来看，是谁残害了我们 50 多位工人弟兄：

当局和记者新闻都关注在氯乙烯泄漏，盛化现在还在和隔壁海泊尔扯皮推卸关系，

目前，此次事故的成因还在调查中。科技日报记者向业内人士核实，有媒体报道均提及事故是由运输制氢生产用乙炔发生泄漏引发的，这一说法并不成立。据悉，乙炔俗称风煤和电石气，为重要化工原料，在室温下是一种无色、极易燃的气体。

“可以肯定的是，海泊尔制氢采用的是水电解制氢工艺，而水电解制氢工艺绝对不会使用到乙炔作为原料。”洑春干说，水电解制氢是成熟技术，从生产工艺到控制系统都是安全可靠的。生产工艺上是将纯水装置提取的软水注入电解槽，在电解槽中通入直流电，水分子在电极上发生电化学反应，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气体通过调节阀控制输出，送入储罐。

这货车如果是海泊尔的，华盛就能少赔点，甚至甩干净锅。老板们为了那点钱是无所不用其极，但事实就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工人兄弟们是为什么死的：

张家口11·28爆炸事故中，那些…

陈庆远称，前几天受大雾天气影响，高速封路，很多货车被困在路上，最近几天到达厂区的货车比较集中，都要排队等候进厂卸货。

有此前往盛华运送煤炭的大货车司机介绍，化工厂附近大货车排队是经常的事，一般都要排一天，有特殊情况下，甚至排过一个星期。有的司机排队领完号，就自己到附近的宾馆住下。省钱的司机就睡在车上，到附近的小卖铺买点方便面吃。

相对于运送乙炔、天然气等，运载工业盐相对比较安全。陈庆远向Vista看天下微杂志记者介绍，化工厂内禁止吸烟，甚至禁止司机携带香烟和打火机进入厂区。有时候，化工厂人员会上车检查是否携带火源，“司机把烟和打火机藏起来，或者暂时放在门卫室”。

陈庆远的货车停放地点距离爆炸现场较远，并未遭到焚烧。但在当天晚上，陈庆远也一直提心吊胆。正在车座后面睡觉的陈庆远被爆炸声震醒，就看到盛华附近冒起火光，“连着炸了四五声”。陈庆远穿上衣服之后就将车启动，“车根本就动不了，一辆贴一辆，都堵死了。”庆远就下车站在路边，等火势灭了之后才回到车上，夜都没敢再睡觉。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称，爆炸发生时在现场的孙车司机透露，这些装载不同材料的货车混在一起，并无

边的司机说，从27日早7点起，卸货的队伍就在公司门口排开了。队伍从东门绵延到2公里外的西门，又一直向西延伸数里。

“83%的十多次盛华的货，正常情况下前面就排个四五十辆车，从来没见过门口的队排这么长。”翟军说。

公司内只有一台装载机给进入东门的货车卸货。一辆车就要卸20分钟到半个小时。翟军知道，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夜晚。他回到西边车队尾部，爬进后排座位——这里放着棉被，脱下衣服睡觉时可以舒服些。他很快睡着了。

11月28日0点左右，货车司机王尚鹏和几个哥們们在盛华化工卸完货时，结账的人已经下班了。他们一行9名司机、9辆大货车只好在厂里等着，回到各自的货车上睡觉。

0点41分，300米外的队伍前方传来一声巨响，翟军险声浪掀翻。10秒后第二声巨响时，他看到东边冲天的白色火星簌簌落下。36秒后又是一声巨响，6秒后最强烈的一次爆炸将深夜照成了白昼，最后一声闷响发出时又过了53秒。

sina 新浪新闻 更多精彩

打开

0点41分，大部分司机兄弟都睡熟了，而且现场那整条公路都铺满了大车，一点起来没人能跑出，车开不走一辆辆都堵死，这是工人们死伤的直接原因，他们根本走不了！

安监局曾表示：他们要求运输危险气体的货车停在某地(为了甩锅，他们也是拼了)，后来他们也没法管了。为啥呢？这条路上不止运输危险气体的工人，还有各路运输工业原料，煤，油，工业盐杂七杂八原料的兄弟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只要老板们有需要，各种不同原料的车从各地向各种不同的工厂进发。老板是不会让他们停车接受什么车辆分类什么危险气体

张家口爆燃事故背后：被爆炸掀…

从26日出门算起，他已经3天没有见到家人了。他一个人开着一辆大车，白天、晚上都在路上。

“开了22年，什么恶劣的天气都见过，什么难走的路也都走过。”翟军说，冬天在东北或内蒙古的极寒温度下，汽车熄火后暖风就没有了。为了取暖，他会把电褥子插在点烟器上，把身体裹进去强迫自己入睡。

昨天又是另一个极端，“以前没换车的时候就只能大开着窗户通风。”

和张家口一带的大部分个体货车司机一样，为了节省成本，翟军的每趟货都是自己一个人跑。还为自己的货车交了每年2万元的保险。“这很重要，是行业共识。”翟军说。

为了省下600多元的过路费，内蒙古-张家口线的司机们还会选择低速国道。货车以每小时五六十公里的速度前行，动辄就要开上十几个小时。在供货、收货双方都有时间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压缩自己的休息时间。翟军说，“开久了脑子都是麻的，根本反应不过来，追尾的不到了。”

张家口爆燃事故背后：被爆炸掀…

生侯铁 摄
“等，不等干啥？光卸货就等两天了。”37岁的王尚鹏穿着一件没有拉链的蓝色狼爪冲锋衣，插兜的双手用力交叉围住里面的毛衫。“以前在内蒙乌拉尔一堵车就是两三天，差点在车里冻死还没人管呢。”

对于这些常年在外的货车司机来说，这场爆燃事故又是一场被动的等待。在他们看来，自己的职业本就浸泡在无尽的等待里。

卸车要等，装车也要等。翟军是11月26日早8点从万全出发的，开了10小时空车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接着，他从傍晚排到第二天上午11点，装满煤却只用了10分钟时间。

遇到堵车，一寸一寸地挪动是最费力最痛苦的，无论多少公里的车龙都得保持清醒，随时跟上。有时，互不相识的司机们会自动凑到一起，在路边“斗地主”，聊天解闷。

翟军碰到的最长的一次堵车是在北京八达岭，堵了1夜，“碗康”（碗装康师傅方便面）卖到三十块钱一磅。

什么工业原料啥的，停车就是浪费老板们资金周转的时间，老板们就要扣司机兄弟们的工钱，逼他们快快快向目的地进发。为了老板们的利益，就自然而然的会有这种各种车辆混杂。一条条拥堵的车流涌向各路工厂，今天这家不炸，明天那家也会因为各种泄露点燃不同的正好应景的危险车辆造成爆炸，这又是一次老板们造成的悲剧！

这两位兄弟的遭遇表示：全国各地都是这种情况，各地的货运司机都是这种待遇、只要他们被老板逼着白天黑夜的跑路缩短时间，堵车如图中精疲力尽的停停走走，最终在卸货时等到晚上还开不走，等扛不住睡在车上时，他们无法躲过任何意外事故，他们将无声无息的死在车上！

在某一天他们会死在这个老板泄露毒气或者那个老板易燃易爆气体泄露爆炸，只要老板们为了他们的利益一次次的让工人兄弟们筋疲力尽，死亡，伤害就找上门来，工厂里无数次事故也如此，一切都是因为老板们的利益！

危险的盛华：27年前氯乙烯泄露…

1991年12月1日，河北省张家口树脂厂（盛华化工的前身）聚氯乙烯树脂车间聚合工段发生爆炸事故，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用于制作法兰的钢材质量不合格，单体高位槽至聚合釜单体输送管道连接法兰沿圆周处开裂，大量氯乙烯单体泄漏并发生爆炸。另外，聚合厂房系砖结构而非防爆厂房，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导致事故扩大。

向家营村一村民向《后窗》证实，张家口树脂厂发生爆炸后，厂子由桥东区搬迁至宣化县，后因行政区划分，厂子所在的区域又划归桥东区管辖。

1991年的爆炸后，2013年1月3日1点30分，盛华化工氯碱厂乙炔工段5号发生器维修作业现场，发生一起气体爆炸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80万元。

另外，盛化被爆出连续多次氯乙烯泄露事故：

前面几次事故和这次盛化和海泊尔扯皮表明，盛化擅长和有能力摆平各种事故和工人死伤对他们的影响。直到现在盛化的厂子还在正常开工，老板们是久经考验的。结合上次泉州事件和公交车事件，只要不给当局找麻烦，工人伤亡就伤亡了，无数次工人兄弟们的血债最终导致一次次事故发生，老板们一次次的要么罚款了事，要么赔点钱，要么干脆工人背锅。公交车事件那次简直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我们将持续揭露老板们的真面目，把他们所做所为都牢牢地记下。他们今天闹得欢，等到我们组织起来，团结一心，重新夺回我们的一切，要把这样的老板通通拉出去挂路灯！

先锋报

2018年12月5日

短评：护士值班中因公毁容，医院拒认工伤

今年10月9日，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的邢护士在值班过程中被精神病人用刀划伤，缝合了八十多针。可时隔两个月，医院却拒绝承认这是工伤。

10月9日，邢护士和往常一样在医院值夜班。当时病人们基本都已经进入梦乡了，只有一名患有躁狂症的65岁的汪某，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她时不时去病房里转一圈，时不时在楼廊上晃悠。当汪某看见邢女士的时候，情绪突然变得很激动，汪某用言语挑衅着邢女士，还说要杀了邢女士。但是邢女士并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她以为这只是一名精神患者的胡言乱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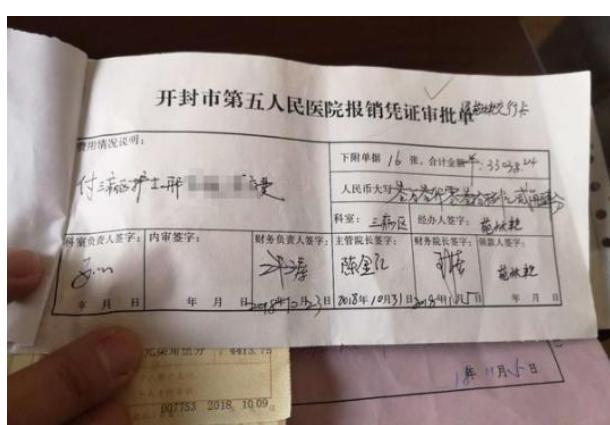
凌晨4时20分，王某从邢护士的侧后方摸了上来，趁其不备，在她脸上横斜着划了一下，邢护士一转头，她又在邢护士的额头上竖着划了一下。受到攻击的邢护士大声呼叫，时护士赶紧赶来，她看到邢护士的脸大惊失色：“小邢，你的脸！”由于受到惊吓和精神高度紧张，邢护士并未觉的自己的面部有受伤，听到时护士的话，她急忙跑到护士室照镜子，看到镜中满面献血的自己，当即崩溃了。脸上的伤口又长又深，其中最长的一条横在脸上，一只耳朵也被划伤，额头向下也竖着一条长长的刀疤。邢女士的脸当时缝合了80多针，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月了，虽然伤口愈合了，但是疤痕却一直在邢女士的脸上，以后这些疤痕可能会跟着邢女士一辈子。



帮忙，用腿压住她，汪某非得说是邢护士打了她。

邢护士说，因为她是新人，很多时候不如其他医护人员灵活，比如进入护士站这样的事儿，如果换了其他护士，可能就睁只眼闭只眼，因此而遭汪某记恨。。邢女士见状便上前约束住汪某，汪某一口咬定邢女士当时打了她。种种事迹导致汪某对邢女士的怨言越来越多，最后采用了这种方法来报复邢女

事后邢女士向自己工作的医院申报工伤赔偿，但是医院却说，这是报复，不算工伤。为什么医院说这是报复呢？难道是邢女士之前得罪了汪某吗？邢女士向记者透露，自己刚入职没有多久，为了可以好好表现，所有的事情她都是严格参照医院的规定。按照规定，病人是不能进入护士站的，可是汪某就是爱往护士站里跑。每次汪某来护士站，我都会把她赶出去。日常管理中，医护人员会带着病人在院区散步转圈，汪某非得和大家反着转，她也纠正过很多次。尤其是今年10月8号，汪某和一名男护士产生冲突，这名男护士要去约束他，邢护士上去帮



士。

根据邢护士提供的《开封市公安局南苑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邢面部的损伤程度经过法医学鉴定，为“轻伤一级”。让她比面部损伤岗位她难过的是：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对此事的处理，让她倍感不公！

澎湃新闻 12月16日 15:35 来自微博 weibo.com

【#护士被精神病人毁容#，医院称：为什么偏偏就伤了你？】10月9日，在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当护士的邢女士夜间值班期间，面部被一名65岁患有轻躁狂的患者汪某划伤，被急送郑州治疗，缝了八十多针。尽管事发已两月，邢女士面部横斜十多公分的伤疤看上去依然十分明显。邢女士曾要求院方为她申报工伤，但医院将此事定性为“报复性伤害”。邢女士认为院方处事不公，“他们这样折腾我，我现在都快疯了！”对是否“报复性伤害”的问题，开封五院院长助理陈金红说：“病人从年轻时就在这里住院，前后住了18次院。从来没有发生过伤人的事儿，为什么偏偏就伤了她呢？”民警称，待汪某鉴定结果出来后依法依规处理。大河客户端
被精神病人毁容护士认为医院处理不公，警方：...



邢护士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后，她曾经要求院方为她申报工伤，但是医院将这件事情定性为“报复性伤害”，是因为我打了人，才发生了这事儿，是我活该。后来我一再要求，负责处理此事的院长助理陈金红说这属于刑事案件不能报工伤。

邢护士还说：为了将此事定性为报复性伤害，医院领导开会研究，并要求医护人员做伪证，说我打了汪某；有几名同事因为向我透露了一些情况，被扣了2000多元的绩效工资。而她本人也被停发了工资。“我平时的工作表现有目共睹，监控都可以看得到，说我打了汪某，这是冤枉我，我不拍调查。”

此外，邢护士对自己的工作安排也很不满意。她说：“12月4日，医院通知我去上班，让我去开放病区，我说我的伤让我没法见人，院方让我自己考虑，我在护理部坐了一天，有通知我去门诊做导医，我都被毁容了，怎么做导医？后来又通知我去供应室，我受伤还不到俩月，他们这样折腾我，我现在都快疯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院长的助理称，这位病人从年轻时到现在，那医院已经18次了，从来没有出现过伤人事件，为什么就偏偏伤了邢女士呢？所以还是邢女士伤人在前，所以才招来了报复。

【本报简评】

即使依据当局现行的法律，邢护士这样在工作地点上班期间因为工作原因受伤，也完全应该判定为工伤，获取属于她的赔偿。但院方不但没有认定工伤，反而认为邢护士是被患者报复、咎由自取。

资产阶级为了那一点利润，已经彻底撕下了一切虚伪的面皮。为了避免认定工伤之后的赔偿和给自己政绩带来的影响，医院领导们用尽了百般手段——编造借口，威胁，扣钱，停发工资，收买人证，频繁调岗给予不适合的工作……

邢护士有错吗？不，她严格执行了医院的相关规定！但严格执行的下场是什么？是院方老板连工伤都不愿意认定！那么这又是什么狗屁规定？！

规矩，就是老板用来专政我们的工具！遵守规矩，让你受伤；不遵守规矩，让你滚蛋！不管我们是对是错，在老板的眼里都一样——我们只是用来给老板提供剩余价值的奴隶！

为了那点从我们骨头缝里榨出来的油，老板们不惜自己打脸！不剥削工人，不能获得剩余价值，老板是一天都活不下去的！

兄弟们，同志们，要改变这样的情况，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团结起来，共同斗争！

先锋报

2018年12月20日

“事是不是我做的还得看公安”

——评广州坠楼事件

前段时间，微博的热门最底部有了一条最不起眼的话题：



而这个叫许静的，是模特出身，成功迈入了大资的门槛，成为了许老板；

【2017亚洲小姐-广东总决赛】获奖名单	
广东赛区冠军：7号	何丹妮
广东赛区亚军：11号	<u>许静</u>
广东赛区季军：20号	许嘉琪（并列）
广东赛区季军：	23号 吴安琪（中珠赛区冠军）
广东赛区网络人气冠军：	10号 许颖甄
亚洲美肌大奖：	25号 施燕冰
纯美笑容大奖：	5号 温嘉璐
最具魅力大奖：	23号 吴安琪

此事一出，顿时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警方的调查结果：

综合现场勘查、尸体检验、解剖及物证检验情况，死者黃某某系攀越9楼阳台护栏坠落死亡。

但是，我们却看到了这样的一条微博：



大家好，我是死者黄伟鹏的亲姐，前天我爸被单独叫去警察局那边，（因为我爸是农村来的，不识字也听不懂普通话，可怜老人家被误导）警察拿了一个前段时间十三行打雷州小弟偷一百多万的货的视频给我爸认是不是我弟弟，我爸说不是（越秀公安通报中“经其父亲辨认，该男子不是其子黄某”），“林某已承认错误并在朋友圈进行澄清”一句是因为林某在之前的朋友圈中提到有看到黄伟鹏被扔下楼，林某是后来发朋友圈证实没有亲眼看到被扔下楼，并没有说没有被打一事，以下附上现林某朋友圈

“针对网络流传“买通派出所”让家属签名确认是自杀的说法”，关于这一事，让家属签名确认自杀一事是真，但是我们并没有说派出所是被“买通”的，大家不要被公安局通报我们就自己失了阵脚，这只是他们玩的“文字游戏”，目的就是混淆视听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作为死者的姐姐一定要为我弟弟讨回公道，请大家持续关注！！！

注：我愿意为我自己所说的所有话付所有法律责任！！

谢谢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谢🙏

死者的家属很悲愤，我们也要问：

为什么 16 号接到的报警，3、4 天后就发布了如此草率的“结果”？

为什么死者要攀越 9 楼护栏？警方并没有解释原因，而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

而当群众们都在呼吁着警方有进一步的解释与调查时，**警方考虑的，却根本不是什么“真相”，而是维稳、控制事态！**

#许静#很显然。十三行地区已经是被重点照顾的地区。严防死守。防止你们在附近聚众。防止你们上街闹事。防止把事态进一步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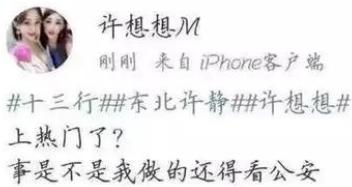


而微博、事发视频也早已被删除！

朋友们，死者坠亡时的景象是多么可怖：



再看看这位许老板，她显然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有信心，以至于嚣张到了这样：



好一句“事是不是我做的还得看公安”！

这位许老板的一句话，就把表面上代表公平正义的资产阶级当局给扒拉了个精光？

原来事实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看公安如何定义此事！公安说这是事实，这就必须是事实！

不服吗？这是警方的声明：

警方郑重声明，对个别故意在网络上制造、传播谣言，混淆视听，抹黑公安机关的别有用心人员，警方将在取证后依法进行查处。

朋友们，这不是声明，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恐吓！

还远不止是这件事；大家想想，资产阶级当局对佳士事件的定义，不也是与事实大相径庭的“**境外势力阴谋**”吗？

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当局会永远在这些事情上指鹿为马；他们在这些“维稳”、镇压人民的事情上不会有任何的“良心”可言！

我们怎么办？就让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吗？
让这些事情以后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可能性吗？

不！我们必须站出来，与他们做不懈的斗争！
退让并不能让对方怜悯我们；只有强硬的斗争才能让对方知道我们的力量！
朋友们，联合起来！坚持斗争！

先锋报
2018年12月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

(1900年11月初)

俄国社会民主党不止一次地声明过，俄国工人政党的当前政治任务应该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这一点在十五六年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即“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声明过；两年半以前，1898年春，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成员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作过这一声明。

虽然有过不止一次的声明，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问题，现在又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运动中有许多人，对上述问题的解答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他们说经济斗争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们把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缩小和限制这些任务，他们甚至声称，要在俄国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言论，只是人云亦云，工人只要进行经济斗争就行了，政治可以让知识分子联合自由派去搞。新信条（臭名远扬的《信条》）的这个最近的声明，竟公开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还很幼稚，并且完全否定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工人思想报》（特别是《增刊》）所谈的，实质上也是这个意思。俄国社会民主党现在正处于动摇时期、怀疑时期，甚至到了自我否定的程度。一方面，工人运动正在脱离社会主义：有人在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但是有关整个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和政治任务，却根本不向工人解释，或解释得很不够。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也在脱离工人运动：俄国社会党人又在纷纷议论，说反对政府的斗争应该由知识分子单独进行，因为工人只能进行经济斗争。

我们认为，这些可悲的现象，是由三种情况造成的。第一，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活动初期，只进行一些小组宣传工作。等到我们转向群众鼓动工作的时候，有时不免陷入另一极端。第二，在活动初期，我们不得不经常同民意党人进行斗争，来保卫我们存在的权利。民意党人把“政治”理解为脱离工人运动的活动，把政治缩小到只进行密谋活动。而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这种政治的时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竟笼统地把政治推到了次要地位。第三，当社会民主党人分散在地方工人小组内进行活动的时候，没有很好地重视，必须组织革命政党来统一各地方小组的一切活动，并正确地安排革命工作。工作分散占优势的情况，自然同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情况是有关联的。上述的一切情况，使大家热衷于运动的一个方面。“经济派”（如果说是一个“派”的话）企图把这种狭隘观点，提高为一种专门的理论，为此他们就企图利用那种打起新的旗帜传播旧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时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种企图的危险性就是削弱了俄国工人运动同俄国社会民主党这个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之间的联系。而我们运动的最迫切任务，就是要巩固这种联系。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维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为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一伟大遗训。各国都经历过工人运

动和社会主义互不联系、各行其是的时期，这种相互脱节的现象，削弱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所有的国家里，只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奠定了二者的牢固基础。

但是，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在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必要性，在理论上早就讲过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结合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形成。这个形成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各种动摇和怀疑，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

从过去的历史中，我们得出的教训是什么呢？

整个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最迫切任务是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是集中在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上的。另一方面，历史表明，社会主义思想脱离劳动阶级先进人物的现象，在俄国要比其他国家厉害得多，因此俄国革命运动必然软弱无力。由此自然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随着运动的发展，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场所会越来越广，工作的方面会越来越多，需要越来越多的搞运动的人集中力量去解决宣传和鼓动的日常需要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局部任务。这种现象完全是合乎规律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现象迫使我们特别注意，要使局部的活动任务和个别的斗争手段不致成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要使准备工作不致成为主要的和唯一的工作。

促进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组织，是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谁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的地位，不使一切局部任务和个别斗争手段从属于这个任务，谁就会走上错误的道路，并给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他们号召革命者依靠某些脱离工人运动的密谋小组的力量，去同政府作斗争；第二种人，他们经常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内容和范围，他们认为只有在工人生活中的特殊时刻，只有在庄严的场合，用“政治”来款待工人才是可能和适当的，他们过分注意把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化为要求专制制度作个别让步，而不太注意把这些要求变成革命工人政党反对专制制度的有计划的坚决的斗争。

“组织起来！”《工人思想报》用各种调子一再向工人这样宣传，“经济派”的一切拥护者也一再向工人这样宣传。我们当然完全同意这个呼吁，但是一定要补充一句：不但要组织互助会、罢工储金会和工人小组，**而且要组织政党，组织起来同专制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就不能去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工人运动就会软弱无力，只靠一些储金会、工人小组和互助会，工人阶级永远不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任务：使自己和全体俄国人民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奴隶地位。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俄国工人阶级已经表明它能够推举出这样的人物，最近五六年来俄国工人所广泛开展的斗争，表明工人阶级中蕴藏着无穷的革命力量。它表明，追求社会主义、追求政治觉醒和政治斗争的工人，不仅没有因为政府的疯狂迫害而减少，而且还增加了。我们的同志在1898年召开的代表大会，正确地提出了任务，不是人云亦云，不是只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憧憬……我们把党的纲领问题、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以后，就应该坚决着手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对我们纲领的基本原则的看法，已经讲过了，详细阐述

这些原则，不是本文的任务。关于组织问题，我们打算在最近几号报纸上写一些文章。

这是我们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我们大大落后于俄国革命运动的老一辈活动家；我们应该坦白承认这一缺点，**应该想尽一切方法使我们的活动更加秘密，有系统地宣传活动准则以及蒙蔽宪兵和躲避警察耳目的方法**。我们应该培养一些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大的组织，大到可以使我们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之间进行严密的分工。至于策略问题，我们只能在这里谈这样一点：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它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并且在现有条件下能够使我们取得最大的成绩。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某一次的罢工也能够变成政治示威，变成对政府的一次政治胜利。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个别地区的起义也能够发展成胜利的革命。

我们应当记住，为满足个别要求，为取得个别让步而同政府展开的斗争，不过是和敌人的小小接触，不过是小小的前哨战，决战还在后面。我们面对着一座强大的敌人堡垒，从那里向我们发射出雨点般的炮弹和枪弹，夺去了我们的优秀战士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夺取这座堡垒。只要我们能够把日益觉醒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和俄国革命者的一切力量联合成一个党，并能使俄国一切生气勃勃和正直的人都倾向于这个党，我们就一定能够拿下这座堡垒。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实现俄国工人革命家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伟大预言：“等到千百万工人群众举起筋肉条条的拳头，士兵刺刀保卫着的专制枷锁就会被粉碎！”

载于 1900 年 12 月《火星报》创刊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
第 4 卷第 333 ~ 33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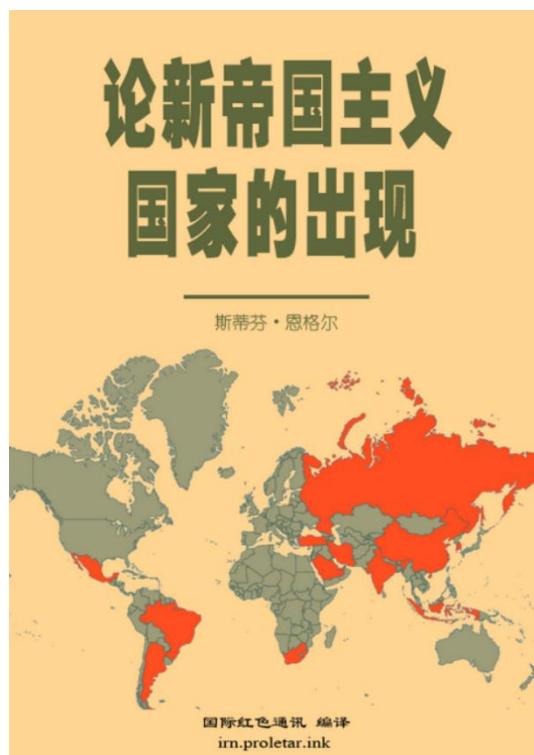
推书：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现

本期我们向大家推荐德国马列主义党（MLPD）的《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现》。

这本书是由德国马列主义党撰写的。20世纪中叶，联邦德国活动的德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认为苏联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他们脱离了被认为是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德国共产党，于1968年开始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准备工作，并于1982年正式建立了德国马列主义党。本书在2018年元旦时被国际红色通讯翻译为中文。

我们认为这本书中对于中国和俄国的分析是相对到位的，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今中国的国家性质。这是非常值得参考的。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国内的问题，而此书对于我们认识国内矛盾具有重要借鉴作用。我们建议大家在阅读我们此前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一文时对照参考本书。

但有些同志也对这本书在其他国家的性质判断提出了异议。例如，大多数同志，尤其是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同志们，认为印度并非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我们建议在阅读对其他国家的分析时，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PDF 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ROgD82>

DOC 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KVpTBd>

网页版阅读入口：<https://irn.proletar.ink/156/>

致读者

张家口爆炸余火未尽，深圳司机刀尖血泪未干，广州坠楼肆意妄为，对声援团的工人和学生的彻底清算……

在资产阶级猖獗的进攻中，我们迎来了 2019 年。

在这个新年，我们感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当局的深深的敌意。他们绝不会就此罢休，绝不会放弃对我们的专政。

是该到了决定道路的时候了。

明年怎么办？以后怎么办？。

是继续左倾盲动下去，还是扎实的去打稳群众基础？

列宁同志和布尔什维克党早已给出了答案。

所以，在这个冰寒刺骨的新年里，也有着一些闪烁着微光的新的东西出现。

我们期待着这微光的壮大。我们钦佩飞蛾扑火的勇气，但不希望再看到扑火的飞蛾。我们希望能看到有广大的萤火虫聚在一起，壮大这微光，直到有一天它变成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

先锋报

2018 年 12 月 30 日

在 2018 年的尾声，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大礼包准时送到，喜闻乐见！

据在工厂里的弟兄们统计今年南北方制造业平均提前十天放假，明年开工时间是否推迟，还有待观察！

虽然对于工人兄弟们来说，明年或许更加艰难，但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唯一的被剥削阶级，我们不会被压垮！

自上一次经济危机到现在，十年时间，我们见证了工人阶级的成长和进步，可以说，经济危机是工人阶级进步的催化剂。

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心怀期待！

全世界理產者 聯合起來

2018年12月
总第4期



先锋报编辑部 出版
投稿邮箱：1561123123@Protonmail.com